中国读本





商周青铜文化

李先登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青铜文化 / 李先登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35-1

Ⅰ.商… Ⅱ.李… Ⅲ.青铜器（考古）–简介–中国–商周时代 Ⅳ.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9262号

商周青铜文化

著　　者	李先登
责任编辑	徐丽丽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35-1 / K · 155
定　　价	16.8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

铜（Cu）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金属。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呈紫红色，所以又称红铜。它们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早在几千年前人类使用磨制石器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采集石料制作石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纯铜块，并把它们采集来，按照制作石器的方法，把它们锤锻、打磨成为小刀、小锥或小件装饰品来使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铜器。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用天然红铜制成的铜器是在土耳其南部恰约尼遗址发现的公元前七八千年的铜针和铜锥。

在自然界还存在着铜矿石，常见的有孔雀石，这是一种氧化铜矿（$CuCO_3 \cdot Cu(OH)_2$），因其颜色呈蓝绿色，很像孔雀的羽毛，因此，引起人们的喜爱，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把它们采集来制作项链等装饰品。后来人们发现，孔雀石偶然掉在炭火中，经高温会熔融成为铜液，冷却凝固时可以随意成形。这种现象不知重复发生了多少次，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终于发明了用孔雀石加木炭来冶炼并铸造红铜器的技术，从此，红铜器开始普遍出现了。因此，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例如埃及在公元前3500—前3100年的格尔塞文化时期就有了冶铸的红铜刀、匕首、斧和锛等。在中国，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约为公元

前2085年冶铸的红铜铃。

但是，红铜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又发现了锡矿石，常见的有锡石，这是一种氧化锡矿（SnO_2）；并学会了用锡石加木炭冶炼出锡（Sn）的技术。在人们掌握了冶铜术与冶锡术的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发明了用红铜加锡熔炼为青铜合金的技术，并且认识到青铜比红铜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具体来讲，青铜的优越性首先是硬度大。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度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并且经锤锻后，硬度可以进一步提高。例如加锡10%的青铜，经锤锻后，硬度增至228度。其次，青铜熔液流动性能好，凝固时铸造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刃部锋利、轮廓分明、花纹纤细的器物。第三，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以长期使用与保存。此外，青铜合金的熔点较低，青铜器用坏了以后，还可以回炉重铸。

由于青铜具有上述优点，所以，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因此，古代的人们在发明了青铜冶铸术以后，就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等。而青铜器一旦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应用，就使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给农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锐利的工具，促使劳动生产率大为

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促使农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分工，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其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社会的整个面貌大为改观。这就是说，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总而言之，青铜就是以铜为主（基）的合金的一种，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与锡的合金，此外还有铜与铅（Pb）的合金，铜与锡、铅的合金等。必须指出的是，青铜在古代原来的颜色大多是金黄色的，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以及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都称青铜（或铜）为“金”。只是由于经过长期腐蚀，古代青铜器的表面往往生成一层青绿色锈，所以今天大家称之为青铜。

青铜时代就是人类使用青铜制作主要的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的时代，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之后的第二个时代，是人类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在青铜时代，青铜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有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因此，人们才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代为青铜时代。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世界各国都经历了青铜时代。埃及在中王国时代（前2133—前1786）出现了青铜器，新

王国时代（前1567—前1085）青铜冶铸业达到全盛，用青铜制作生产工具、战车及庙门上的饰件等。在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约前2700—前2371）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前2113—前2006）青铜器开始流行。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是公元前2350年—前1750年的哈拉巴文化，青铜器有锄、镰、刀、斧、剑等。并且，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都在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时期。

古代中国，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早在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代时期就已经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古代文献上有夏代铸九鼎的传说，如《史记·封禅书》："（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皆尝亨鬺（shāng）上帝鬼神。"1949年以后，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在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900年（夏代初期）的青铜容器残片。残高5厘米，残宽5.5厘米，厚0.11—0.15厘米，重35克，表面有绿色及黑褐色锈，呈弧状，下部有转折，可能是铜鬶（guī）的腹底部残片。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进行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是含锡7%的青铜制品。同时，在河南临汝煤山夏代初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已使用多次的熔铜坩锅残片。尤其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夏代晚期及商代初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已发现了青铜鼎、爵、斝（jiǎ）、盉（hé）、戈、铃等多件器具以及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以上这些考古发现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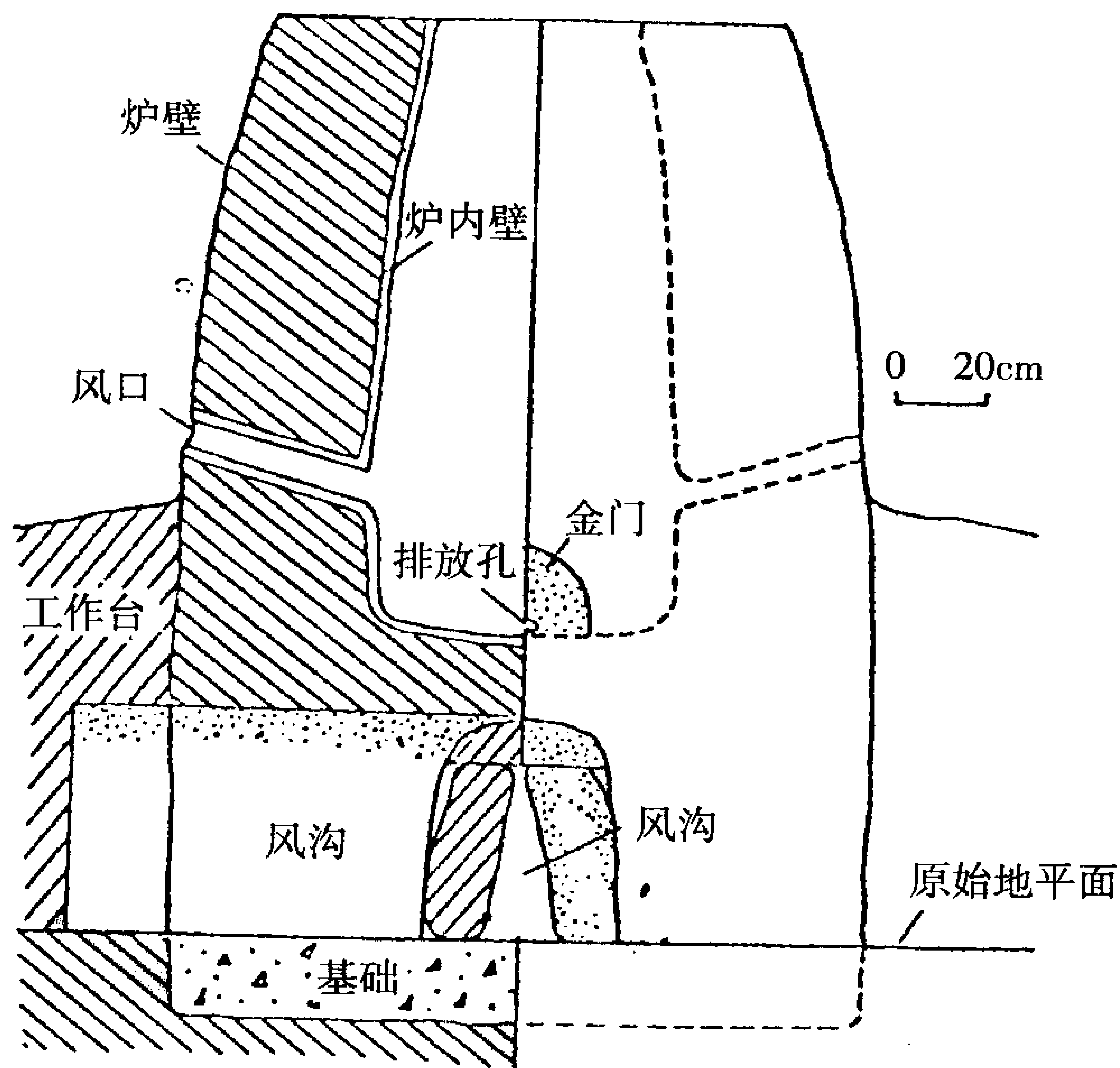
地说明夏代确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正在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下面介绍一下什么是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这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指青铜器，此外还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个大的方面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除物质文化以外，也包括当时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与艺术等。

接下来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过程。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主要分为采冶与铸造两个大的工艺过程。第一步是采冶，即首先分别采取铜矿石与锡矿石，然后加上木炭，分别冶炼出红铜和锡。中国古代铜矿蕴藏丰富，据春秋末、战国初的《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又据战国时期的《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还设有管理矿山的"丱（矿）"人。1949 年以后，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赤峰市林西、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铜陵等地发现了古代采冶铜矿遗址。现以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作一典型介绍。大冶铜绿山遗址在大冶县西北三公里处，遗址南北长二公里，东西宽一公里，储存有丰富的高品位的孔雀石铜矿，从 1973 年起开始考古调查发掘，已发现地下采区七处，其时代主要是春秋、战国至汉代。当时

是从地面挖掘竖井及斜井以达到地下矿层，然后开挖平巷和斜巷等进行开采。井巷使用木制框架支护，并已采取利用井口的不同高程产生的气压差来自动通风，用泄水槽、储水井及木辘轳等组成的排水系统来排水，以及用燃烧竹篾在井下照明等技术，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井巷中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采掘工具大型铜斧形凿、铜锛、木铲、木槌、木瓢、竹篓及绳索等。再有，当时是将采掘的铜矿石就地冶炼成红铜。在矿井附近发现 10 余座冶铜竖炉，其中春秋时期的冶铜炉高 2.7 米，呈腰鼓形，最大直径 1.6 米，是用红黏土、高岭土和石英砂等混合夯筑而成。炉缸上部设有排渣及出铜的金门及鼓风口，底部有通风沟。通过模拟试验，此炉已经可以连续加料，持续生产，每炉日产粗铜 300 公斤以上。在铜绿山遗址发现了古代炼铜渣 40 万吨，估计这里曾生产出 8—12 万吨铜，其产量之巨在古代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步是合金铸造。这又分为合金、制范、浇铸三个方面。第一，合金。就是根据所制器物的需要将铜与锡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放在熔铜炉中加热熔化，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青铜熔液，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关于青铜合金的配制比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说："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铜占 85.7%，锡占 14.3%）；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即铜占 83.4%，锡占 16.6%）；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即铜占 80%，锡占 20%）；参分其金而锡居一，



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冶铜竖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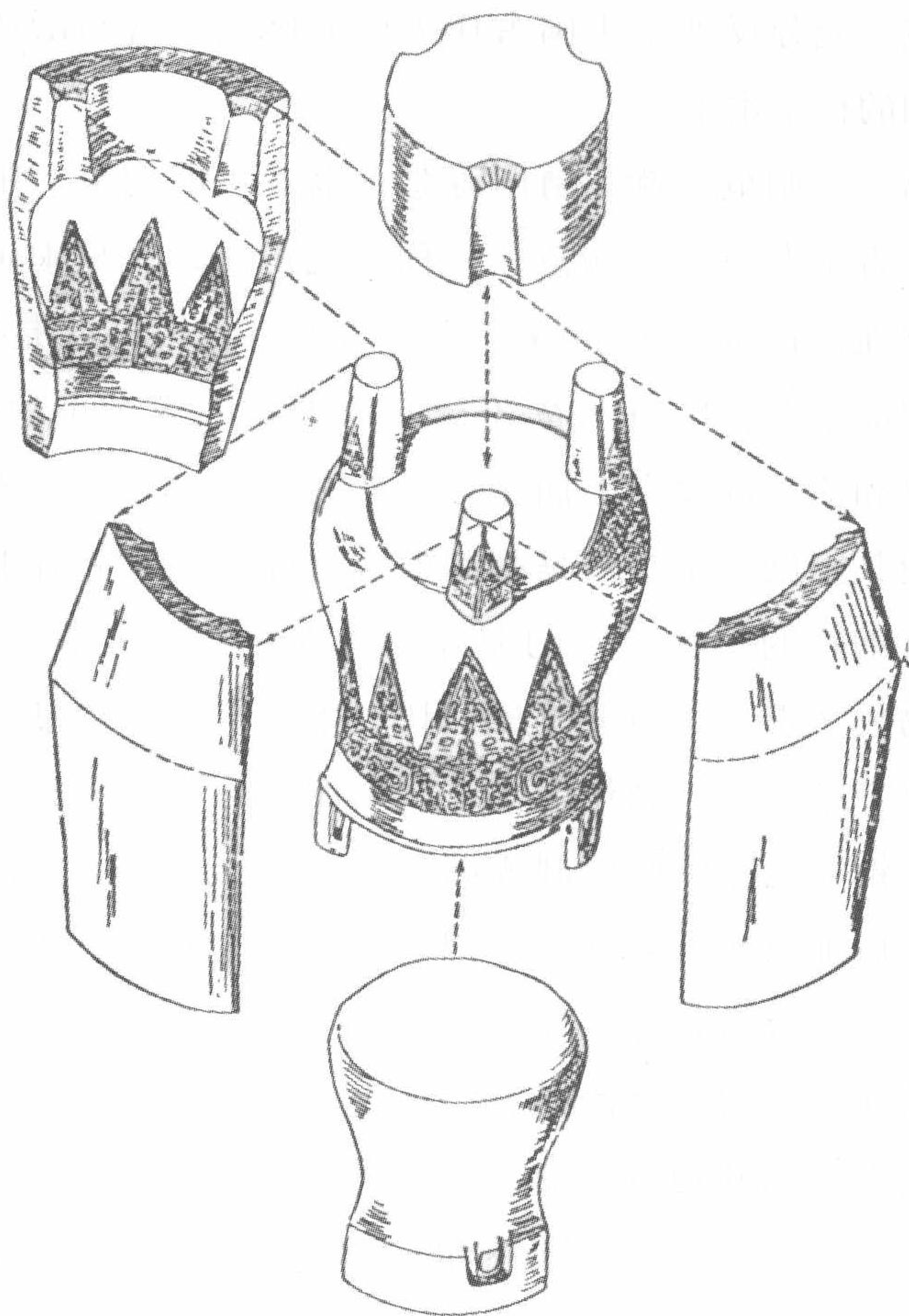
谓之大刃之齐（即铜占 75%，锡占 25%）；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即铜占 71.4%，锡占 28.6%）；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即铜占 66.7%，锡占 33.3%）。”通过今天我们对于古代青铜器的化验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的。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 47 件青铜礼器，经化验，平均含铜 80.48%，含锡 16.14%，铅 0.89%。又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剑，经化验含铜 80.3%、锡 18.8%、铅 0.4%。均与上述《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基本相符。而且从现代冶金学理论来分析，也是合乎科学道理的。这不但是中国古代人民铸造青铜器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配比的文

献记载。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与冶铸技术所达到的科学水平。

第二，制范。就是制作铸造青铜器用的陶范。中国古代铸造青铜器主要用陶范，故称为范铸法，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的特点。具体来讲，第一步是制模，就是用泥土制作一件与欲铸造的青铜器同样大小的模型，将花纹和铭文都要在上面刻好。然后将泥模阴干，再用火烘烤使其坚硬。第二步是翻制外范。即将用水和好的夹有细砂及细碎的植物茎干的泥片捺印在泥模上，待半干后，按器物的特点，用刀分割成几块取下，阴干后烘硬，制成为外范。第三步，制作内范。即用泥土照泥模形状而减去欲铸青铜器之器壁厚度制成内范，并将铭文反刻在内范表面，最后加以阴干烘硬。第四步，合范。即将上述已制好的内范与外范组装好，外面用绳索捆好固定，再用厚泥包裹，并在上面留出浇铸青铜熔液的孔道（俗称浇口）及排出范内空气的孔道（俗称冒口）。这时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腔就是将要铸造的青铜器的形状，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

第三，浇铸。就是将已熔化好的青铜合金熔液注入合范之内，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并将已铸好的青铜器进行打磨修整。青铜工具与武器则还要加以锤锻，以进一步提高硬度。

尤为重要的是，在商代又发明了分铸法，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就使铸造青铜器更加简易，从而提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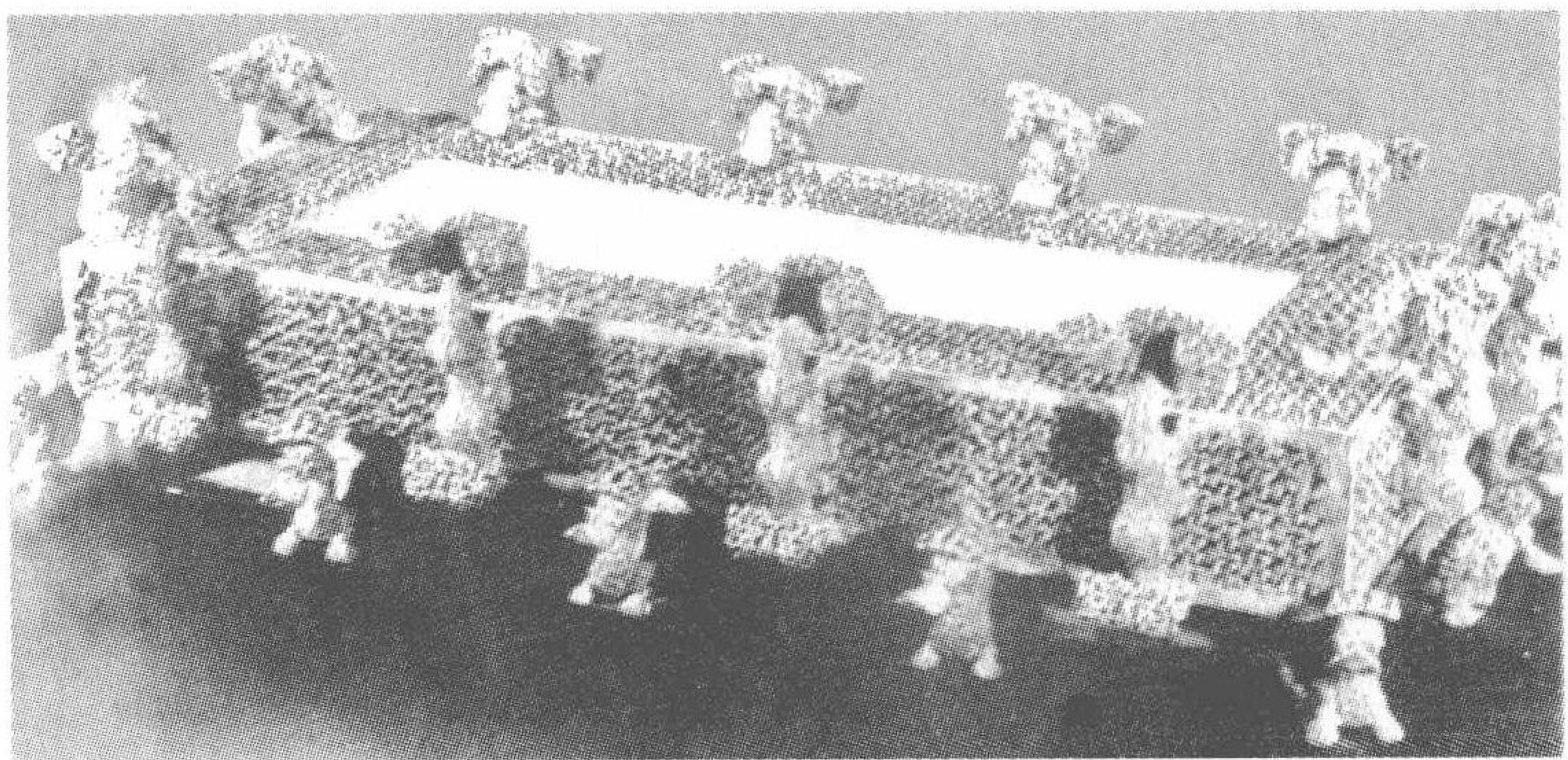


商代青铜鼎铸造示意图

生产效率。并且使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更加繁复壮丽。分铸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先铸造出器物的附件，如提梁、器表装饰的兽头等，然后将其置入器身的合范之中。这样，在浇铸器身时，附件就与器身铸接在一起了。一种是先铸造出器身，然后将附件（如器耳等）的合范放在器身上的

有关部位。这样，在浇铸附件时，附件就附着在器身的有关部位上了。例如著名的商代后母戊（司母戊）鼎，就是采用先铸好两个鼎耳，并将其嵌入鼎身合范之中，然后浇铸鼎身，从而铸成一个完整的后母戊鼎的。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又发明了焊接法。这是将分别铸好的青铜器身及耳、足等附件，用锡镴（là）（锡铅合金）焊接在一起。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莲鹤方壶的兽形器耳、圈足下面的伏兽等都是用焊接法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的。

此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还使用了失蜡法。例如1978 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禁（承托成组青铜酒器的器座），高 28 厘米，长 107 厘米。扁体中空，禁面呈长方形，四周攀附 12 只立雕伏兽，下面有 10 个立雕的兽足。其周边透雕的花纹由内部多层互不连接的铜梗分别支撑，玲珑剔透。经过研究，用上述范铸法是不可能制造的，而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就是首先在泥作的内范的外面敷上一层虫蜡（内掺松香和油脂



春秋青铜禁（河南淅川出土）

等），用这层虫蜡作成欲铸的青铜器的原大模型，并在蜡上面雕刻出精细的花纹。其次，用调好的细泥浆一层层淋上去，最后形成泥质外范。在外范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并预留出浇铸口与出蜡口。然后再加热烘烤，使夹在内、外范之间的蜡模融化，蜡液由出蜡口流出。最后由浇铸口将青铜熔液注入，待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一件青铜器就铸成了。由于虫蜡易于雕镂，因此可以制作花纹层叠、十分繁缛瑰丽的器物。淅川下寺青铜禁的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采用失蜡法进行铸造的国家之一。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还包括高超的表面装饰技术，如镶嵌绿松石、镶嵌红铜、错金银、鎏金以及錾（zàn）刻花纹、漆绘花纹等，使其色彩斑斓，纹饰更加丰富多彩。总之，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是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技术基础。

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商周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汉、唐时期已有零星出土，被专制帝王视为一种祥瑞。例如汉武帝元狩七年（前116）在山西汾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汉武帝因此将年号改为元鼎元年（《汉书·武帝纪》）。到了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以及历史学的发展，加以商周青铜器等古代文物出土日多，日益受到专制帝王及士大夫的重视，公私竞相收藏，于是金石学产生了。金石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商周青铜器及玉器等。出现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fǔ）等的《博古图录》等著录研究商周青铜器、玉器的著作。

清代时期由于专制帝王的提倡，金石学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chéng）《古玉图考》等著作。辛亥革命以后，金石学发展达到顶峰。王国维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是金石学对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尤其重要的是，20 世纪初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室宗庙、商王陵墓，并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玉石器及甲骨文等。从此开始了对于中国商周青铜文化的科学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等。同时，郭沫若通过对商周青铜器及商周社会进行研究，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等。

1949 年后，经过 40 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考古学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作为整个中国考古学体系一部分的商周青铜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和郑州市发现商代初期和中期的都城遗址，并发掘了殷墟妇好墓等大贵族墓葬。在陕西长安沣河两岸发现了西周的都城丰、镐遗址，在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发现了多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次，在河南洛阳、山东淄博、河北易县、河北邯郸、山西安邑、河南新郑、湖北江陵、陕西凤翔等地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齐、燕、赵、魏、韩、楚、秦等国的都城遗址，发掘了安徽寿县蔡侯墓、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国君墓葬以及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出土了曾侯乙编钟等珍贵文物。第三，在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区）普遍地发现了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使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完整体系。第四，除出版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外，对商周青铜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出版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周考古》、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概说》、《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及《殷墟玉器》等。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为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史书上称为“禅让”）为天下的共主。禹死后，废止这种“禅让”制，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夏代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目前关于夏代的物质文化情况，考古工作者正在探索研究之中，争论也比较大，本书予以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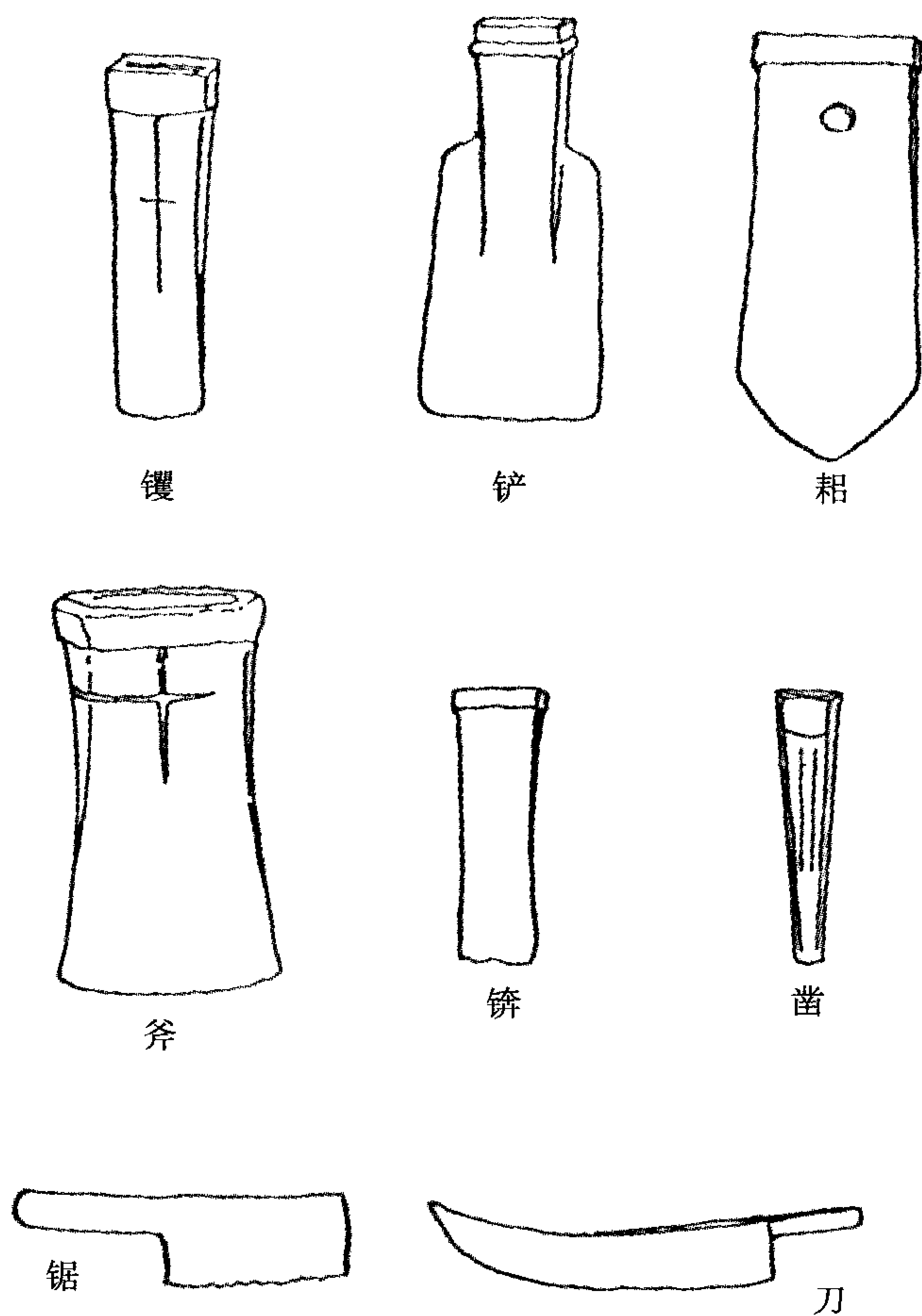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时，夏代最末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时期中国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已经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器类已经具备，造型浑厚，纹饰繁缛，其中酒器特别发达。其他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瓷器出现。城市规模巨大，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随葬了大批的青铜器及其他物品。并且此时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使用

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0 000平方米以上，熔铜炉直径已达0.83米。出土陶范及陶19 000余块，主要是青铜礼器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14米，比著名的后母戊鼎还要大。

这时，尽管石制工具仍在继续使用，但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及手工业生产工具，从而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基础。

商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商代的农业是耜（sì）耕农业，即主要使用耒（lěi）耜来进行农业耕作。中国古代至迟从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开始，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业都是耜耕农业，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农具的逐步使用、牛耕的逐步发展，犁及犁耕农业才出现和发展起来。耜耕农业是用耒耜来翻地起土，进行播种；耕作方式为耦（ǒu）耕，即二人相对，却行（退步）而耕。《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商代青铜生产工具

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使用木耒及木耜（耜头有木、石、骨多种）。《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zhuó）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到了商周时期，除了继续使用木耒、木耜以外，出现了青铜耒耜。耒的形状是上为长木柄，下端一般分为两个齿（尖杈），青铜耒或是在两

个杈尖部位套上青铜耒尖，或者将整个耒端用青铜来制作。这样，由于青铜坚固耐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甲骨文籍字作，正像一个直立的人，手持耒柄、举足踏耒肩刺地之形。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地商代窖穴的土壁上还留存有清晰的商代的耒痕，呈形。从测量可知，耒齿长 19 厘米、齿径 7 厘米、两齿相距 8 厘米。青铜耜上部亦为长木柄，下端为略呈长方形的木质耜身，在耜身的下缘套上一个青铜制的、略呈长方形、扁体中空、弧刃的耜冠。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耜冠，长 16.6 厘米、刃宽约 10 厘米。其使用方式及功效与今天的铁锹相同。

此外，商代的青铜农具还有镢（jué）和铲等。镢，是刨地破土的工具，略呈窄长方形，体厚重，下端为双面刃，上端有方銎（qióng），用以安装曲折形木柄，其使用方法类似今天的镐。1959 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镢，高 16.5 厘米、上宽 5.5 厘米、刃宽 4 厘米。在郑州南关外商代中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里曾出土大量的铸造青铜镢使用的陶范，说明当时青铜镢的产量是很大的。铲，古代文献称作钱，或铫（yáo）。是将土铲平及除草的工具。体呈长方形片状，下端为刃，上部中间伸出短柄，柄上端有长方銎，用以安装直木柄。1953 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铲，长 22.45 厘米、刃宽 8.5 厘米。《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灭纣以后：“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说明商王室是拥有大量的青铜铲的。

在商代，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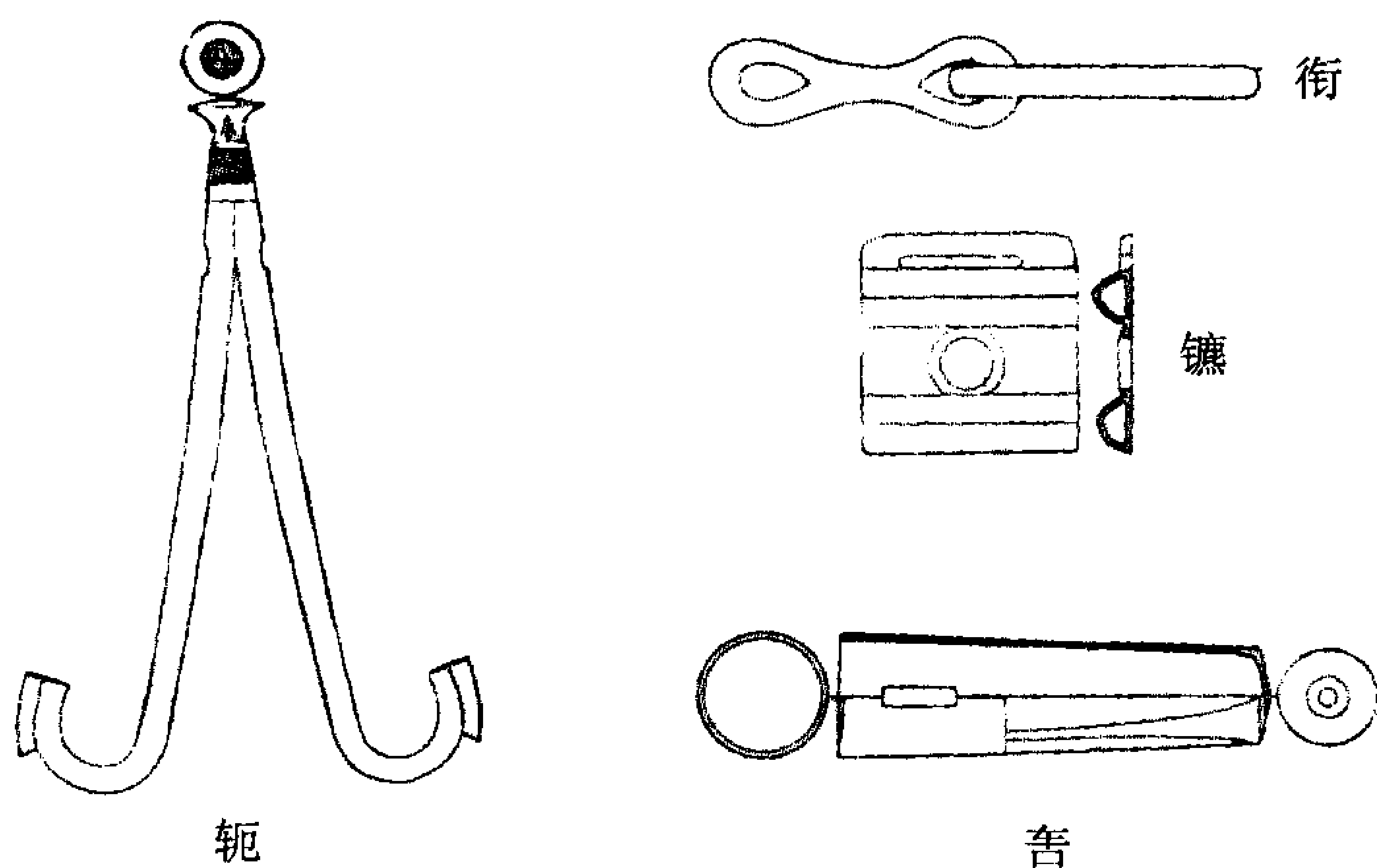
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箭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商代初期铜鱼钩，长约2.7厘米。镞，既是渔猎工具，更主要的是作为武器使用。

商代用青铜制作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锛、凿、锯、刀（削）、锥和钻等，它们主要用于制作木器和木车等。斧，是砍伐工具，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并且，木柄与刃向一致。其使用方法和今天的斧子相类似。有的青铜斧上端侧面有一个半环形耳。例如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斧，长12厘米，弧刃。锛，古代称为斤，用于砍削木料，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刨子。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锛，长13.5厘米，刃宽4.1厘米。凿，体窄长，下端为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直木柄，用于凿孔或开槽。1956年郑州二里岗出土商代中期铜凿，长18.2厘米。锯，用于截断木料或骨料等。河北藁（gǎo）城台西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锯呈刀形，体下刃为锯齿，后部有柄，长14.7厘米，宽4.2厘米，背厚0.4厘米。刀，小的称为削。一般为凹背弧刃，后有直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长约15厘米。同墓出土的铜削，柄端呈圆环状，长13.9厘米。锥，穿孔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商代早期铜锥，体扁平，四棱向前聚成锥尖，长约8.5厘米。上述这些青铜生产工具远比石器锋利耐用，

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广泛使用了青铜生产工具，就使商代的木器制作业、制车业以及骨器牙器的雕刻制作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面就以制车业为例予以介绍。

根据《世本·作篇》等古代文献记载，夏代奚仲发明了车子；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木质易朽，夏代的车子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而商代的驾马的木车在考古发掘中却已屡有发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据以复原商代马车的结构。其特点是双轮独辕（辀），并且是曲辕。即辕的后部（在舆下部分）是平直的，而其前部是弯曲上扬的。在辕的前端缚有木衡，衡上系軛（è），軛夹置于马颈上，用来驾马。商代时大多是一车二马。在辕后部及车轴上面装置乘人的长方形的车厢（舆）。例如1981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晚期的M1613号车马坑，其木车的车辕全长（直线距离）为2.90米，在辕前端约10厘米处缚有一个直木衡，长1.13米。后部车舆宽1.50米，进深1.07米，舆后面中部为车门，宽约0.35米。舆下车轴全长2.94米，直径10厘米。左右两个车轮已受压变形，轮径为1.26—1.45米。每轮共有18根辐条。两轮间距（轨距）为2.24米。

当时为了使车坚固与美观，在木车及马头上配有青铜制作的构件与饰件，称之为车马器。主要有軎（wèi）、軛饰、軏（yuè）饰与踵饰、衔、镳（biāo）及铜泡等。铜軎，略呈圆筒形，套在车轴的两端，然后用木辖（西周时改用铜辖）将其固定于车轴两端，从而防止行进时车轮脱出。铜軏，用于套在辕首上，作为装饰。河南安阳小屯M20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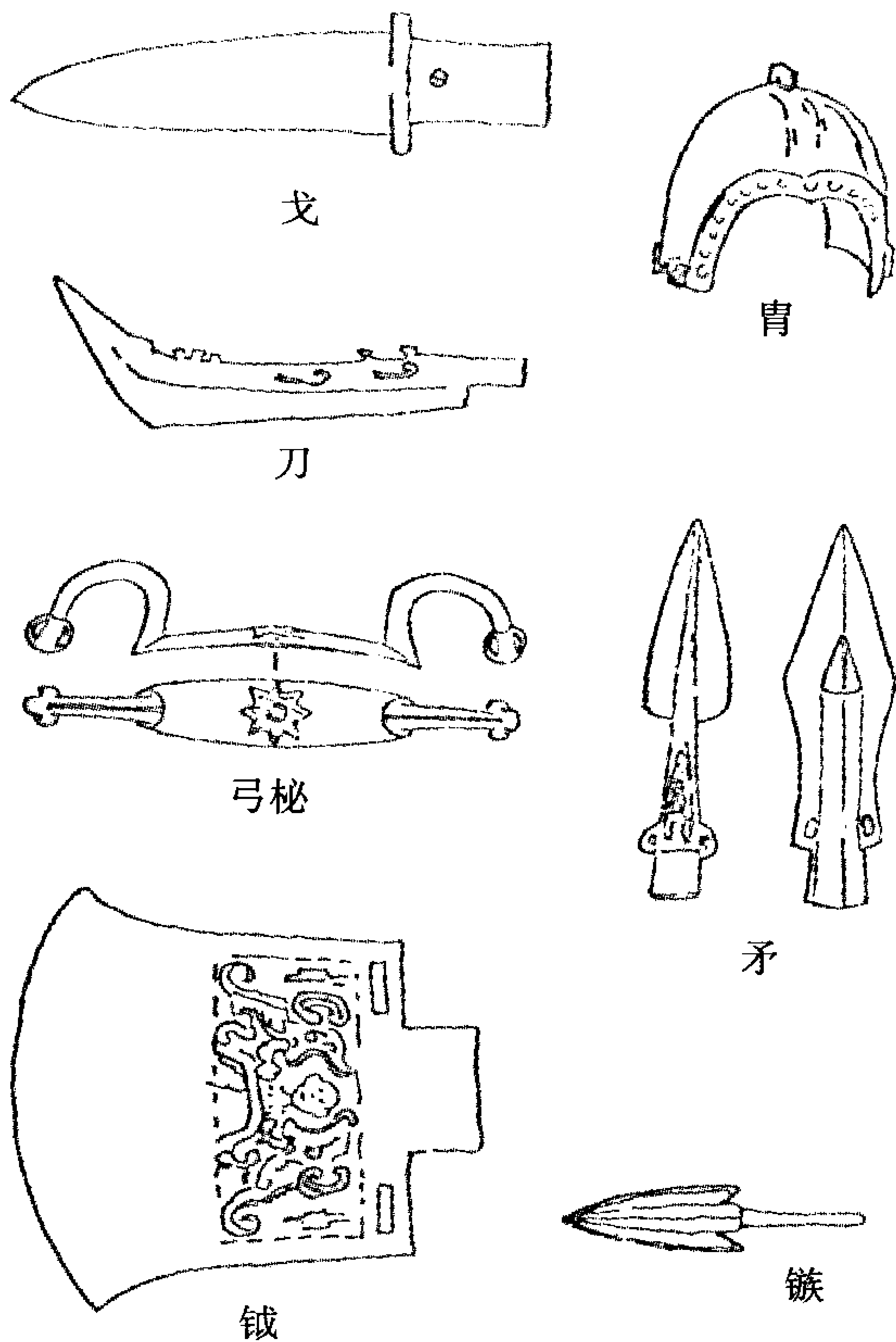


商代青铜车马器

土的铜轭呈兽首形。铜踵，套在辕的末梢上，用以保护辕末。车轭略呈人字形，为铜木合制。轭体軥（gōu）由两木揉曲而成，其上端套有青铜制的轭首及圆箍，其曲而上扬的末端套有青铜轭脚，使其坚固耐用。马衔，俗称马嚼子，由两节两端各有一个圆环的青铜棒连接组成，横置于马的嘴中。在其露出马嘴两旁的圆环上连以马镳。镳衔和缰绳连接，用以驾驭马匹。此外，商代还在马的头部用皮条组成笼头，并在皮条上串上青铜泡或贝壳等作为装饰。在马额正中的大圆铜泡到西周时期发展成为当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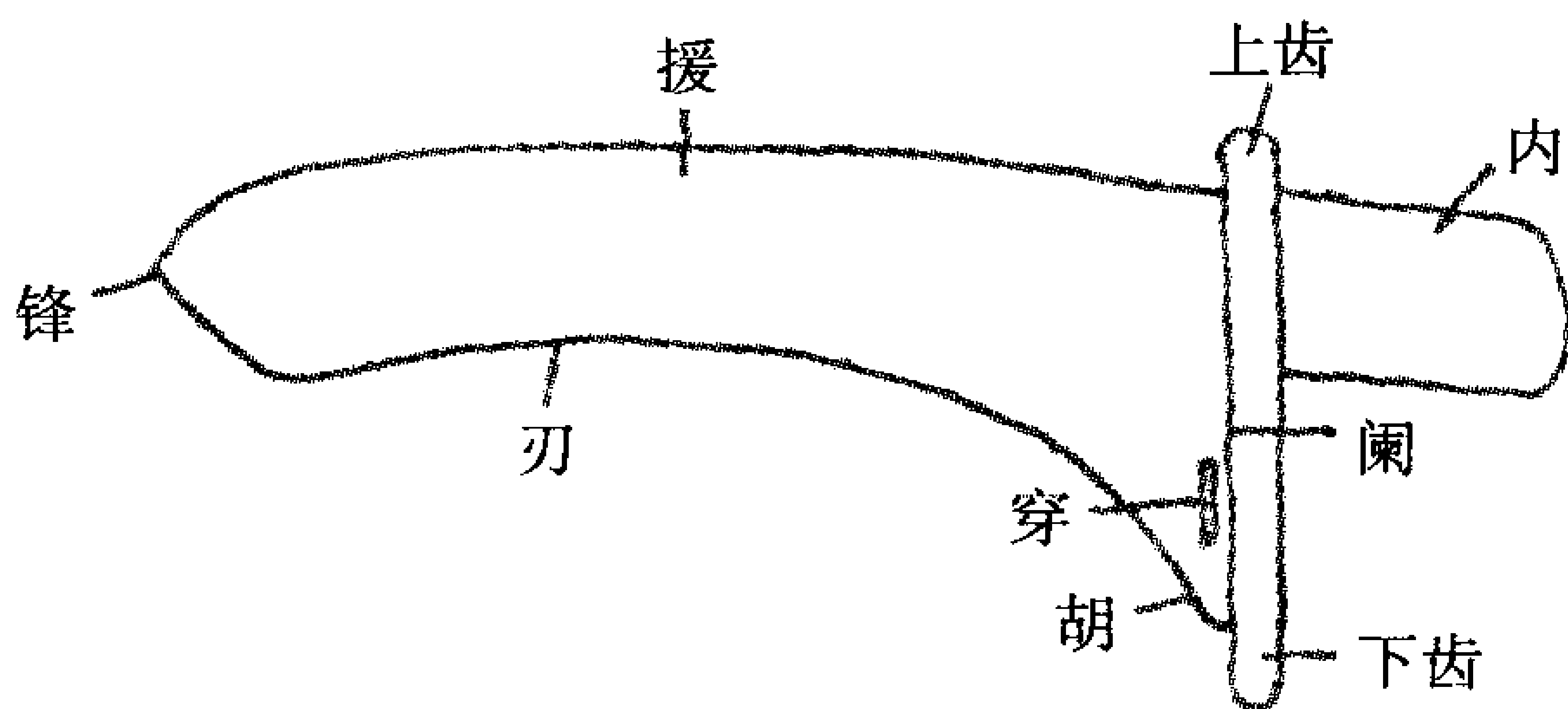
商代的马车已用于作战、田猎及交通等。中国古代的战车以立乘为主，一般乘二三人。中间为御者，主将在其左，武士在其右。中国古代的马车是中国古代人民自己独立发明创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之一。

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考古发现商代的青铜武器有戈、矛、戟、刀、钺、戚、镞、胄及弓柲（bì）等。商代的青铜武器不仅远较石质武器锋利、坚固耐用，而且数量很大。例如在安阳殷墟一座商代晚期的王陵（侯家庄西北岗 M1004）的墓道中，就发现有随葬的青铜戈 722 件和成捆的青铜矛 731 件以及青铜胄 141 件等，说明商王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甲骨文记载，商王一次出兵 3 000 人，甚至多达 5 000 人。



商代青铜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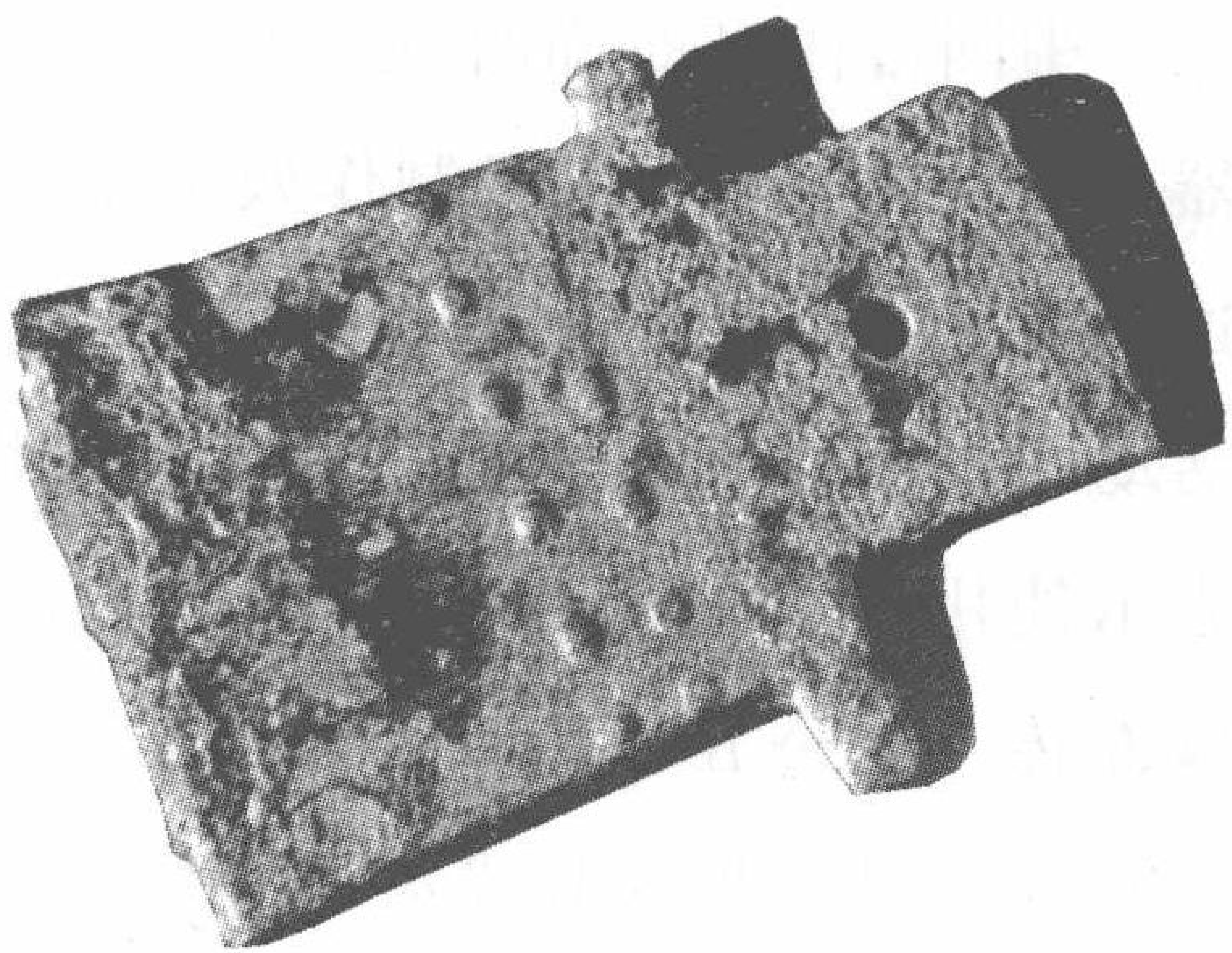
下面分别介绍商代的青铜武器。戈，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青铜武器，可能是由石镰发展而来。是将青铜制的戈头捆缚在长约一米的木柲（柄）上而成，有的上端还装有青铜柲冒（龠）。戈可用于啄击，但主要用于勾杀，所以古称勾兵。商代的青铜戈，前为援，后为内（nà）。其形式主要有直内戈、曲内戈（又分为圆首与岐冠二种）、銎内戈及三角援戈［或称戣（kuí）］等。商末又发展出短胡一穿、二穿的戈等，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



青铜戈各部分名称图

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illegible]字，生动地反映了手持青铜戈的战士的形象。矛，用于刺杀，古称刺兵。商代铜矛主要有凹腰阔叶式及三角圆底叶式两种，木柲长约 1.40 米。戟，由戈与矛（刺）连装组成，既可勾，又可刺。河北藁城台西商代晚期墓葬 M7 出土的一件（柲长 0.85 米），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戟。刀，是用于砍杀的武器。有的很大，刀身较宽，刀尖上翘，背脊上有扉棱。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铜刀，长约 80 厘米，宽约 12 厘米。钺，大斧。体扁平，宽弧刃，用于斩杀。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illegible]字，就是以钺斩首的形象。有的个体很大，制作精美，用以代表商王及其臣属的征伐与刑戮

的权力。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铜钺，平肩，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直内。钺身上部饰双虎欲吞食人头的纹饰，人头置于两个张大的虎口之间。钺身一面中部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长 39.5 厘米，刃宽 37.3 厘米，重 9 公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藁城台西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铁刃铜钺。藁城台西铜钺，残长 11.1 厘米，宽 8.5 厘米。钺身用青铜制成，并饰有两排乳丁纹。刃部已残，经鉴定系用陨铁锻打而成。说明中国人民早在商代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弓箭，是远射武器。弓及箭杆一般用竹木制作，不易保存。商代的箭头（镞）一般用青铜制作，主要是宽双翼式。镞是一种消耗性武器，商代用青铜来制作镞，反映当时青铜的生产量已是相当大的了。胄，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头盔，是保护头部用的。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胄，一般高 20 厘米，重二三公斤。有的胄面上铸有虎纹，有的顶部有圆管，可以插丝缨或羽毛。商代的青铜武器中常见的还有一种弓形器，可能是弓柲，用以缚在弛弓的外面，以保持弓的弧度。此外，安阳殷墟还发现有商代的盾，略呈梯形，盾面弧凸，高 80 厘米，上宽 65 厘米，下宽 70 厘米。四周


商代铁刃青铜钺（河北藁城出土）

为木框，背面正中有握手。上面蒙皮，涂漆，并绘有虎纹。

二　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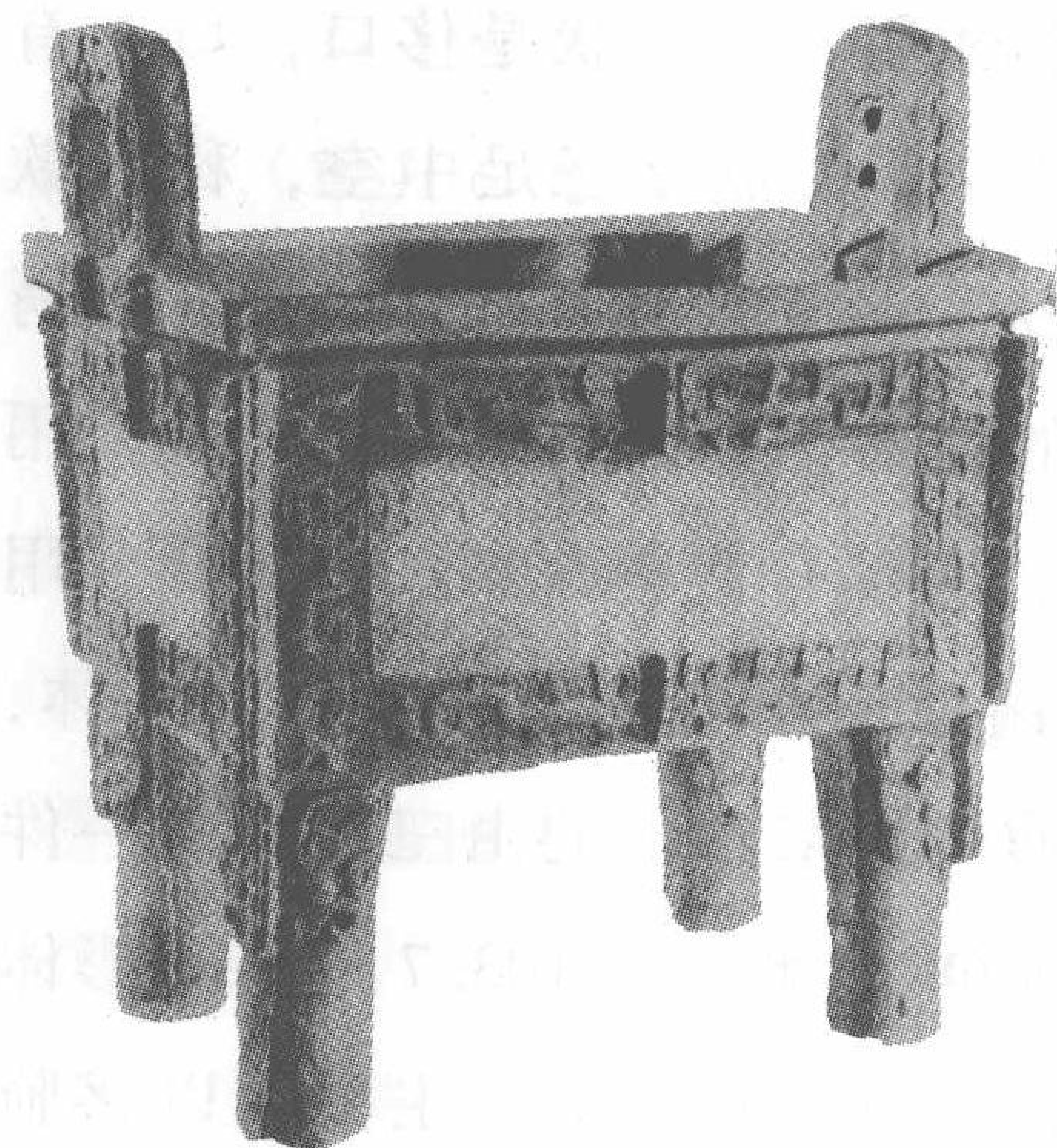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份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青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

圆腹、两耳、三足，少数是方形四足，或分裆袋足。鼎主要用于煮肉和盛肉，是古代华夏族最主要的食器，是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左传·宣公三年》等古代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前606）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í）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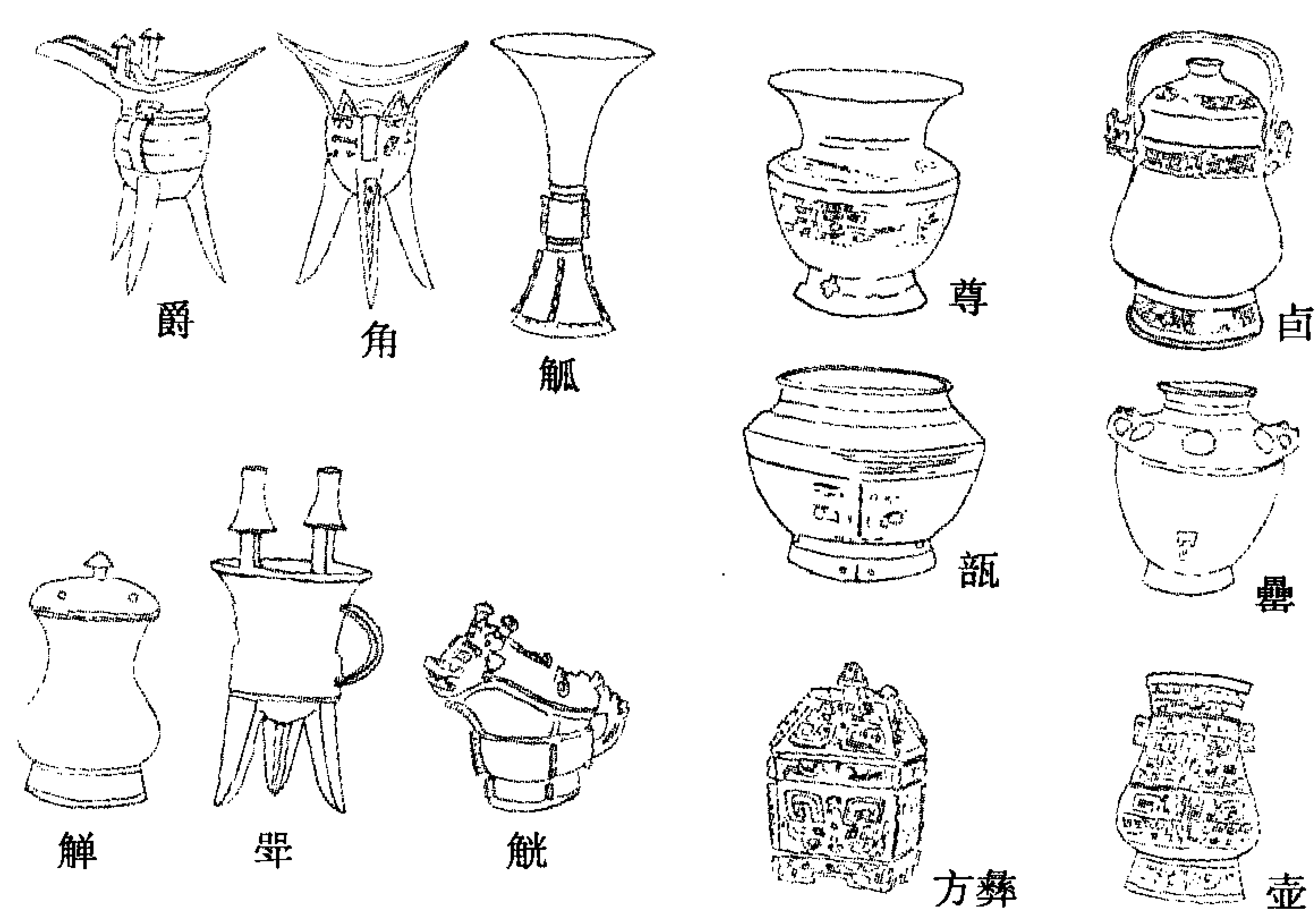
商代司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

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其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guǐ）、鬲（lì）、甗（yǎn）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袋）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甗，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èng），底部有铜箅（bì）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期已有青铜甗，大多是甑和鬲连为一体，一次铸成。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及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体巨大，一次可蒸三种食物，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腌菜、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

少，商代晚期开始出现。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仪狄或杜康（少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酒是重要的饮料，系用粮食或水果发酵制成。酒的发明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古代文献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gū）、觯（zhì）、斝、觥（gōng）及盛酒器尊、卣（yǒu）、瓿（bù，又读 pǒu）、罍（léi）、方彝和壶等。爵，是古代饮酒器的共名。作为专名是指一种侈口、圆腹、前有出酒的流、后有尖圆的尾、



商代青铜酒器

口沿上靠流处大多有两个小柱、腹侧有手执之鋬（pàn）、腹下有三个扁棱足的饮酒器。有的无柱或单柱，或方腹四足，或有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爵。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中就出土了40件青铜爵，其中一对大型的妇好爵，高达37.3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鸟纹及兽面纹。角，数量较少。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形状似爵，前后皆为尾而无流，无柱。安阳殷墟1022号墓曾出土一件牛角状的青铜角，有盖，口侧有一个贯耳，可以系带。斝，形状亦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二柱，而无流及尾。也有的为方腹四足，或分裆三袋足。王国维《说斝》（《观堂集林》卷三）认为斝即《周礼》等古代文献所记之散。或认为斝是行祼（guàn）礼时盛酒洒地以祭之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圆斝四件、方斝八件，其中最大的妇好方斝高达68.8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兽面纹。觚，高体，侈口，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经常与爵相配成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觚多达53件。觯，形状像今天的小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般为侈口、敛颈、椭圆腹、圈足，有盖。觥，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圈足，上有盖。是饮酒器中最大的，而且制作十分精致，纹饰繁缛。《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郑玄注："觥，罚爵也。"觥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觥八件。其中妇好觥二件成对，通高22厘米，通长28.4厘米。盖前端呈立雕虎头形，后端作鸮（xiāo）

头。器身前部饰浮雕的虎身，后部饰浮雕的鸮身。盖与器扣合在一起，则前视呈蹲坐的老虎形，后视则呈站立的鸮形，设计构思十分巧妙。1959 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器腹饰龙纹及鼍（tuó，扬子鳄）纹，构思奇特。高 18.8 厘米，长 24.1 厘米。尊，既是盛酒器乃至礼器的共名，又专指一种重要的用于奉献的盛酒器，器型高大，纹饰精美，数量众多。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尊的形状多为圆腹，圈足。有的大侈口，折肩；有的侈口，圆弧腹似觚。此外还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鸮、象、牛、羊等，称为鸟兽尊。商代中期青铜尊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尊十件，其中圆尊五件、方尊三件、鸮尊二件。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小臣俞犀尊，高 24.5 厘米，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造型十分生动。卣，《诗经·大雅·江汉》："釐（xī）尔圭瓒（zàn），秬（jù）鬯（chàng）一卣。"秬鬯是香酒，因此，卣是专门盛香酒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考古发现，卣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大多是椭圆形腹，下有圈足，口上有盖。其特点是上有提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提梁卣两件成对，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盖钮作立雕的鸟形，提梁两端作立雕的龙头形。颈、腹及圈足满饰兽面纹。高 36.4 厘米。此外，也有的卣整体做成鸟兽形。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做成一只蹲踞的老虎形，两只前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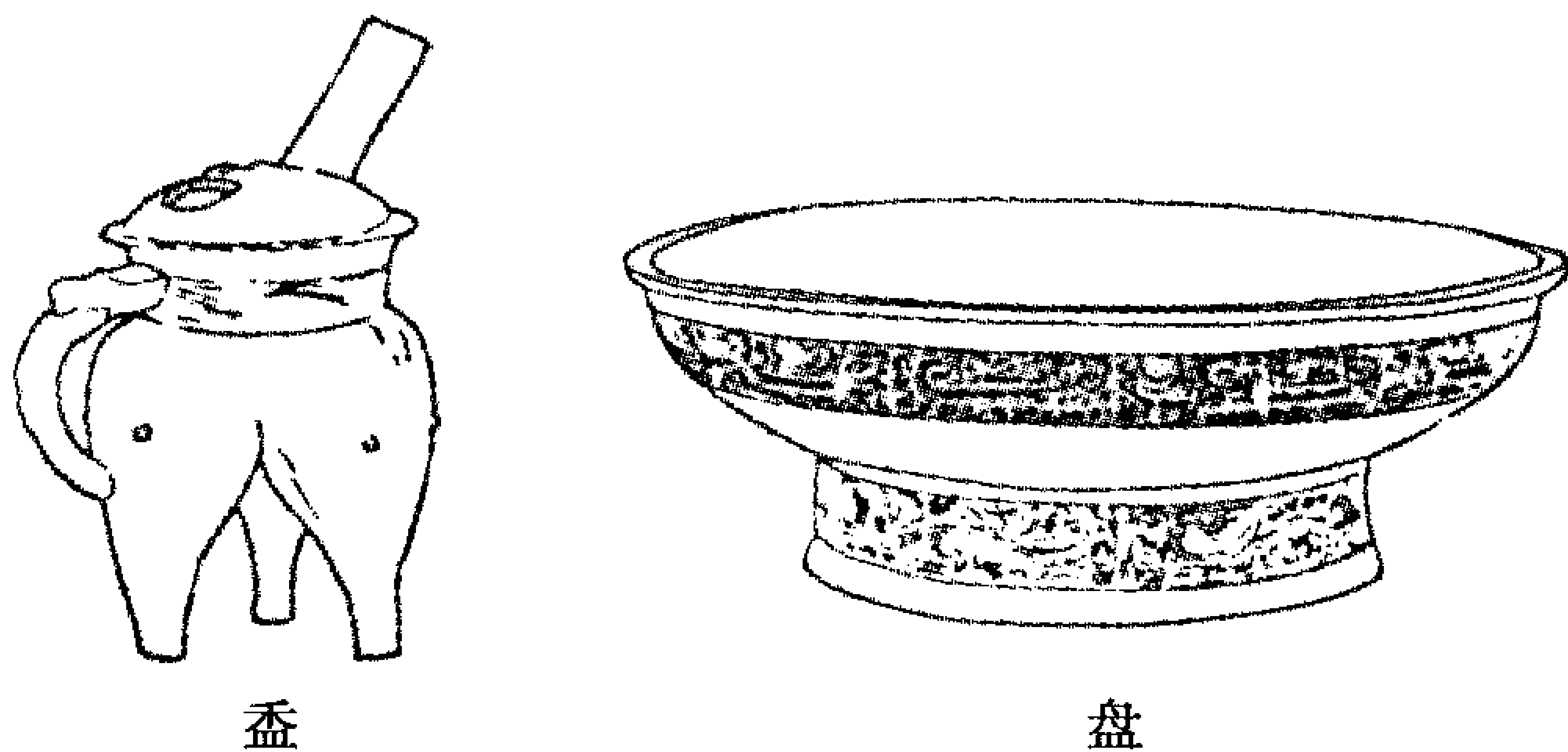
正抱持一人，张开大口，作欲吞食之状，寓意神秘。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及龙纹等。高 32.5 厘米。瓿，或称瓺（piān）。形状像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有的有盖。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瓿三件。其中二件妇好瓿成对，有盖，腹饰兽面纹及夔纹，高 34.2 厘米。罍，大型盛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供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商代中期青铜罍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方罍两件成对，直口，弧肩，深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半圆耳，腹下部有一个鼻钮。有盖，盖钮呈屋顶形。肩部饰夔纹，腹部饰涡纹及三角形夔纹。高 52.5 厘米。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是专指一种长方体、下有圈足、上有盖并且盖及盖钮呈屋顶形的盛酒器。大多通体饰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五件。其中一件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在一起，呈长方形。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亦呈屋顶状。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



商代虎食人卣（传湖南安化出土）

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体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高 60 厘米，长 88.2 厘米。壶，大型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大多呈椭圆形，微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个贯耳，以便系绳提携。有盖。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壶两件成对，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与夔纹。高达 50.9 厘米。此外，还出土方壶两件。

由于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并且，如《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所以在青铜礼器中还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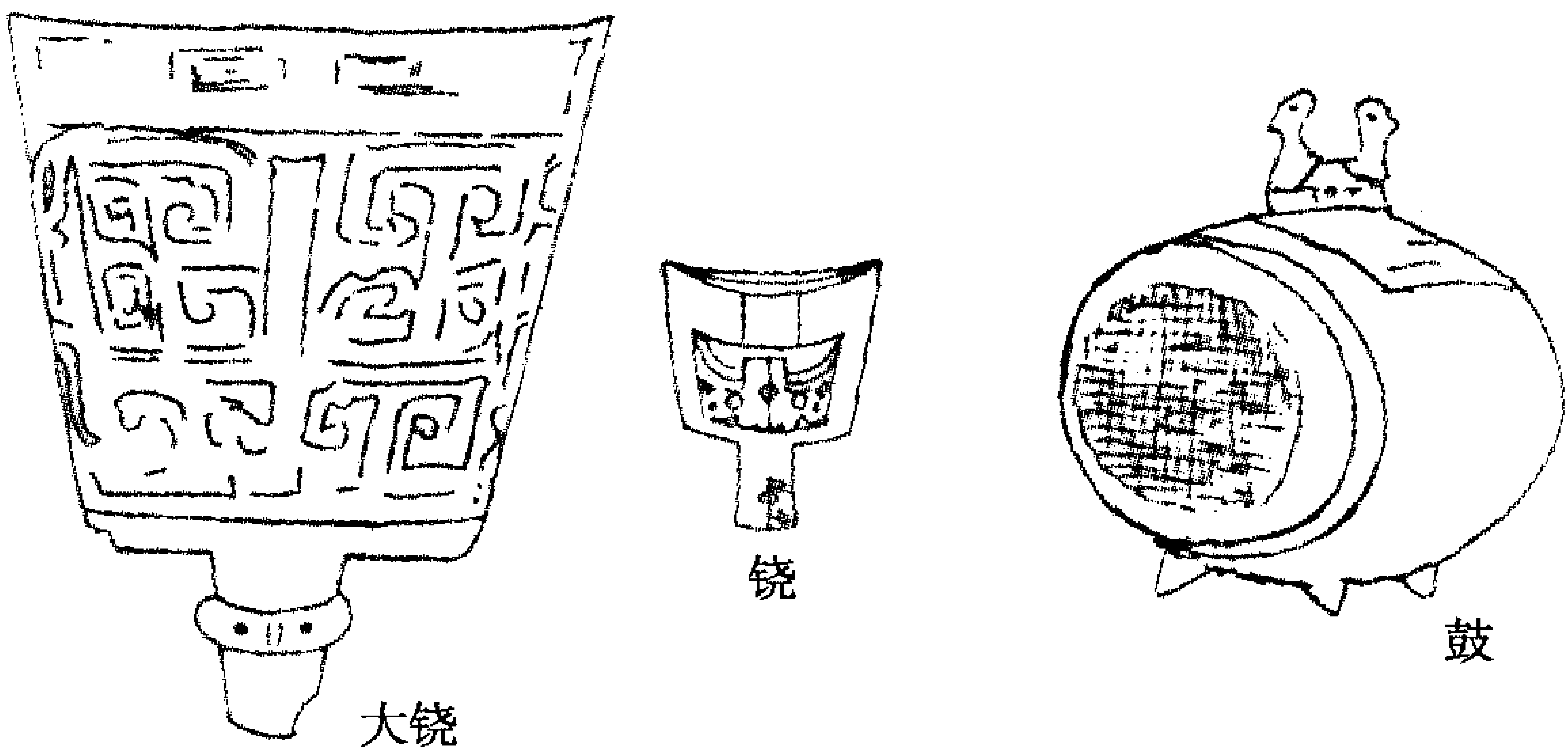


商代青铜水器

器一类。商代水器主要有盉与盘。盉，是盛水以浇手的用器；亦可以往酒器爵等之中注水，以节（调和）酒之浓淡。形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初期的青铜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锥形空足。商代晚期也有方腹四足的青铜盉。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出土的铭文为“左”、

"中"、"右" 三个方盉，十分精美。盘，用以承接盥洗后之弃水。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的青铜盘多为圆形，浅腹，高圈足。有的盘口沿装饰有立鸟。盘底多饰有龙纹、龟纹和鱼纹。

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认为乐是谐和的，是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古代贵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配合，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显得文质彬彬。所以广义的礼器中还包括乐器一类。商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是铙、铃和鼓。铙，是一种敲击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执柄而击。安阳殷墟出土的，个小，三个或五个一组。南方湖南、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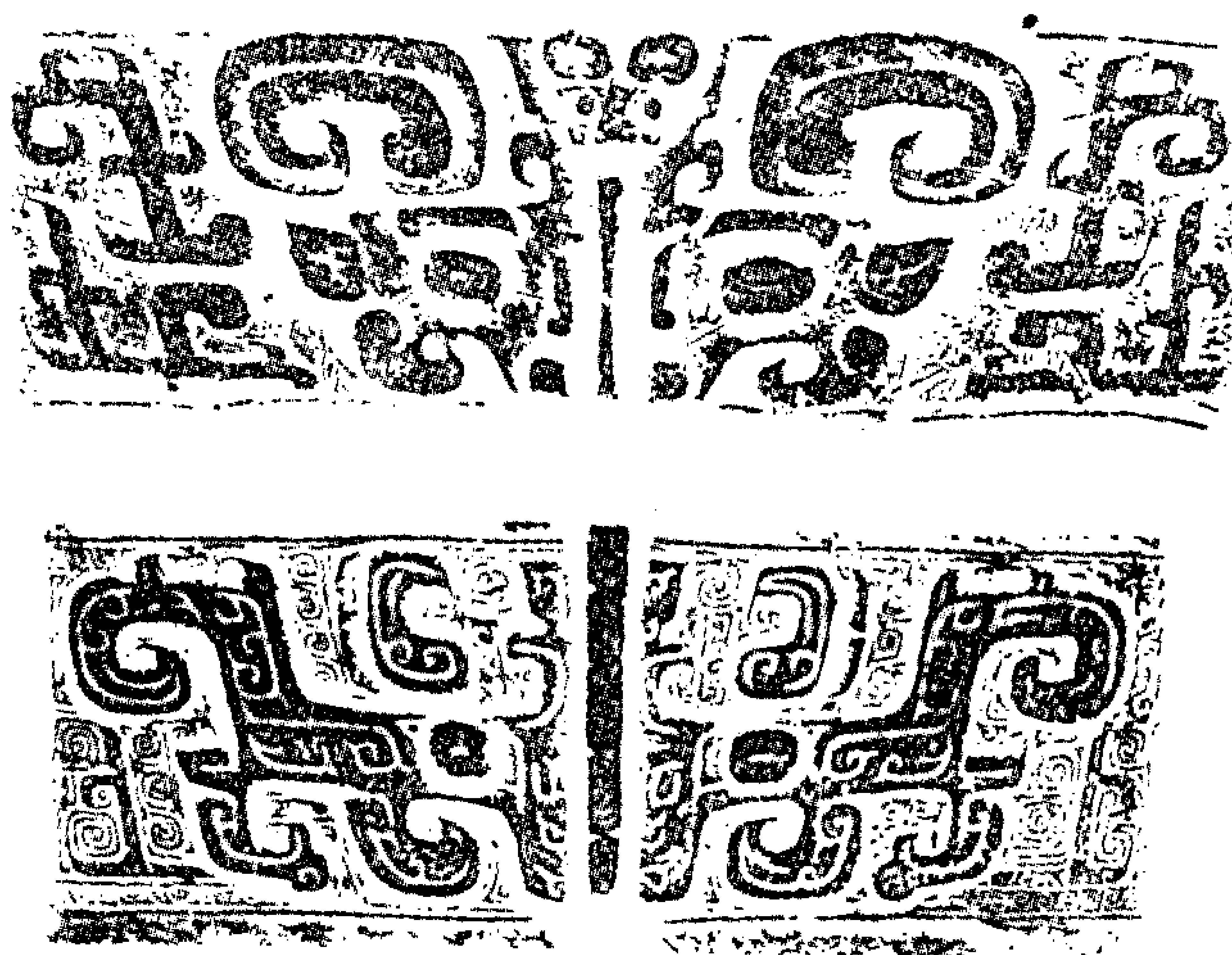


商代青铜乐器

浙江等省出土者，形体巨大，要竖立在木柱上来使用。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大铜铙，高 103.5 厘米，重达 221.5 公斤。铃，是目前发现的出现时代最早的青铜乐器。1962 年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顶部有小钮，侧面有单翼，高 9.4 厘米。鼓，一般为木质，安

阳殷墟大墓中曾发现蟒皮面木鼓的遗痕。青铜鼓的形制仿木鼓，发现很少。1977 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青铜鼓，鼓面铸出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 75.5 厘米，鼓面直径 39.2 厘米。

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细密的云雷纹



青铜器兽面纹

作为地纹，再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龙纹、夔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兽面纹（或称

饕餮（tāo tiè））最为常见。古代文献记载，饕餮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或认为饕餮是古代一种凶残的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饕餮纹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巨睛凝视，令人望而生畏。龙是古代华夏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奇异的动物。1987 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砌的龙，距今已有 6000 年。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夔，如龙一足。大多作侧视之形。凤鸟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鸟王，有华丽的冠及尾羽。

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称为彝器款识、钟鼎文。商周金文数量众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达 12 000 件以上。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单字约有 3 700 字，已识者约为 2 400 字。金文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文字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一般一件器物上只有几个字。内容大多是标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庙号）。例如：“[illegible]（子）父乙”。“子”是作器者的族氏。古代文献记载，商族子姓。“父乙”是被祭者（其父）的庙号。总之，这是表示这件青铜礼器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

述的小臣俞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巳），王省夒㕙，王易（赐）小臣俞夒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róng）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夒地，用夒地的贝赏赐给小臣俞。这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zhé）明显，被称为波磔体。

三 原始瓷器的出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并有了高度的发展。到了商代，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各种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陶业也不例外。当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日常用器仍以陶器为主；此外，陶器还普遍用于随葬。商代的陶器从陶质来说，主要有夹砂及泥质两种；器类主要有用于炊煮的鬲、甗，用于盛食的簋、豆，酒器爵、斝、觚，以及盛储器盆、罐、大口尊等。表面颜色以灰色为主，并多拍印有绳纹。在河南郑州铭功路曾发现商代中期的制陶作坊遗址，在约1 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圆形陶窑14座及房基10余座，出土大批烧流的残毁陶器及制陶工具陶拍子及陶印模等。

在制陶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尊，侈口，敛颈，折肩，圜底，肩部和腹部拍印细方格纹。高11.5厘米，口径10.3厘米。胎呈青灰色，细腻坚硬，经化验系用高岭土制成，上施一薄层淡黄绿色釉。烧成温度在1 200℃左右，已基本烧结，质地硬，吸水性弱，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瓷器，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商代原始瓷尊（河南郑州出土）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刻纹白陶，也是用高岭土作胎，烧成温度在1 000℃以上，器形与花纹都是模仿青铜器，有鼎、簋、豆、爵、尊、罍等。例如郑州出土的刻纹白陶豆，大口，浅盘，矮粗柄，盘腹刻饰云雷纹，柄刻饰圆涡纹。高13厘米，口径22.5厘米，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此外，商代还有少量硬陶器，有罐、瓿等。

四　精美的玉石器

在商代，虽然青铜工具已经广泛使用，但是，石器仍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等在生产中仍然

发挥着重大作用。此外，安阳侯家庄西北岗 M1001 王陵出土的白色大理石虎首人身跽（jì）坐雕像，背后有槽，可能是木柱旁的装饰。还有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纹石磬（qìng），长 84 厘米，宽 24 厘米，厚 2.5 厘米，悬挂敲击，声音清越，是一件精美的乐器。

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并有一定发展的玉器，到了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是商周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时玉料基本上已是新疆和阗玉。大部分是青玉，以绿色为主，还有少量的白玉和青白玉，均属透闪石、阳起石软玉。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了玉器 755 件，主要有圭、琮、璧、璜、玦、瑗、环等礼器，钺、戈、矛、戚、大刀等仪仗用品，笄、柄形器及各种佩饰等。其中各种圆雕或平雕的人物以及虎、象、熊、龙、鸮、鹰等动物形象尤其生动，线条流畅，表明琢玉技术与抛光技术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一件站立的双面玉人，淡灰黄色，高 12.5 厘米，宽 4.4 厘米，厚 1 厘米。裸体，头上有双角，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是这一时期玉器的代表作。



商代双面玉人
（河南安阳出土）

五　雕花木漆器及骨器牙器

漆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漆器。商代，由于青铜手工工具的广泛使用，使木器和漆器的制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雕刻出精美的花纹。但是，木漆器易朽，不易保存，发现很少。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安阳殷墟奴隶主贵族墓葬中都发现了雕花木椁板的痕迹。在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漆器。在河北藁城台西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盘、漆盒残片，薄板木胎上雕刻有兽面纹、夔纹和云雷纹等，上漆朱红地黑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绿松石。在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豆、漆罍等，上饰兽面纹、圆涡纹等，有的漆器上还镶嵌有蚌壳、蚌泡及玉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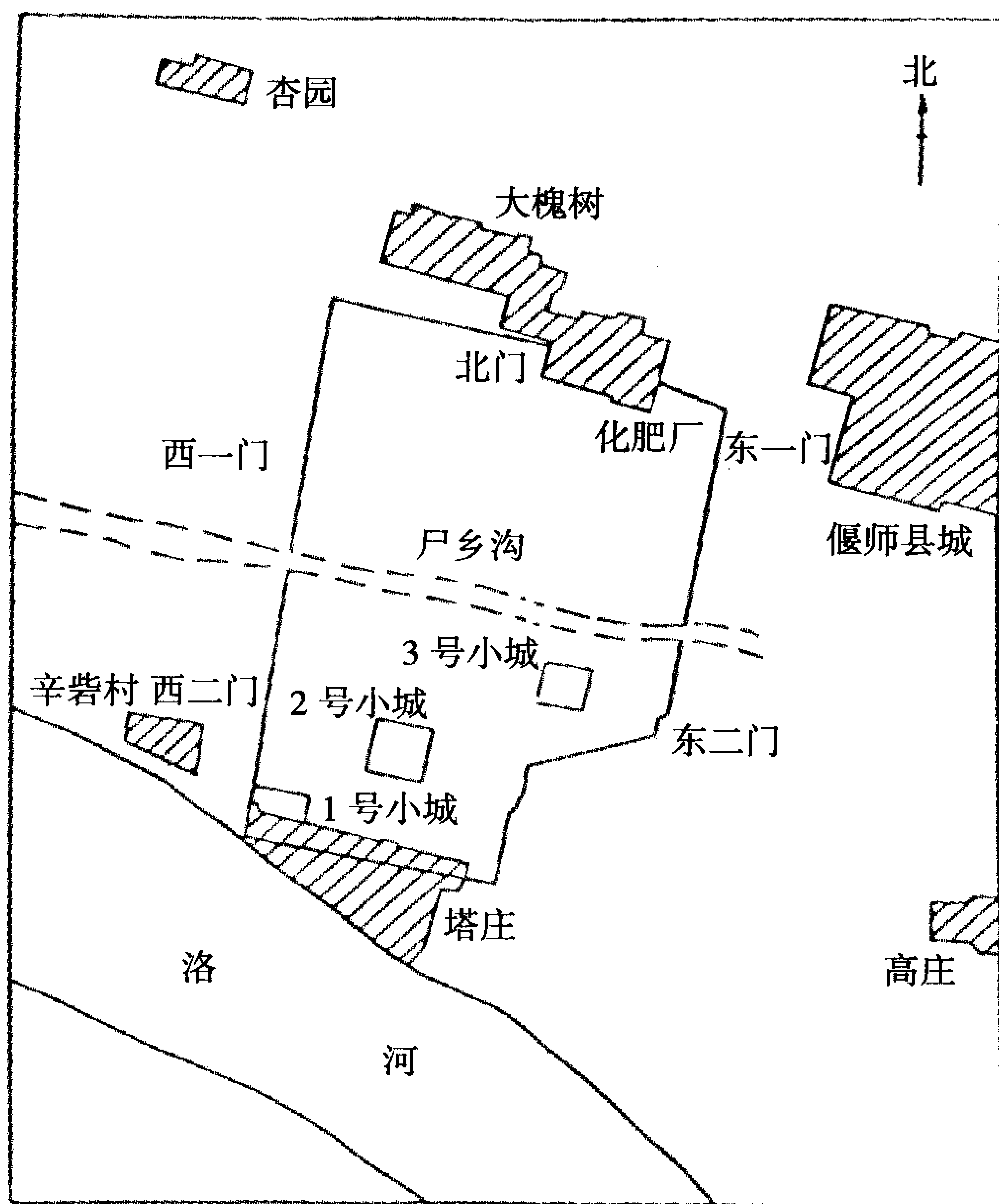
商代的骨器在生产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有用于狩猎或战争的骨镞，用于束发的骨笄以及生活用品骨锥、针、柶（sì）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的一条濠沟中发现近百个被锯开的人头骨，并在距此不远的商城北墙外商代制骨作坊中发现了大量的人肢骨与肋骨，这些都属于制作骨器的原料，深刻地反映了奴隶社会的残酷。此外，制作骨器的原料还有牛骨与猪骨等。制作骨器的工具有青铜刀、锯、钻以及磨制骨器的砂岩砺石等。

锋利的青铜工具的使用，又使商代的牙雕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郑州白家庄商代中期墓葬中曾出土象牙觚和象牙梳。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系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其中一对夔鋬杯，高30.5厘米，杯身细高似觚，通体雕刻兽面纹等，并嵌以绿松石。另一件是带流的虎鋬杯，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此外，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鹿角、蚌刀、蚌镰等。

六　规模巨大的城市

城市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早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到了商代，更由于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土木工程有了很大发展，使城市规模扩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城市遗址，尤其是都城遗址，在1949年以来的考古工作中已有重大发现。1983年在河南偃师县西发现了商汤的都城西亳（bó）遗址。城址南临洛河，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最长达1 710米，东西最宽达1 240米，总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厚17—19米，残高1—2米。已发现北城门一座，西城门二座，东城门二座。1984年发掘了东二门，门道长19.4米，宽2.4—3米。在门道下0.4米处发现了用石块及木盖板砌筑的排水沟；向西通往宫城，全长达800余米。城内发现有几条纵横交错的干



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平面图

道。在城内南部发现三座方形的小城。居中的二号小城，可能是宫城，平面略呈方形，每面长约200米。夯土围墙厚约2米，南面有一座大门。小城内有数组封闭式的建筑。现以位于宫城内中部偏东的四号建筑为例，东西长约51米，南北宽约32米。北部为正殿，坐北朝南，建于长方形夯土台基之上，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南部有四个台阶。其东、西、南三面为廊庑围绕，中间为庭院。南部廊庑中部偏东为大门，门道宽2.1—2.4米。西面廊庑北部还

有一个宽约1米的侧门。城内出土有青铜斝、尊、戈、刀和玉器以及大量的陶鬲、斝、大口尊等。此外，在尸乡沟西南约6公里的二里头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宗庙宫殿遗址以及较大型贵族墓葬等。

1955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áo，又作嚣）都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周长6 960米，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最高处达5米。在四面城垣上共发现11处缺口，有的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内中部偏北及东北部为宫殿区，发现了20余处夯土基址，最大的有2 000余平方米，上面残存有柱穴及柱础石。近年来又发现了宫城夯土城墙以及地下供水管道、汲水井及蓄水池等。在城外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陶、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遗址以及墓地及窖藏等。例如在南关外发掘的铸铜遗址，发掘面积达1 050平方米，出土了熔铜坩锅残片及1 000余块陶范，其中以镬范和镞范为最多，说明当时青铜生产工具的制造是大量的。1974年在城西杜岭张寨南街出土了两件青铜大方鼎及一件青铜鬲，其中最大的一件青铜方鼎高达1米，重86.4公斤。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外侧约700—1 200米处，又发现了一道夯土城墙，可能是外城的遗迹。又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发现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及濠沟等，出土青铜建筑构件、石磬、石圭、石祖及陶缸、原始瓷尊等，并在陶缸表面发现朱书文字，可能是商王祭祀建筑遗迹。此外，在湖北黄陂盘龙

城及山西垣曲古城等地也发现了商代中期的城址，发现有夯土城墙、宫殿建筑基址及墓葬等，并出土了青铜礼器及兵器等。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直至商代灭亡，在273年间没有再迁都。考古工作者从1928年起在安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证实在今安阳西北以小屯村为中心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殷墟之所在。在这里已发现了数十座成组的宗庙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以及商王的陵墓和一般贵族与平民的墓地等。宗庙宫殿建筑基址在小屯村东北地，其东面及北面为洹河环绕，其西面与南面有一条长达1 750米的大濠沟护卫。这些建筑基址自北而南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乙组可能是宗庙建筑。它们均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有长方形、近正方形及凹字形等，规模巨大。例如乙组八号基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并且在基址上下及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仪式而杀人杀牲的葬坑。例如在乙组七号基址前（南）面发现了宗庙建成以后举行祭祀典礼时杀人或埋车马的成排的葬坑。其中人牲即达数百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庙宫殿建筑基址上不仅发现了巨大的石柱础，而且在石柱础上发现了放置的铜碛（zhì）。例如在甲组11号基址就发现了11个檐柱的铜碛，呈扁圆形，直径约15厘米，厚约3厘米，上面微凸，下面微凹，容易放平。铜碛有隔潮作用，利于

保护木柱。铜础的使用，也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业的发达。

与商王的宗庙宫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宫殿宗庙区四周的大司空村、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等地发现的广大平民和奴隶居住的房子，却大多是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即先向地面下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一般面积约 10 平方米左右。就以坑壁为墙，周围或有台阶可以上下。室内有灶坑，上面用茅草作屋顶。狭小潮湿，仅能容身而已。此外，在殷墟遗址南部的苗圃北地、西部的北辛庄等地，发现了当时的冶铜、制陶及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

七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主贵族墓葬

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生前拼命压迫剥削奴隶，而且还要让奴隶给他们修建巨大的坟墓，随葬大批青铜器等供他们死后享用。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分布在安阳小屯村西北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现已发现 13 座大墓。可分为东、西两区。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长方形，有四条、二条或一条墓道。规模巨大。例如 M1001 号大墓，墓口呈亚字形，南北长 18.9 米，东西宽 13.75 米，墓室深 10.5 米。在墓室中用木板建成高约 3 米的亚字形椁室，中置木棺。在墓室的东、南、西、北有四条墓道，墓

室加墓道总面积达712.75平方米。在王陵中均发现有大量的殉葬人。以1950年发掘的安阳武官村大墓为例，在墓室中发现有殉人45个，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和姬妾；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34个，可能是埋祭时被杀的人牲。王室贵族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物品。以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葬为例，共随葬有青铜器460余件，玉器755件，骨器、牙器560余件以及陶器、蚌器等，共计1 928件，此外还有海贝6 800余枚及海螺2枚。青铜器中有礼器210件，其中有方鼎5件、圆鼎26件、甗10件、簋5件、方彝5件、尊10件、壶4件、卣2件、方罍2件、斝12件、觯2件、觚53件、爵40件、觥8件、盉6件、盘2件及编铙一组5件等。圆鼎中两件成对的有三套，6件成组的有两套。从总体上来看，以酒器为最多；在酒器中又以饮酒器爵和觚为最多，合计为93件，占全部礼器的44.6%。这有力地说明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主，这也是商人酗酒的具体物证。

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区内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场，南北宽约250米，东西长约450米。历年来共发掘了祭祀坑1 400余座，估计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祭祀坑因为排列整齐，又称为排葬坑。大多数坑中埋人牲，少数埋马、狗或车子等。埋人牲的坑多为长方形，一般长约2米、宽约1米，大多排放着10个人。坑内所埋人牲有全躯的，也有的是无首躯体。另有一种方形坑，长宽皆为1.5米，是专埋人头的。据研究，这里是商王祭祀祖先的

场所，所用人牲大部分是青壮年战俘，其中最多的是羌人。一次祭祀最多时要杀三四百人。累累白骨鲜明地反映了商代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奴隶主贵族对社会劳动力恣意地进行杀戮摧残，这也是商代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

商代晚期中小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的墓地，可以安阳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作为典型代表。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了 939 座墓葬。大多是小墓，长约 2 米，宽不到 1 米，埋葬着一人，有木棺及随葬品。此外还有少数较大的墓，并有少量殉葬人。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可以分为八个墓区，每区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组群。各区的墓葬不仅在随葬品的种类等方面有所差别，例如有的区多用陶鬲随葬，而有的区陶鬲则很少。而且在随葬的青铜器上分别铸有不同族氏的铭文。这说明各个墓区分别属于不同的族氏。这种商人"族墓地"的发现，反映了商人生前是聚族而居，死后同族合葬在一起，说明在商代血缘关系、宗族纽带还是十分强烈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至于奴隶则是无所谓墓葬的，他们生前像牛马一样被奴隶主奴役，而最后或被当作殉葬人，或被作为人牲杀死，或死后被随意抛置。除上述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殉葬人或被杀祭的人牲以外，在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的被弃置于垃圾坑中的、甚至是被肢解了的人骨，正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写照。

八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数百年之久了，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作为典型代表。甲骨文是189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被发现的，迄今已经出土了10余万片。其中1936年发掘的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甲骨17 096片，是殷墟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尤其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甲骨7 000余片，其中刻有卜辞的有4 589片，而且地层关系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91年又在花园庄东发现了一坑（H3）甲骨，共计1 583片，其中完整的有卜辞的龟甲近300版，一版多者达200余字，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甲骨文又称为卜辞，主要是商代晚期占卜以后刻在乌龟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等上面的文字，也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的单字约有4 500字左右，目前已经认识的还不到1/3。甲骨文中不仅已经有了象形、会意、指事等文字，而且形声字已占了不少的比重，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基本发展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农业生产受年（祈求丰年）等的记载，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历象的记录，有关于征伐土方、人方等

方国的记载，有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有商王祭祀祖先之时杀戮人牲的记载，又有关于田猎、疾病等等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的出现也与青铜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青铜钻，呈菱形柱状，下端为圆弧形刃，长 5.5 厘米，刃宽 0.8 厘米，与同出的牛卜骨上的圆钻孔正好相合，说明这是用于钻凿卜骨的工具。

除了甲骨文以外，前面已经谈到，在商代青铜器上也铸有文字，我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简称金文，其基本结构与甲骨文是一致的。到了商代末期有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长达 50 字的记事性铭文，同样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在玉器、石器或陶器上，也发现了少量的刻画或书写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器、石器等上面曾发现墨书或朱书的文字，而且笔锋清晰，这是当时已经使用毛笔书写的有力证明。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商代末年，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周族逐渐强大起来。由于商朝最后一个王——纣十分荒淫暴虐，引起广大平民及奴隶的强烈不满，纣又连年征伐东夷，首都空虚。公元前1045年3月，周武王乘机率领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甲子日两军在牧野对阵，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周朝。自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灭亡（前1045—前771），因为其首都在镐京（今陕西长安）等地，史称西周。

周朝建立以后，除对反叛的商人旧部及东方与国等进行征伐以外，还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等，建立了较商代版图更为广大的国家。并“制礼作乐”，加强宗法等级制度，使西周的统治得到迅速的巩固，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列鼎）制度，奴隶主贵族的墓葬等级分明。此时青铜酒器大为减少，出现了簠（fǔ）、盨（xǔ）、匜（yí）及钟等青铜礼器。青铜器铭文有了高度发展，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为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大造舆论。并且，青铜礼器的器形与纹饰都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形成了一种质朴粗放的新的风格与面貌。此外，青铜武器与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与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

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铸铜遗址，面积达 10 余万平方米，发现有用块状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铜竖炉，直径已达 1.6—1.7 米。还发现有陶质鼓风嘴，可能此时已用皮制的橐（tuó）进行鼓风。经过对炉壁熔点进行测定分析，炉温已达 1 200℃—1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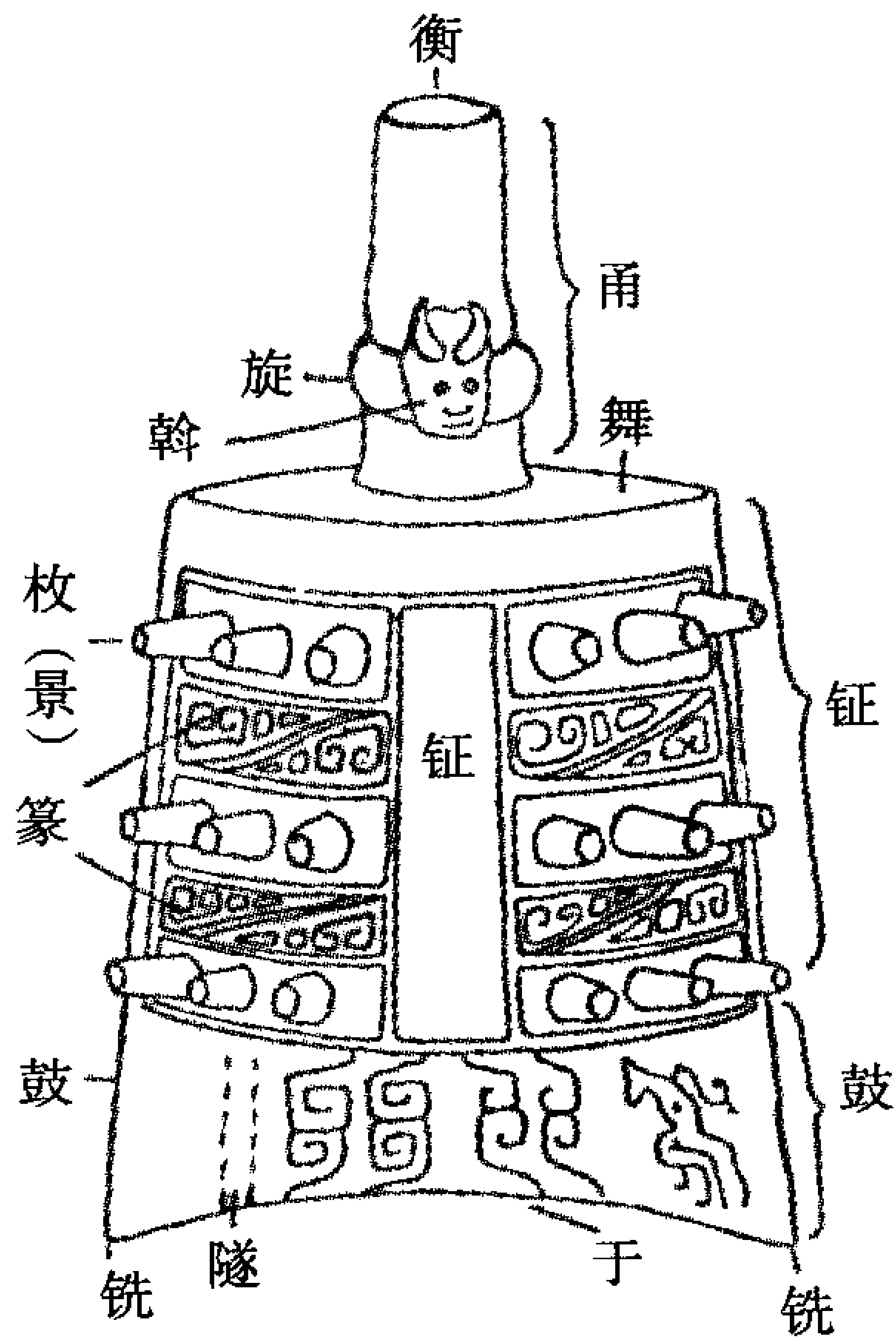
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斝、觚、觯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此时青铜礼器以鼎最为重要，在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制度，一般称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就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

动中使用的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汉代人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九鼎的第一个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亦属于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豕、鱼、腊、肠胃（或肤）。三鼎所盛为豕、鱼、腊或羊、豕、鱼，称为"牲"。据《仪礼·士冠礼》所记，一鼎盛豚，为士一级所用，称为"特"。并且，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还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这种九、七、五、三、一鼎称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内盛用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调和的有滋味的羹。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的王陵尚未发现。清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职为膳夫，被周王派遣"舍命于成周"，其地位约当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陕西宝鸡茹家庄 M1 甲西周穆王时期強（yú）伯后妻（儿）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时期长甶（sī）墓出土四件圆鼎，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还有簋二件。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中期五号墓出土铜鼎一件及簋一件。这些都是西周时期出现列鼎制度的证明。这种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

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此外，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新的盛黍稷稻粱的青铜食器簠与盨。簠，古代文献称为瑚（hú）。长方体，其特点是盖与器的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并且大都有双耳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盨，体为长方形圆角，敛口，鼓腹，双耳，圈足或四足，有盖。使用时间不长，春秋初期已较少见。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新的水器匜，形状似觥，椭圆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来代替盉，盥洗时用来浇水，与盘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下有圈足或无足。

在西周时期，青铜乐器有了飞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开始出现了钟。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与音乐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钟是悬挂起来、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击的乐器，是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主体。从形制上来说，钟顶上有圆柱状的甬的称为甬钟，用来侧悬；钟顶有半环形钮的称为钮钟，用来直悬；钟顶为扁平兽形钮、下端为平口的称为镈（bó），亦为直悬。甬钟各部分皆有专名。甬顶称为衡，甬中下部外弧有钮之处称为



西周青铜甬钟各部分名称图

旋，钮称为斡。钟体顶部称为舞，上部谓之钲（zhēng），下部谓之鼓。钲部的钟乳称为枚，枚端称为景。钟乳之间的花纹带称为篆。钲部正中部位亦称为钲，经常铸有铭文。鼓部下端两角称为铣，中部称为于。鼓内部为调音而制出的凹槽称为隧。单独一个悬挂使用的钟称为特钟；大小相次、成组悬挂使用的称为编钟。例如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长由墓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1960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柞钟八件一组。一般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乐音，鼓部正中发一个音（正鼓音），侧（右）鼓部又发一个音（侧鼓音），大多高于正鼓音二度，即其音程关系以小三度居多。例如柞钟第三件，正鼓音为角（e），侧鼓音为徵（g）。钟出现以后，一直盛行到战国时期，"钟鸣鼎食"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奢侈生活的写照。

西周初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基本上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西周中、晚期，发展形成了周人青铜礼器的特有风格。从造型上看，稳重严谨。例如鼎多为直耳、深腹、蹄足，簋多为带盖、敛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个短足。纹饰上变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缛的风格，变为素朴粗放；通体装饰花纹以及主纹突出于地纹之上者已较少见；纹饰的母题不再是神秘的兽面纹与夔纹等，而是由粗宽带组成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与鳞纹等，而且一般没有地纹。虽然这些纹饰是由神秘的动物纹发展而来，但神秘的意味已大为减弱。这些纹饰一直延续使用到春秋初期，个别更晚。具体来讲，窃曲纹，大多由双线

构成S形或C形图案，中间常有目形纹。环带纹，中间为波浪起伏的宽带，上下填以角形或口形纹。重环纹，由一端圆弧的长方形组成两重或三重的环形图案，大多左右排列成行。鳞纹，形似鱼鳞，大多上下重叠组成图案。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高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的鼎盛时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目前已发现的最长的铭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长达499字。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大造舆论，必须借助于礼器上的铭文来宣扬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宠与封赏，并传之久远，“子子孙孙永宝用”，作为其世官世禄的凭证与护身符。反过来，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又大大加强了青铜礼器维护礼制、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作用。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丰富而广泛，包括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诸侯分封、赏赐采邑或田地、赏赐民众或奴隶、买卖人口、土地交易、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对臣下的训诰和颂扬先祖、记载西周的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法律判决书、西周时期的商业等等，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下面分别举例予以介绍。

第一，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者。例如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32字：“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

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晨，正值岁（木）星当空（当位），一夜之间，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管）地（今郑州），赏赐给官员利铜，利因而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其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我国学者进一步结合天文学进行研究，确定了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 1045 年，甲子日是 3 月 27 日，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①。


西周利簋（陕西临潼出土）

又如 1963 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高 38.8 厘米，口径 28.8 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 122 字。内容是记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阳）京室一次祭典上对宗小子（周王宗室子弟）的训诰。其中讲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薛）民。"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后，就决定在中土洛阳营建成周，以统治全国。铭文又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并"迁宅于成周"。铭文所记与《逸周书·度邑篇》等古代文

① 赵光贤：《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文史知识》1990 年第 8 期。

献记载相合，证实了西周初为巩固对东方乃至全国的统治而营建成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对研究洛阳城市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再如 1976 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时的墙盘。高 16.2 厘米，口径 47.3 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 284 字，系统地叙述了西周从文王到恭王诸王的主要政绩，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例如其中谈到："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寏（huán）（贯）南行。"可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相互印证。

第二，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的。西周初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例如传 1931 年河南浚（xùn）县辛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湝司徒逘簋，铭文记载："王剌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鄙，《广雅·释诂》："国也。"这与《史记·卫康叔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周成王时，因商纣之子武庚起兵叛周，成王派周公再次征伐商邑，杀武庚。尔后，为了巩固统治，将康叔徙封于黄河与淇水之间的商人故地为卫侯，管理商遗民。

又如 1986 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M1193）出土的克盉与克罍。两器的盖内与器口沿内铸有相同的铭文 43 字，其中心内容是记载周王"令克侯于匽（燕）"。经研究，克是太保召公奭的长子，是第一代燕侯。铭文印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

燕。”以及唐代司马贞索隐：“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并确证琉璃河发现的古城址为西周初燕国国都之所在，对北京建都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又如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或释俎）侯夨（zhě）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康王将虞侯夨改封于宜，并赐给土地及人民：“锡（赐）土：厥甽（畎）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王室下级官吏）□（十）又七姓，锡郑七伯，厥盧（徒属）□（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农夫）六百又□（十）六夫。”提供了周初分封时“授民授疆土”（《大盂鼎》）的具体资料，可与《诗经·鲁颂·閟（bì）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相参证。

第三，记载赏赐采邑或田地的。例如周昭王时的遣尊。铭文记述：“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岸，赐遣采曰趆。”即将名叫趆的采邑赏赐给遣。在西周时期卿大夫的封邑称为采邑或食邑，即《礼记·礼运》：“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又如1969年陕西兰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永盂。铭文记载：“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赐矢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罙（及）师俗父田。”即益公传达恭王的命令，赏赐给官员永两处田地：阴阳洛及原为师俗父的田地。根据铭文，当时师俗父也在场。永盂铭文说明周王有权将田地改赐，因而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关于赏赐民众或奴隶以及其他物品的。例如清

朝道光初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高 101.9 厘米，口径 77.8 厘米。腹内壁铸有铭文 291 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赏赐给贵族盂："锡汝邦司（邦国官员）四伯，人鬲（民众，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奴隶）自驭（御，赶马的）至于庶人（种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锡夷司（异族）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即一次共赏赐给盂官员 17 人及 1 709 名民众，总计 1 726 人，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

又如 1973 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葬（M52）出土的周成王时期的复尊。铭文记载："燕侯赏复冕（miǎn）衣、臣妾、贝。"臣妾就是男女奴隶，可与衣服、货贝一同赏赐。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述赏赐礼器、命服、车马及货贝等，是很普遍与常见的，兹不赘述。

第五，关于买卖人口及其价格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人口买卖价格的记载，而清代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曶（hū）鼎铭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资料。这就是："我既赎（买）汝五夫（于）效父，用匹马束丝。……诞赎兹五夫，用百锾（huán）。"即最初议定五个人（或认为是奴隶）的价值为一匹马加一束丝，但最后以一百锾铜的金属称量货币成交。一锾铜约为 6 两，百锾约为 60 斤。即一个人（或奴隶）的价格为 20 锾即约为 12 斤铜。说明在西周时期人（奴隶）远不如牛马值钱，人（奴隶）的地位比牛马还要低下。

第六，关于土地交易的。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盉。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盖内铸有铭文132字，其中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裁（作价）八十朋，厥贾（价），其舍（予）田十田。矩或（又）取赤琥两、麀桒（bài）两、桒韐（gé）一，裁廿朋，其舍田三田。"即裘卫用价值贝币百朋的玉器和皮毛换取矩伯的13块田地。但铭文在下面又提到，这件事还要报告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同意，伯邑父等执政大臣还要派官员司徒、司马、司工来参加田地交割。这说明西周初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的土地国有制，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动摇，贵族之间土地已经可以交易。这是西周中、晚期奴隶制开始没落的具体反映。

第七，记述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的。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而青铜礼器中又有许多是祭器，因而在铭文中有大量的关于祭祀典礼的记载。例如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的剌鼎，其铭文曰："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禘（dì）。用牡于大室，禘昭王。"即记载了周穆王为其父昭王举行禘祭的典礼。

记述周王对臣下的册命典礼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数量较多，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中晚期的颂壶（另一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高63厘米，口长21.2厘米，宽16.9厘米。其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

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司新造贾，用宫御。锡汝玄衣黹（zhǐ）纯、赤市（绂）朱黄（衡）、銮旂、攸（tiáo）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纳）瑾璋。……”共151字，详记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册命典礼过程、受册命者与佑者、王命的内容，受命者还要返纳玉币等等，较古代文献诸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典礼还要详尽。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册命典礼制度，这对于研究西周的礼制及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八，记载周王对臣下的训诰以及称扬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例如传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出土的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鼓腹，口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三个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及凸弦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499字，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中之最长者。其内容记周王在锡命毛公时，对毛公的五次训诰。其中谈到


西周毛公鼎（传陕西岐山出土）

当时西周社会已是“𠷎（cè）𠷎四方，大纵不宁。”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机，要求毛公率领下属官员，勤劳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鳏寡，努力辅弼王位。反复叮咛，忧心溢于言表。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而实较《尚书》为胜。

《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大量的称扬其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内容。例如周恭王时期的师望鼎，铭文称扬“丕显皇考宄（guǐ）公，穆穆克盟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得屯无敃。”因此“用作朕皇考宄公尊鼎，师望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第九，记载西周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的。西周的军制，古代文献记载仅有六师，例如《诗经·大雅·常武》：“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但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来看，除六师（又称西六师）外，还有成周八师，或称殷八师。例如传1930年河南汲县出土的周康王时的小臣謎（cù）簋，其铭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又如1942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西周厉王时的禹鼎，其铭曰：“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西周时期作为通称，师与军同。据《周礼·夏官》序官记载，每师（军）为12 500人。

关于记载周王朝对少数民族征伐的，重要的有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guó）川司出土的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高40.8厘米，口纵86厘米，横

137.3 厘米，重 215.3 公斤，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盘。内底铸有铭文 111 字：“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

博伐玁狁（xiǎn yǔn），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趄（yuán）趄子白，献馘（guó）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铭文记载周王命虢季子白征伐西北的少数民族玁狁（匈奴的前身），获得了胜利。周王在周庙予以赏赐和宴飨。全篇铭文以四言为主，句式整齐，方、阳、行、王、飨、光、王、央、方、疆，阳部协韵，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第十，记载法律判决书的。《尚书·吕刑》："五刑（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之属三千。"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㑇（yìng）匜。高20.5厘米，流至鋬长31.5厘米。器上的铭文与盖上的铭文相连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共计157字。铭文内容是记录一篇法律判决书。㑇的下属牧牛因为与上司㑇争五夫败诉，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来被赦免了500鞭，其余500鞭及墨刑改用铜300锾来赎，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扰乱㑇。㑇胜诉后，将此判决书铸在这件青铜礼器之上。这是古代文献所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周礼·秋官·司约》）的具体例证。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第十一，反映西周时期商业情况的。例如宋代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今仅有拓本传世，器已不知下落。腹内底铸有铭文133字，其中有："其（南淮夷）贾（商

人）毋敢不即餗（师次）即市（市场），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商人）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奸）贾（买卖），则亦刑。”该文字说明西周晚期诸侯百姓与南淮夷之间的商业贸易已有相当发展，南淮夷盛产的丝帛及铜锡，对西周的经济有重大影响。因而周王室严加管理，要求双方商人必须到指定的由官方管理的市场上交易，否则要严刑处罚。又如 1981 年陕西岐山流龙嘴村出土的西周恭王时期的鲁方彝盖，铭文记载：“齐生鲁肇贾，休，多赢。”即记述齐国人名鲁者（即这件器物的作者）经商获利，这与《史记·齐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的齐国自太公以来重视商业的情况恰相符合。以上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的商业是发达的。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了“月相”（月亮盈亏变化）。即周人把一个月分为四段，自初一至初七八日称为“初吉”，初八九日至十四五日称为“既生霸”，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称为“既望”，二十三日以后至月末（晦）称为“既死霸”（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书体，在初期时，与商代晚期波磔体近似，首尾出锋，风格雄肆。如上述大盂鼎的铭文。到了西周中晚期，字形长方规整，笔道匀称，首尾如一，不露锋芒，称为“玉箸体”。如上述虢季子白盘的铭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周宣王时的太史籀（zhòu）作《史籀》15 篇，可能就是玉箸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之为大篆，

或称为籀文。

二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器的新发展

西周时期青铜武器有了新的发展与改进。主要武器戈，形式较多，主要是在援的后端下部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缚柲用的穿孔（称为穿），常见的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柲之上，使杀伤力更加提高。戟，西周时期出现了十字形戟，即将戈与刺（矛）合铸为一体的戟。例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侯墓出土的十字形戟，直援，援末有一个圆穿，直内，上部为直刺，下部为长胡二穿。内部铸有铭文“侯”字。其中一件高27.35厘米，宽18.85厘米。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M1193）出土的十字形戟，上部为刀形刺，而且前锋后卷，或称钩戟。内部铸有铭文：“燕侯舞戈”。

剑，是短兵，用于扎刺。商代晚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例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羊首曲柄短剑。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较多地发现了青铜剑，如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均出土了青铜剑。其特点是大多呈柳叶形，直身有脊，两刃尖锋，扁直柄，无格，无首，均为短剑。例如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初期的青铜短剑，长27厘米，

柄部有两个圆穿。此外，西周时期还出现了匕首，例如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初期墓出土的铃首匕首，全长 26 厘米，但刃部较短，约占全长的 1/3。

西周时期的漆木盾也有了改进。盾面大多镶有青铜盾饰，古代称为钖（yáng），有圆形、人面形或兽面形等。既加固了盾，又起到了美观和威慑作用。例如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出土的漆木盾，高约 1.3 米，宽 0.7 米，表面除涂有朱色或黑色等漆外，还镶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钖。其中圆形者，直径多为 14—15 厘米，中间圆鼓，窄平沿上有三组（每组两个）穿孔，背面铸有阳文铭文："燕侯舞"或"燕侯舞昜（钖）"。

西周时期青铜车马器有了新的发展，说明西周时期的车子较商代完善和进步。新出现的青铜构件与饰件主要有车辖、毂（gǔ）饰、轴饰、衡饰及銮等，此外还出现了车盖。青铜车辖一般呈长条形，上端大，下端小，用以代替商代的木辖，插入铜车軎的孔内，使铜軎更牢固地固定于木车轴两端。青铜毂饰装在车轮两边的车毂上，一般由輨（guǎn）、軝（chūn）、軧（dǐ）三部分组成，也有连铸成一个整体的。略呈喇叭形圆筒状，套在车毂上既可以强化车毂，又可以使车轮保持直立，防止内外倾斜。西周时期新出现的青铜轴饰，或称为锏（jiàn），略呈椭圆形，套在车轴上，用来固定伏兔（轴上横木）。其外端呈平板状，用来遮挡、保护内侧的车毂。西周时期曲衡增多，即衡加长（有的长达 2.5 米）并且两端上扬外翘。有的末端套以

镂空青铜矛状衡饰，有的衡身上套有青铜管状衡饰（一端平齐，一端呈锯齿状）及用以贯辔的轙（yǐ）饰，统称为衡饰。銮，下部是一个梯形座，上部是一个扁圆形的铃，装在车子前面的木衡上或车轭的上方。其作用正如《韩诗内传》所记："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尤其重要的是，西周时期出现了车盖，一般呈伞状。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出土的车盖，圆形，直径 1.5 米。总之，西周时期增加了上述青铜车器，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

西周时期新增加的青铜马饰主要有马冠，略呈扇面形，上饰兽面纹，周边有穿孔，用皮带系于马额之上。此外，西周时期铜当卢普遍应用，其形状大多是中部为圆形，上面出双角，下部为长条形。西周时期又盛行角镳及角状铜镳。马辔头上的铜饰增多，其中十字形交叉的管状铜饰称为节约。

三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缫丝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并且在古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唯一的一个养蚕丝织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养蚕丝织。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半割的蚕茧。1958 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

化遗址出土了盛在竹筐中的丝线、丝带和绢片等。经鉴定，是用家蚕丝织成，绢片系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48根。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蚕丝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形态逼真的玉蚕，长3.15厘米。在一些青铜器上还留下了当时丝织品的残痕。例如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附有绢、罗、绮的遗痕。从发现的菱形花纹绮来看，当时已有了具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到了西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经》中有许多讴歌采桑养蚕的诗篇，如《豳（bīn）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苍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造型生动的玉蚕，大的长约4厘米，小的长约1厘米。在青铜器上或淤土上又发现了许多丝织品的印痕，有的三四层叠压在一起。大多为平纹组织，也有山形纹图案的提花织物，也应是用提花织机织造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的刺绣印痕，花纹舒卷自如，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技法娴熟，针脚均匀整齐，其颜色是在绣后平涂上去的。

四　建筑技术的进步

文献记载周文王建都于丰，在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岸；

武王建都于镐，在今长安沣河东岸。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沣河两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丰邑的中心地区在沣河中游偏北，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西王村、冯村，东至沣河，西至灵沼河，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宫殿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及贵族墓地。例如1983—1985年在沣西马王村及客省庄发现的十几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四号建筑基址，平面为T字形，东西长61.5米，南北宽：西部最宽处为35.5米，东部残宽27.3米，总面积达1 826.96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座西周建筑基址。关于镐京，现已查明其中心地区在沣河东岸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和斗门镇一带，其中一部分被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修昆明池破坏了，现存面积约有4平方公里。在洛水村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

周人兴起于今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岐山以南的周原，建国以来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宗庙宫殿建筑遗址。1976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一组西周时期的宫室或宗庙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全部坐落于夯土高台基之上，南北全长45.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约为1 500平方米。南面正中是大门，门道宽3米，东、西两旁为房屋（东、西塾），大门外南边有影壁（屏）。进大门后是一个大的庭院（中庭），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庭院北面是一座殿堂（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建筑，面阔六间，长17.2米，进深三间，宽6.1米。主体建筑之

后是一个小庭院，又被中间一条宽约3米的过廊分为东、西两个各8平方米见方的小庭院。后庭之北为最后的一座建筑（室），面阔五间，东西长23米，南北进深3.1米。在大门、主体建筑至最后面建筑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各有八间，进深2.6米，宽4.2米至6.2米。这样就由大门、东、西厢房及后室组成了略呈回字形的封闭式建筑，将主体殿堂包围于中心，布局规整严谨。与《仪礼》等古代文献记载的“前堂后室”或“前朝后寝”制度相符合。房屋的墙壁用夯土筑成，一般厚0.58米至0.6米，地面及墙面均抹以由细砂、白灰和粘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平整而坚硬。

瓦的发明和使用是建筑用材和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根据考古发现，西周以前房屋的屋顶全部用茅草覆盖，即文献所载的“茅茨土阶”（《吕氏春秋·恃君览》）。西周初期开始出现了瓦，最初数量少，可能仅用于覆盖屋脊。到了西周晚期，瓦已大量出现和使用。1976年在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宫殿建筑基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板瓦和筒瓦，有的筒瓦还带有半圆形瓦当。在瓦的背面或正面，出现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在长安沣河东岸洛水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大板瓦，长约45厘米，宽约30厘米。这些都说明到了西周晚期屋顶已大部分用瓦覆盖，已能较好地解决屋顶的防雨问题。由于屋顶用瓦，使屋顶的重量大增，这就促使中国古代建筑的梁架结构及柱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扶风召陈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建筑基址的柱子加密、柱础

加大及加固就是证明。

五　等级制度鲜明的墓葬

西周时期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发现，诸侯一级的大墓已发现的有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及夫人墓、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以及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辛村位于浚县城西约35公里，村南为淇河及浮山，卫侯墓地在村东，规模很大，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已发现8座大型墓葬及60座中小型墓和14座车马坑。大型墓在东、西两边，中小型墓在中间，排列有序，可见西周时期诸侯的墓地仍是聚族而葬，据《周礼·春官·冢人》记载，这种墓地称为“公墓”。辛村大墓墓室略呈方形，长6.3米至10.6米，宽5米至9米，面积最大者达95平方米。有南、北两条墓道。墓室中央为椁室，底部铺硃砂，棺置于椁室之中。辛村大墓均已被盗，随葬的青铜礼器多已不存。例如一座西周初期的大墓仅残存鼎、簋、甗、爵、尊与卣，共六件，此外还残存一批车马器和武器。出土的青铜戟上，有的铸有“侯”字铭文，因此这些大墓应是卫侯或夫人墓。墓地的一座大型车马坑，长10米，宽9.1米，深3米，共埋12辆车、72匹马及8只犬。

西周燕侯墓地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村西北、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董家林村）东南，京广铁路以东。

1974 年以来进行勘探发掘，发现有大、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其中大型墓有十余座。从已发掘的数座大型墓来看，一般有一至二条墓道。其中 1986 年发掘的一座大型燕侯墓（M1193），墓室长方形，南北长 7.68 米，东西宽 5.25 米至 5.45 米，墓深 10.25 米，墓室四角有四条墓道。墓室正中为椁室，南北长 3 米，东西宽 1.8 米，高 1.58 米，用方木构成。墓已被盗，残存一些青铜礼器、武器及马器等，其中有前面介绍的克盉、克罍，说明这是燕侯克之墓。据研究，克为西周初太保召公奭的长子，代召公就封于燕，为第一代燕侯。

西周晋侯墓地在山西曲沃北赵村西南 1 公里，属于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长约 150 米，南北宽约 130 米。1992 年至 1994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发现 8 组 17 座大墓，大体呈南北两排排列。大多是两墓一组，即晋侯与夫人并穴合葬。其时代为西周昭王、穆王至春秋初。墓室大多为长方形，大多在南部有一条斜坡墓道，此外还有两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各组晋侯及夫人墓的东侧大多有一个随葬的车马坑。有的墓还有陪葬墓及祭祀坑。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及玉石器等，有些青铜礼器上铸有晋侯僰（bó）马、晋侯喜父、晋侯对、晋侯苏、晋侯邦父等铭文，确证这里是西周时期晋侯的墓地。例如八号墓，墓室呈长方形，长 6.65 米，宽 5.6 米，深 6.65 米。连同南面的墓道长达 25.1 米。墓室中部置木椁，四周填以木炭。椁内置木棺一具，长 2.08 米，宽 1.12

米。此墓曾于1992年被盗，墓中的晋侯苏编钟被盗卖至香港，后被上海博物馆购回。199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椁室内出土了青铜兔尊三件以及鼎、簋、甗、方壶、盉、盘等。其中晋侯苏鼎，高19厘米，口径24.8厘米。圆形，附耳，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13字："晋侯榃（苏）作宝尊鼎，其万年永宝用。"据《史记·晋世家》："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索隐："系（世）本及谯周皆作苏。"说明此墓为晋献侯（约当西周宣王时期）之墓。此墓的棺内还出土有黄金带饰一组以及大量成组成套的玉石器。包括玉覆面，以及由成组的玉瑗、环、玦、璜、玉管、玉珠和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组成的项饰、胸饰以及衣服上的玉缀饰等，可视为汉代玉衣的先声。又如91号墓，出土青铜列鼎七件、簋五件，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诸侯一级的用鼎制度相符。墓中出土的一件残青铜器底上，铸有铭文27字："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剌（厉）侯宝鑑，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据此，发掘者认为该墓为晋厉侯之子、晋靖侯（喜父）之墓。

卿大夫的墓葬可以1984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井叔墓地作为代表。井叔是周王的重臣，整个墓地的布局以几代井叔墓为中心，其他较小的墓在旁边，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说明西周时期卿大夫也是实行族葬制。其中一座井叔墓，墓室为长方形，长5.5米，宽4米，深8.24米。南北有两条墓道，墓道内置木车及青铜车器害、辖等。墓室

中部为椁室，长3.95米，宽2.6米，高1.84米，由方木垒成，椁顶上亦置有青铜车马器。椁室内置重棺。墓已被盗，随葬品大部分已不存在，残存有石磬等。井叔墓东边其夫人墓虽亦被盗，但残存井叔采钟二件及牺尊、尊、爵及卣盖等青铜礼器。

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西周中期強伯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簋、鬲、豆、甗、爵、觯、尊、卣、罍、编钟一组三件以及武器和车马器等。其中方鼎有三件、圆鼎有五件，可以作为西周时期小的诸侯国国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等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除其妻井姬与其并穴而葬外，该墓还发现了以其妾同穴来殉葬。此外，该墓还附有车马坑。

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发掘的西周中期长由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四件、簋二件以及鬲、甗、爵、觚、卣、罍、壶、盉、盘和编钟一组三件等。四件青铜鼎中有三件形制相近，可能是盛肉用的列鼎；另一件不但形制有些区别，而且个体较大，可能是煮肉用的镬（huò）鼎。此墓没有发现车马坑，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士一级的奴隶主贵族。

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发掘了西周中期的一座一鼎墓，随葬有青铜鼎一件、簋一件以及青铜武器戈、矛及车马器镳、衔等，这显然是最下层的士的墓葬，因此，该墓也没有发现车马坑。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已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在随葬青铜礼器上已形成用鼎（列鼎）

制度。与用鼎制度相配合，诸侯、卿大夫的墓葬还随葬青铜乐器并附有车马坑，而士一级墓葬一般不随葬青铜乐器，也没有车马坑。这是西周时期礼制有了发展和加强的具体反映。这也说明古代文献记载的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是可信的。

六 1949 年以后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

1977 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室宗庙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在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龟甲和牛骨 17 000 余片。其中大部分是龟甲，其中 289 片上面刻有卜辞，每片字数较少，最多的一片达 30 字。其内容有祭祀商王武乙、文丁、帝乙的，有卜问商王田猎的，有的记有周王的重臣太保及毕公的，有记“伐蜀”及“楚子来告”的，有记易卦卦象的等等，为研究商末及西周初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1949 年以来西周甲骨文还先后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扶风齐家、北京昌平白浮、房山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地亦有少量发现。西周甲骨文字体的特点是极小而纤细，表明契刻的技术十分熟练和高超。1949 年以前仅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 1949 年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西周最后的一个王——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幽王十一年（前771）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进攻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申侯等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都城于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以前的时期，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取名于孔子所著的史书《春秋》而称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22年称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相继称霸。此时，铁器开始逐步应用，随着各诸侯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的青铜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青铜工艺灿烂辉煌，分铸法有了高度发展，失蜡法出现，镶嵌金银及红铜等工艺也有所提高。媵（yìng，随嫁）器铭文有了较大发展，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及水陆攻战纹出现。并且列国城市，尤其是各大诸侯国的都城都有所扩展。

不仅如此，在春秋时期诞生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和教育家孔子，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同时还产生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

一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商代已经发现了用陨铁加热锻打制作的铁刃铜钺，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铁的最初认识与利用。根据考古发现，到了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人工冶炼制造的铁器开始出现。例如 1990 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测鉴定，确认是人工冶铁制品，系用块炼法锻制而成。又如 1978 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剑叶残长 9 厘米（原长约 20 厘米），亦为块炼法制成。块炼法是将铁矿石在约 1 000℃的较低的温度下，在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而得到铁的方法，需要再经锻打除去杂质才能制作器物。到了春秋晚期，出现了用白口铸铁制作的铁器。例如 1976 年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铁鼎，残高 6.9 厘米，经鉴定为白口铸造生铁。白口铸铁是用铁矿石在 1 146℃的高温下，在液态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得到的铁，一般含碳量在 2% 以上。白口铸铁的出现是与当时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白口铸铁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能用来铸造各种铁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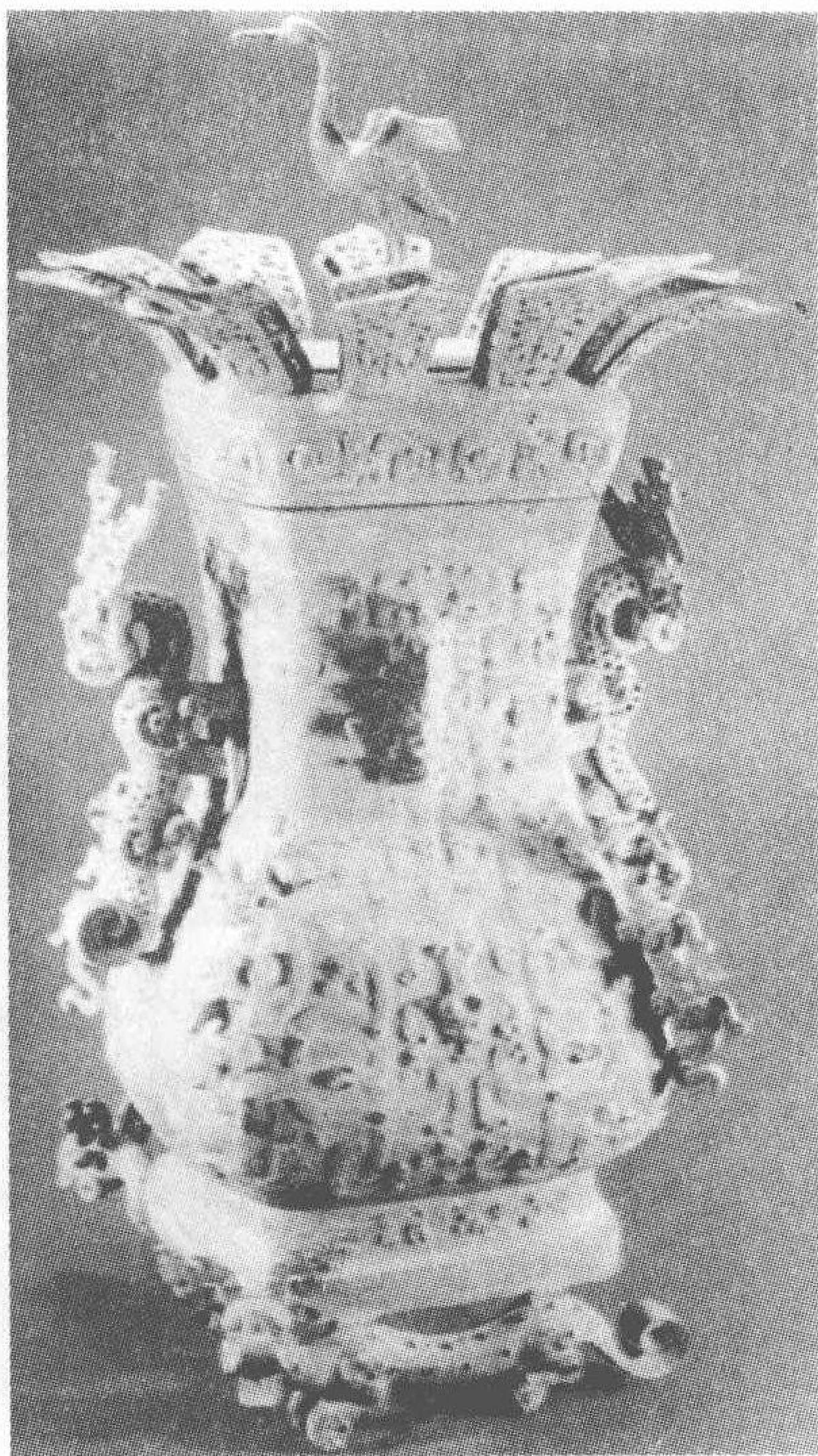
使铁器开始能够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在推动生产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中国使用生铁的时间比欧洲早 1800 余年，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此外，在长沙杨家山同墓中还出土了一柄铜格铁剑，残长 38.4 厘米。经金相鉴定，系含碳约 0.5% 的中碳钢，组织比较均匀，十分坚硬，可能经过高温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产生了块炼渗碳钢。总之，春秋晚期铁器的开始逐步应用，尤其是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不仅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给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有了新的飞跃。

二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

春秋时期，尤其是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冶铸业的规模与技术有了一次新的巨大的发展。首先，青铜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已采用竖井与平巷等结合进行回采，每座冶铜炉日产铜 300 公斤以上。根据遗存的炼渣估计，这里曾冶炼出 8 万—12 万吨铜。据此推论当时全国的铜产量当是十分巨大的。

其次，范铸法有了新的发展。青铜器胎壁变薄，趋于轻巧。1959 年开始发掘的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铸铜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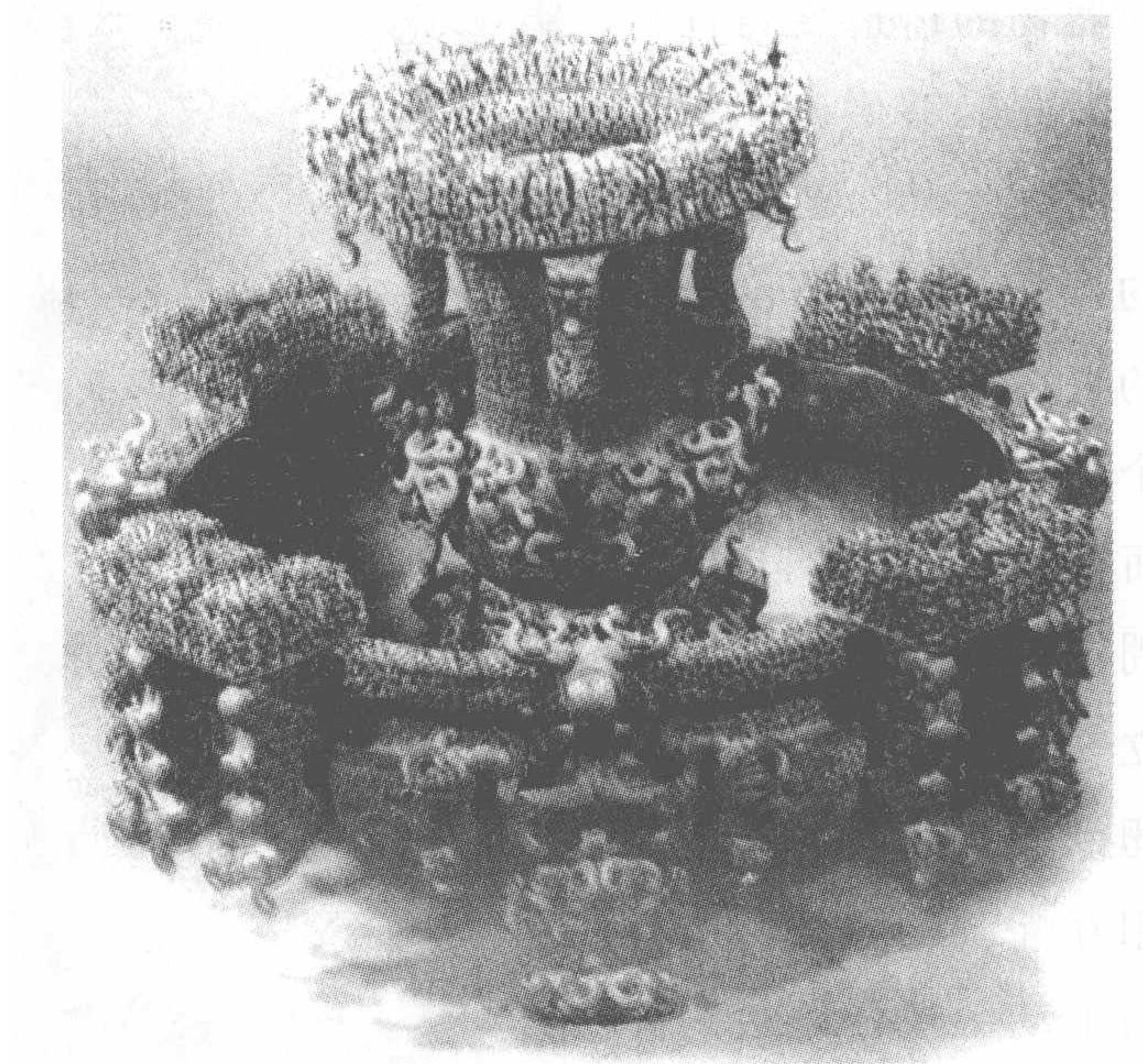
坊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熔铜炉、烘范窑、工作场地、水井、窖穴等；出土陶模、陶范五万余块，其中配套的达百余件，有鼎、壶、鉴、钟、镬、戈、带钩、车害及货币空首布等。通过研究发现此时陶模与陶范多系分制、组装而成，外范上的花纹也是采用一块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这样不仅使产品规格化，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此时分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分铸法就是将器物的附件，例如耳、足、提梁等预先铸好，然后将其嵌入器身的范中，最后再浇铸器身，使附件和器身铸合在一起。或是先铸好器身，然后再在其上铸接出附件。分铸法使器形复杂的器物的铸造变得简单易行，因此能够生产出结构复杂、优美生动、艺术价值很高的器物。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壶身下面由两个立雕的伏兽承托，壶腹侧面有四个立雕的兽爬附，盖顶周围呈双层莲瓣形，中间站立一只仙鹤，作引吭长鸣振翅欲飞之状。器身上又满饰相互蟠绕的龙纹，极其华丽而生动，是分铸法的典型代表作。再有，此时除分



春秋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

铸法之外，将附件（耳、附饰等）焊接于器体之上的焊接技术也有了普遍的发展与应用，使器物的制作更为简易。

第三，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根据对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等的研究，说明在春秋晚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么，这种工艺的出现理应在更早的时期，也可能在春秋初、中期时已经产生。并且，1978 年在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由尊与盘各一件组成，尊高 30.1 厘米，口径 25 厘米；盘高 23.5 厘米，口径 58 厘米。尊置于盘中。尊与盘的口沿上均有层次繁复的镂空蟠虺（huǐ）纹附件，亦系失蜡法铸造。这反映到了战国时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战国青铜尊盘（湖北随州出土）

第四，由于春秋晚期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使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金银镶嵌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刻出凹下的花纹，然后将金银丝或片嵌入，用错石加以磨平。所以又称为金银错。这种工艺技术不仅用于花纹，而且也用于铭文，尤其在南方吴、越、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更为多见，也起到表面装饰的效果。其次为嵌红铜工艺。即将用红铜丝或片作成的花纹嵌在青铜器表面，然后加以错平。以上这两种工艺都是利用不同金属的不同色泽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打破过去单一色彩的局限，而收到红黄白相间的绚丽的效果，显得十分富丽而华贵。此外还有线刻工艺。春秋末期，除了铸造的青铜器以外，又出现了用纯铜片锤打而成的薄胎铜器，如铜匜、铜缶、铜鉴及铜杯等。往往在上面用钢刀刻出狩猎纹、宴乐纹和水陆攻战纹等，线条细如毫发，别开生面。

三　青铜敦、鉴、缶、盆、钲、錞于的出现和媵器铭文的增多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因此，周王及其臣下所铸造的青铜器大为减少，而各国诸侯及卿大夫所制作的青铜器大为发展起来。

此时，青铜器在器类上，新出现的主要有敦、鉴、缶、

盆、钲及錞于等。敦，盛黍稷的食器。大多呈圆形，深腹，颈部有二耳，三足。有盖，盖上有三钮。有的盖与器身形状相同，上下扣合呈卵圆形。鉴，盛水（或冰）的大盆。圆形，大口，敛颈，深腹，平底，有的有圈足。腹侧有双耳或四耳衔环。战国时期有方形的。古代铜镜普遍使用之前，人们常用鉴盛水以照容，因而，古代也称镜为鉴。缶，盛酒或水的器皿。圆形，深鼓腹，有盖。也有方形的。盛酒的称为尊缶，例如晋国的栾书缶，体较高，腹上部有四个环钮，盖上亦有四个环钮。颈、肩、腹部有错金铭文五行40字，精美华丽。盛水的称为盥缶。例如大孟姬盥缶，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体较矮胖，肩部有二耳。盆，或称为鐢（zhèng）。盛水或盛血的器皿。圆形，平缘，敛口，折肩，深腹，平底，肩腹部有双耳。钲，又名钲鍉（chéng）、丁宁或句镏（diào）。宴飨或战争中使用的敲击乐器。形状似铙，体较细长。钲口呈微下凹的弧形，下为手执之长柄。有的大小成组，多者可达11件。南方吴、徐、楚地盛行。錞于，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也用于宗庙祭祀。椭圆筒形，上大下小。顶部有钮，大多呈虎形，又称虎钮錞于。春秋时期出现，战国及汉代盛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较多。

其次，此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篇铭文大为减少，而且一般不再具有前述西周时期铭文的书史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媵器铭文。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频繁，各国为

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与力量，需要彼此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结盟一方面需要举行盟誓，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婚姻。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因此，此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姻大为发展，促使青铜礼器中为陪嫁女儿而制作的媵器大为增加，其中以盘、匜、鉴为最多。并且还要在上面铸上加强两国政治友好的铭文，成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例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吴王光（夫差之父）鉴，高35厘米，口径59厘米，内底铸有铭文53字：“唯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铣白铣，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矣叔姬！虔敬乃后，孙孙勿忘。”大意是：五月的时候，已经临近了出嫁的日子。在大吉的庚日，吴王光选择上好的铜和铅锡，制作了为三女儿寺吁陪嫁用的青铜鉴。并叮嘱寺吁说：去吧！要尊敬你的夫君（指蔡侯），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吴蔡两国的友好。铭文有韵，内容十分生动。

四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和水陆攻战纹的出现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商代以来的兽面纹等已很少见到，而

且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很少见了，而是以蟠螭（chī）纹和蟠虺纹为主了。螭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虺是小蛇。这两种纹饰就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的螭或虺互相缠绕组成一个纹饰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布局。这和上述春秋时期冶铸工艺出现并盛行印模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即这两种纹饰都是分别用一个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的。这些纹饰已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这也是当时社会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这就是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例如 1965 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高 40 厘米，口径 13.4 厘米。壶身从上到下嵌错有四层纹饰。第一层左边是会射图像，表现贵族们正在张弓布矢、射向布侯（箭靶）的情景，可能是古代乡射礼的写照。右边是采桑图像，表现贵族妇女正在采桑，有的爬到树上去采，有的在地上接应。这可能就是《礼记·月令》所载："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的写照。第二层左边是宴乐歌舞图像。在上面的殿堂之中，贵族们正在宴饮酬酢，仆侍奉酒献豆，下面则是舞女们正在钟鼓和石磬的伴奏下轻歌曼舞。总之，表现的是贵族们宴飨宾客的情景。右边则是弋射及会射图像。弋射表现的是人们跪在地上正弯弓向天上射鹄，而矢上皆系有缴（zhuó）线。第三层是水陆攻战图像。左边是陆战情景，上层是徒兵格



宴乐狩猎攻战纹铜壶纹展开图

斗守城，下层是登云梯攻城的情景。右边是水战场面。两舰相遇，下面士兵在奋力划桨，上面船头则是短兵相接正在酣斗。这无疑是当时兼并战争的真实写照。第四层是狩猎图像，猎人们正在用矛等来刺杀奔跑中的野兽。总之，上述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的出现不但是古代青铜器纹饰发展上的一大变革，而且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纹饰已从幻想的神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

的世界，艺术手法也从图案式发展到有了场面和层次，出现了真正的绘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审美观点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结果，它开启了汉代画像的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铁工具的逐步应用，各诸侯国的兴起，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区性的青铜文化逐渐形成，各国的青铜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周王室的青铜器以外，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晋、齐、燕、秦、楚、吴、越、鲁、郑、宋、卫、蔡、曾、徐、江、黄、郸、鄀（ruò）、邓、许、陈、曹、滕、邾（zhū）、薛、莒、邿、杞、纪、铸、虞、虢、苏、芮、鄁（xí）、费、郳（ní）、戴、息、潘、胡、邳（pī）等40余国的青铜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各国的青铜器也有所区别。目前我们可以把春秋时期各国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致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以晋国为代表的晋文化区、东方以齐国为代表的齐文化区、北方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区、西方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区、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区、东南以吴国和越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晋文化区。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后改称为晋。周平王东迁以后，晋国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后逐渐强大起来，至晋文公时大败楚军于城濮而成为霸主。晋文化区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地处中原，经济发达，在当时最为先进。前述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充分代表了晋文化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晋文化青铜器造型浑厚稳重，例如鼎多为深腹圜（huán）底、附耳、蹄足，浅圆形盖，多饰有蟠螭纹和蟠虺纹，晚期多呈浮雕状，繁复华丽。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晋姜（晋文侯夫人）鼎、晋（定）公簋、子犯（狐偃）编钟、郘（lǚ）黛钟及赵孟介壶等。例如子犯编钟，共16件，8件成组合成一篇长达132字的铭文，说明作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五月十一日，记载了子犯协助晋文公进行城濮之战及践土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赵孟介壶，两件，传河南辉县出土。高48.3厘米。圆形，侈口，敛颈，腹下部圆鼓，矮圈足。颈部有两个立雕兽形耳，盖顶呈莲瓣形。颈部及腹部饰有浮雕状的蟠螭纹、兽面纹及绹（táo）纹。盖外铸有铭文19字，记载了鲁哀公十三年（前482）晋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此外，春秋中期以后，晋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兴起了一种艺术字体，笔画的特点是尖头、肥腹，形似蝌蚪，被称为蝌蚪文。它不仅起到记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术装饰作用。例如传出土河南辉县的智君子鉴，高22.2厘米，

口径43.5厘米，腹内铸铭六字："智君子之弄鉴。"即为蝌蚪文。据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大夫智瑶，晋国于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

第二，齐文化区。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都于营丘。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整顿行政、军队与赋税制度，使齐国强盛起来。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一些国家打败北戎和狄人，兴师问楚罪于召陵（今河南郾城县），成为春秋时期最初的霸主。齐文化区主要包括今山东地区。其青铜器亦有特点，例如由簋发展而来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例如清光绪十九年（1893）河北易县出土的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齐侯敦，高17.5厘米，敛颈深腹，腹旁有两个环形耳，圆盖上有四个环形钮，自铭为"膳敦"，为齐侯嫁女于燕时所作的媵器。同出的鼎为附耳平盖，这也是齐文化青铜器的特点。齐文化青铜器铭文多作长方形，规矩整齐，笔画平直，为其特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青铜器有叔夷镈、叔夷钟、𬱖（mìng）镈、国差𦉜（dān）、齐侯盂、齐侯鉴、洹子孟姜壶、公孙灶壶及国子鼎等。其中北宋宣和五年（1123）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叔夷镈，铭文长达491字，记述了齐灵公赐给叔夷莱都地方的300县以及4 000徒众等史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𬱖镈，传清同治九年（1870）山西荣河后土祠旁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66厘米，口长44厘米，高大厚重。钮作双龙噬兽形，篆间及鼓部饰云雷纹。铸有铭文174字，记齐侯赐给鲍叔（𬱖的祖父）299邑及鄩之民人

都鄙，补充了《史记·管晏世家》记载之疏略。

第三，燕文化区。燕国为北方大国，但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关于燕国的记载很少。可是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中有关于燕、晋交战的记载，说明当时燕与中原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1949年以来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燕国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纹饰亦以蟠螭纹为主。但是，由于燕国偏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此，保存西周以来传统特点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兽面纹。但是，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国青铜器上的人事活动纹多为狩猎纹，而不见水陆攻战纹；并且又常见兽纹与鸟纹等。这可能与燕国的地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春秋时期燕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杕（dì）氏壶，高37.8厘米。圆形，侈口，长颈，鼓腹，圈足，有盖。颈部有两个环耳，系有提链，并与盖顶之钮相连。颈部和腹部饰有精美的镶嵌狩猎纹三道，并以三道凸弦纹相隔。在中间凸弦纹上刻有铭文41字，记载杕氏战胜鲜虞，以此壶为珍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四，秦文化区。西周灭亡时，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东迁时，将西周故地分封给秦，秦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秦穆公向西发展，“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由于秦僻处西方，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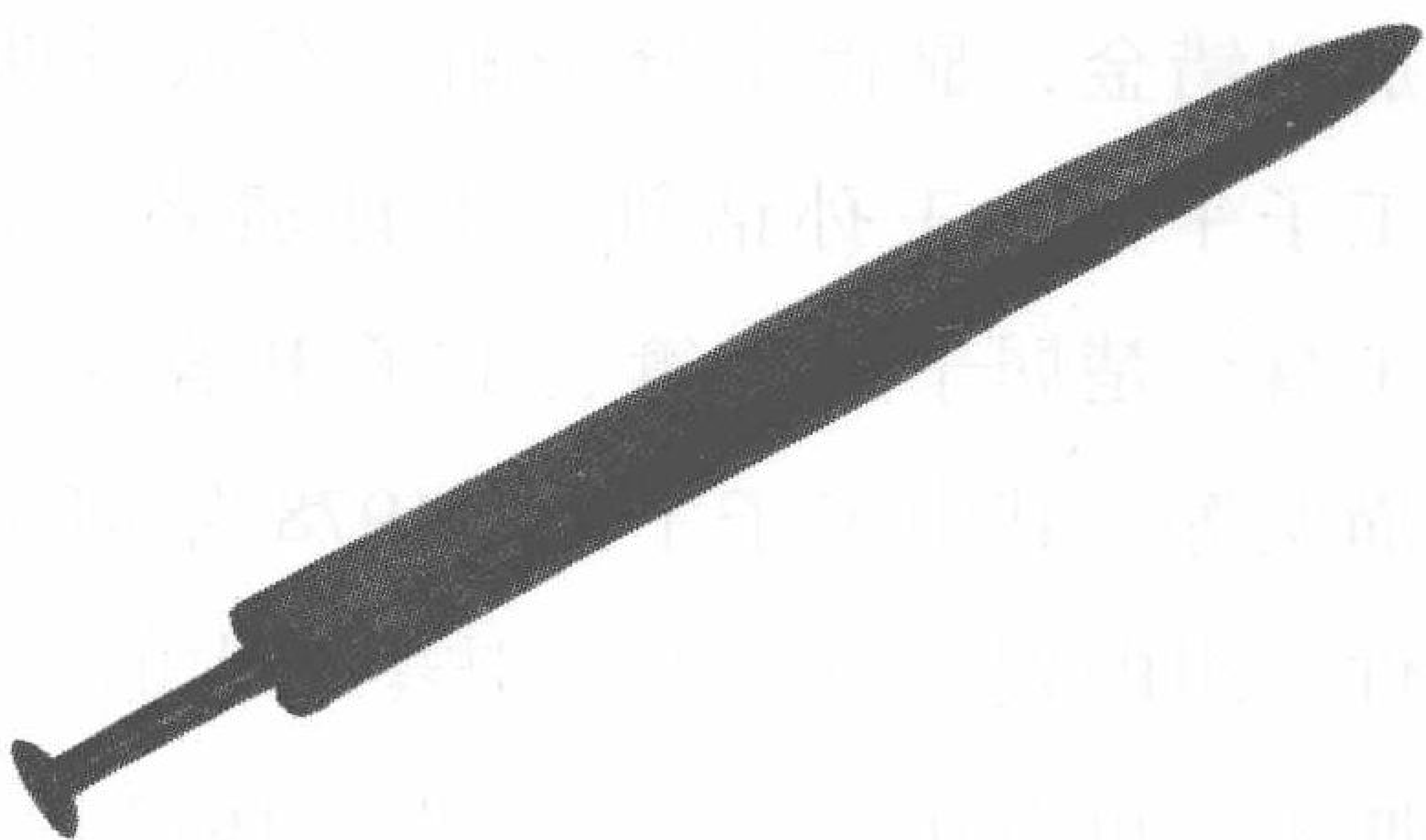
而发展较慢，其青铜器制作比较粗糙，但保存西周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例如秦国青铜器铭文直接继承西周晚期的籀书系统，形成一种规整的风格。此外，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铜鼎，形制为浅腹，蹄足粗壮。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青铜器有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和宋代已见于著录的秦公钟以及1923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等。其中秦公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圆形，口微敛，鼓腹，圈足，双兽耳无珥，有盖。器及盖皆饰以蟠螭纹及瓦纹。器与盖共铸有相连的铭文105字，内容主要记载秦景公自述秦国的历史："鼏（mì）宅禹迹，十又二公。……保业厥秦，虩（xiǎo）事蛮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其铭文是每个字单独作模，然后压印在泥范上，再浇铸而成。因此，可视为印章、封泥以及活字印刷术之滥觞。

第五，楚文化区。周成王时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武王自立为王，至楚文王时始都于郢（yǐng），开始在江汉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江淮地区申、息、邓、唐、鄀、罗、厉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并逐步形成了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例如青铜鼎多为细高足。尤其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并流行鸟书，即将文字书写成鸟形或在笔画上下加上鸟形装饰，成为一种美观的艺术字体。而且往往将鸟书铭文施于器物表面作为装饰，许多铭文并

加以错金，显得十分华丽。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青铜器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王孙遗者钟、楚王领钟、邵（昭）王簋、楚屈子赤角簠、王子申盏盂、王子婴次炉、楚王孙渔戈等。其中王子午鼎，1978 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为七件一组的列（升）鼎，其中最大的一件高 67 厘米，口径 66 厘米，重 100.2 公斤。圆形，侈口，束腰，浅腹，平底。双耳外侈，三蹄足。腹外攀附六只怪兽。有盖，器内附一匕。腹部饰以夔纹、窃曲纹及云纹等。腹内铸有铭文 84 字，盖铭四字，为鸟书。作器者王子午，即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为令尹，康王八年（前 552）卒。此鼎是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

第六，吴越文化区。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周康王时封其后人周章于吴。春秋中期吴王寿梦时开始强大起来，春秋晚期在晋国的支持下，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国的郢都，其子吴王夫差多次伐齐，公元前 482 年与晋定公争盟主于黄池。这时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王勾践乘机攻入吴都（今江苏苏州），并于公元前 473 年灭吴。此后越国成为东南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首先，吴越的青铜兵器在当时最为精良，以剑最为有名。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早已倍加称赞，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证明文献所记绝非虚语。例如 1965 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长达 55.6 厘米，宽 4.6 厘米，剑身上有鸟书铭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践自作用

剑。”铜质精良，剑身上饰有菱形暗纹，剑格上嵌有蓝琉璃及绿松石，虽然历经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洁如新、锋利异常。其次，


春秋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出土）

吴越文化的青铜礼器在形制与纹饰上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鼎的三足外撇，通称越式鼎。簋为小口扁腹，双耳外侧或加镂空扉棱。尊为扁圆腹外凸，或呈鸟形。盘的双耳紧贴腹壁，成为装饰。纹饰则多为变形的兽面纹、变形的夔纹、编织纹及锥刺纹等。另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角状器、三轮盘、飞鸟盖双环耳壶等。此外，春秋时期著名的吴越青铜器还有者减钟、者沕（dāo）钟、配儿钩鑃、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吴王孙无壬鼎、吴王御士簠、邗王是野（寿梦）戈、王子于戈及攻敔（wú）王光剑等。

六　列国城市的兴起

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以及各诸侯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各诸侯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各国的都城大多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至战国时期进一步建设，许多还沿用至汉代。

首先，1954 年至 1960 年在河南洛阳调查发掘了东周的王城遗址，位于洛河与涧河交汇之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自周平王东迁至周景王，凡十二世以王城为周都；周敬王时因王子朝之乱，迁都于东面的成周，至周赧（nǎn）王时又迁回王城。该城略呈方形，北墙长 2 890 米，西墙南北两端相距 3 200 米，南墙和东墙各残存约 1 000 米，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城墙一般宽约 10 米，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北墙外还发现有深 5 米的护城濠。城内中部汉代时为河南县城所在，因而东周时期的建筑遗迹遭到毁坏。在城内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北面的一处，东西长 344 米，南北宽 182 米，四周有围墙，内有长方形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兽面纹、卷云纹瓦当，可能是周王王宫之所在。在城内西北部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城市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相符合。在城内现今的中州路一带发掘了大批东周时期的墓葬，大多为土坑竖穴墓，有棺椁，葬式为屈肢葬，头向北方。大、中型墓随葬有青铜鼎、豆、簠、盘、匜等礼器。小型墓主要随葬陶器，根据随葬陶器组合与型式的变化，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七期，年代约当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3 世纪，现已成为中原地区东周墓葬断代分期的标尺。

其次，从 1952 年起在山西侯马调查发掘了晋国晚期晋景公十五年（前 585）所迁的都城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郊、汾河与浍河交汇之处，由平望、台神、白店、牛

村、呈王、马庄等七座小城组成，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在牛村古城与平望古城内都发现有夯土台基。其中平望古城南部的夯土台基，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5米，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现存最高处约8.5米。牛村古城内西北部的一处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52.5米，高6.5米。两者周围散布有许多筒瓦及板瓦残片，附近还分布有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它们可能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在牛村古城南还发现了前述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发现了大量的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墓葬。墓地分为若干区，可能属于有亲缘关系的不同家族。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古城址东南秦村附近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包括宗庙建筑基址和瘞（cuó）埋牺牲的土坑（“坎”）400余个以及排葬墓等。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将盟辞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于祭玉或石圭上，称为盟书或载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5 000余片，大多呈圭形，长18厘米至32厘米，宽2厘米至4厘米。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达200余字。其内容大多是与盟人表示要效忠于盟主，并一致诛讨已逃亡在外的敌对势力的宗盟类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可能就是晋国世卿赵鞅（赵简子），这批盟书就是晋定公十六年（前496）前后晋国世卿赵鞅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反

对其政敌赵尼（稷）。侯马盟书印证了春秋晚期晋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及盟誓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三，从1958年起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调查发掘了西周晚期（齐献公元年，前859）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城址位于今临淄区西北部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址组成。小城系宫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长方形，东墙长2 195米，北墙长1 404米，周长达7公里余。现已探明南门二座及东、西、北城门各一座以及三条主要街道。城内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是当时宫殿区所在，出土有树木卷云纹及树木双兽纹半瓦当等。其中心建筑“桓公台”呈椭圆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70米，高达14米。在小城内南部发现有铸铜及铸钱币的手工作坊遗址，可能是齐侯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之所在。大城为廓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随淄河弯曲，长5 209米，北墙长3 316米，周长达14公里余。南、北城墙外面有宽25米至30米、深约3米的护城濠。东墙外为淄河，西墙外为系水。现已探明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二座城门，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大城内已探明有七条主干大道，多与城门相连，一般宽10余米至20米。在大城西部还发现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2 800米、宽30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为两支，分别注入北护城濠及城西的系水。在西北隅穿过城墙之处还发现有用大石块砌成的内窄外宽的涵洞。长16.7米，宽约8米，高约3米，有三层流水孔，每层五孔，相错排列。

大城是官吏与平民的居住区，城内东北部及中部等处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东周陶器上，发现有大量的戳印陶文，内容多为作器者的居里及名字，如“高闾豆里人陶者曰汩”等。在大城东北隅的河崖头一带发现一处春秋时期高、中级贵族的墓地，有大、中型墓20余座，可能是姜氏开国国君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座石椁大墓，可能是齐景公墓，外围有冂形殉马坑，仅清理了其中一部分，就发现了殉马多达145匹，据推算总数达600余匹，数量之大，甚为罕见。此外，在大城南10公里左右的牛山一带，有高大的墓葬封土堆10余座，俗称“四王冢”、“二王冢”，可能是田齐国君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又在城南0.5公里的郎家庄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殉葬了17名年轻女子，皆有棺椁及随葬品。根据《战国策·齐策》等文献记载，齐宣王时临淄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大超过了东周的王城。

第四，从1973年起对春秋中期（秦德公元年，前677）至战国中期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雍水之北，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3 200米，东西宽约3 3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夯筑，宽3米至8.8米，残存最高处达7.9米。在城内姚家岗、马家庄、铁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群。其中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的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坐北朝南，四

周有围墙。北部居中为祖庙，面阔 20.8 米，进深 13.9 米，绕以回廊。左侧为昭庙，右侧为穆庙，南面是大门。在中心空地——中庭发现有人、车、牛、羊各类祭祀坑 181 座，显系秦公的宗庙。马家庄三号大型建筑群遗址，长 326.5 米，宽 59.5 米至 86 米，四周亦有围墙。是一组五进院落、五门三朝的建筑，可能是秦公宫殿朝寝之所在。在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发现了一座可以藏冰 190 余立方米的“凌阴”（冰窖）遗址。在北城墙南面偏东 300 米处，发现了“市”的遗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 180 米，南北宽 160 米，四周有夯土围墙，每面各开一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中部偏西处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出土了三批共 64 件窖藏的青铜建筑构件，可能是古代文献所记的金釭（gāng）。大多呈长方形筒状，有的作曲尺形，表面多饰有蟠螭纹。用来套在木质梁枋上，既起保护作用，又达到装饰效果。类似的青铜建筑构件在陕西临潼和咸阳等地也有发现，说明东周时期宫廷建筑中已广泛使用青铜建筑饰件。这些青铜建筑饰件，金光闪闪，可以起到彩绘所达不到的富丽效果。此外，在雍城遗址西南八公里的三畤原上还发现了秦公陵园，陵园以北八旗屯、高庄等地为中、小型墓葬区。

第五，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都郢城遗址不断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位于湖北江陵城北五公里处，因其在纪山之南，所以又称为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 4 450 米，南北宽 3 588 米。夯土城墙高出地面达 3.9 米至 7.6 米，底宽 30 米至 40 米，四周环绕

有护城濠。现已探明城门七处，东墙一座，西墙、南墙、北墙各二座。其中有两座水门，现今朱河和龙桥河穿过城墙之处即当年北墙东部及南墙西部的水门之所在。已经发掘的西墙北门有三个门道，两侧有门房。南墙西部的水门亦有用四排竖立木柱组成的三个门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基 84 座，以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呈中轴线排列。最大的建筑基址长达 130 米，宽 100 米，是宫殿区之所在，周围还发现有宫墙遗迹。在城内还发现了 500 座以上的水井，并发现有陶井圈、竹井圈或木井圈。有的井底放置一个大陶瓮，当为冷藏窖。在城内西南部陈家台发现铸铜手工作坊遗址，在城内北部龙桥河两岸发现有制陶手工作坊遗址，出土有筒瓦、板瓦、瓦当及陶器等。在城址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发现了 30 余处规模巨大的墓葬区，其中大、中型墓达数百座之多，大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已发掘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有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马山一号墓（出土绢、纱、锦、绣等大批丝织品）、包山二号墓（出土大批卜筮祭祷及司法文书竹简）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郢都的繁荣。

七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

春秋时期周王的陵墓尚未发现，但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它们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首先，从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了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南面三畤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东西长七公里，南北宽三公里。陵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还发现了总长达7 000余米的防卫壕沟。整个陵区已发现44座双墓道或单墓道的大墓，分属于13个小陵园。其中陵区中部偏北的一座陵园规模最大，从南向北排列着两座双墓道大墓及一座单墓道大墓，每座大墓东南侧都附有一个长方形坑（可能是车马坑）。最南面的一号墓规模最大，1976年至1986年发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向，长59.4米，宽38.8米，深24米，东、西两端的斜坡墓道宽7米，长达270米，总面积达5 330余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墓中主椁室长15米，宽约6米，高约3米，用三层巨型方木套接而成。椁室外面填木炭，最厚处达3米。椁室上部及四周埋有男女殉葬人182人，皆有棺木。此墓已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玉璧、玉圭、玉璋、玉璜、20余件石磬、金带钩以及10余件铁铲、铁臿等。根据石磬上所刻文字，此墓可能是春秋晚期秦景公（前577—前537）的陵墓。

其次，195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掘了春秋晚期蔡昭侯（前518—前491）的墓葬。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米，深3.35米。棺椁已朽。墓中出土随葬品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青铜礼器主要有鼾（yú）

（镬）鼎一件、升鼎七件、饲鼎九件及小鼎一件、簋八件、鬲八件、簠四件、敦二件、豆二件、笾（biān）二件、尊三件、壶二件、盉一件、尊缶四件、盥缶二件、鉴四件、盘四件、匜一件以及编镈八件、甬钟十二件、钮钟九件、钲一件及錞于一件等。说明当时诸侯也用九鼎，为研究春秋时期的礼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许多件青铜礼器上铸有铭文，如“蔡侯申之饲鼎”等。据此可知为蔡昭侯申之墓。另外还有两件吴王光鉴，系吴王光嫁女于蔡侯所作的媵器，反映了蔡、吴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外还出土有青铜戈、矛、剑等兵器和軎、辖、镳、衔等青铜车马器以及玉器、漆器、金叶等。

第三，1990 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虢国国君的墓葬二座。其一（M2001），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南北向，长 5.3 米，宽 3.55 米，深 11.45 米。葬具为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 3 200 余件，其中青铜器 1 700 余件。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羞鼎二件、簋八件以及鬲、豆、盨、壶、盘、匜以及甬钟一套八件、钲一件等。其中许多件铸有铭文，如“虢季作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此外还有玉茎铜芯铁剑等武器以及缀玉面罩、玉佩饰及金带饰等。其中铁剑长达 33 厘米，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验，为人工冶铁制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在墓葬附近 4 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 46 米，宽 5.2 米。其二（M2009），墓室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 5.6 米，宽 4.4

米，深约20米。重棺单椁。随葬品较M2001更为丰富，仅青铜鼎就多达30余件，有些上面铸有“虢仲”铭文。另有编钟四套，其中一套八件钮钟铸有长篇铭文。墓中随葬的玉器多达800余件（套），有的上面有墨书或刻写的文字。另有种类繁多的圆雕动物形玉饰件，造型生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玉器为商代遗物。

此外，1956年至1957年曾在这里发掘了虢太子的墓葬。墓室亦为长方形，长5.8米，宽4.25米，深2米。葬具为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970件。其中青铜礼器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簋六件、鬲六件以及甗、豆、壶、盘、盉和甬钟一件、钮钟一组九件以及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两件铜戈的内上铸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铭文。在该墓西侧10米处还附葬有车马坑，坑底南北长29米，东西宽3.3米至3.5米，内部埋有10辆车、20匹马及3只狗。这一切均与虢太子的身份相符。同时在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许多随葬五件、三件或一件青铜鼎的中小贵族的墓葬。这些都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诸侯国君墓葬及其墓地礼制的珍贵资料。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战国时期（前475—前222），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中、晚期铁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称雄的局面。在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空前活跃繁荣，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变法，例如魏国李悝（kuī）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最终确立了封建制度，奴隶制宣告结束。因此，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也已进入了尾声。具体来讲，青铜礼器大为衰落，战国中、晚期时虽然还有一些精美的礼器，例如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错金方罍及方鉴等，但大多数礼器已是素面，朴素无纹。并且，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为刻铭，一般很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其性质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而已。

但是，此时的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发展，青铜器的生产转向以日用品为主了。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广泛流通与使用。其次，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

十分精美的产品。再有，虽然此时铁兵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武器仍以青铜武器为主，并且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及其上的发射构件铜弩机。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经过了极其残酷而激烈的兼并战争，最后，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起，经过10年时间，至公元前221年灭齐，最终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几百年的诸侯分裂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这一切也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结束。秦汉以后虽然青铜货币与铜镜等仍在继续发展和使用，但铁器以及瓷器、漆器等已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一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城发现的战国冶铁遗址，面积达23 000平方米。发掘的熔铁炉直径已达0.84—1.44米，炉壁由里及外分为炉衬层、砂质炉圈层、泥质或夹砂的砖层、薄弧形砖和草泥壳层，耐火而坚固。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42

副87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锄、镰、镢等）、工具（斧、凿等）及车器等使用的铁质的内、外范，上有“右廩”铭文，系燕国官府手工作坊用器。经检测分析，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和加强的结构，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必须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冶铁致富的人，如邯郸的郭纵、魏国的孔氏、鲁国的丙氏等，家资巨万。此时冶铁业已成为民间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块炼铁及白口铸铁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退火处理）从而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使铁器得以广泛地使用。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经过对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丛葬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兵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使兵器的刃部更加坚硬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淬火兵器。

在上述冶铁业与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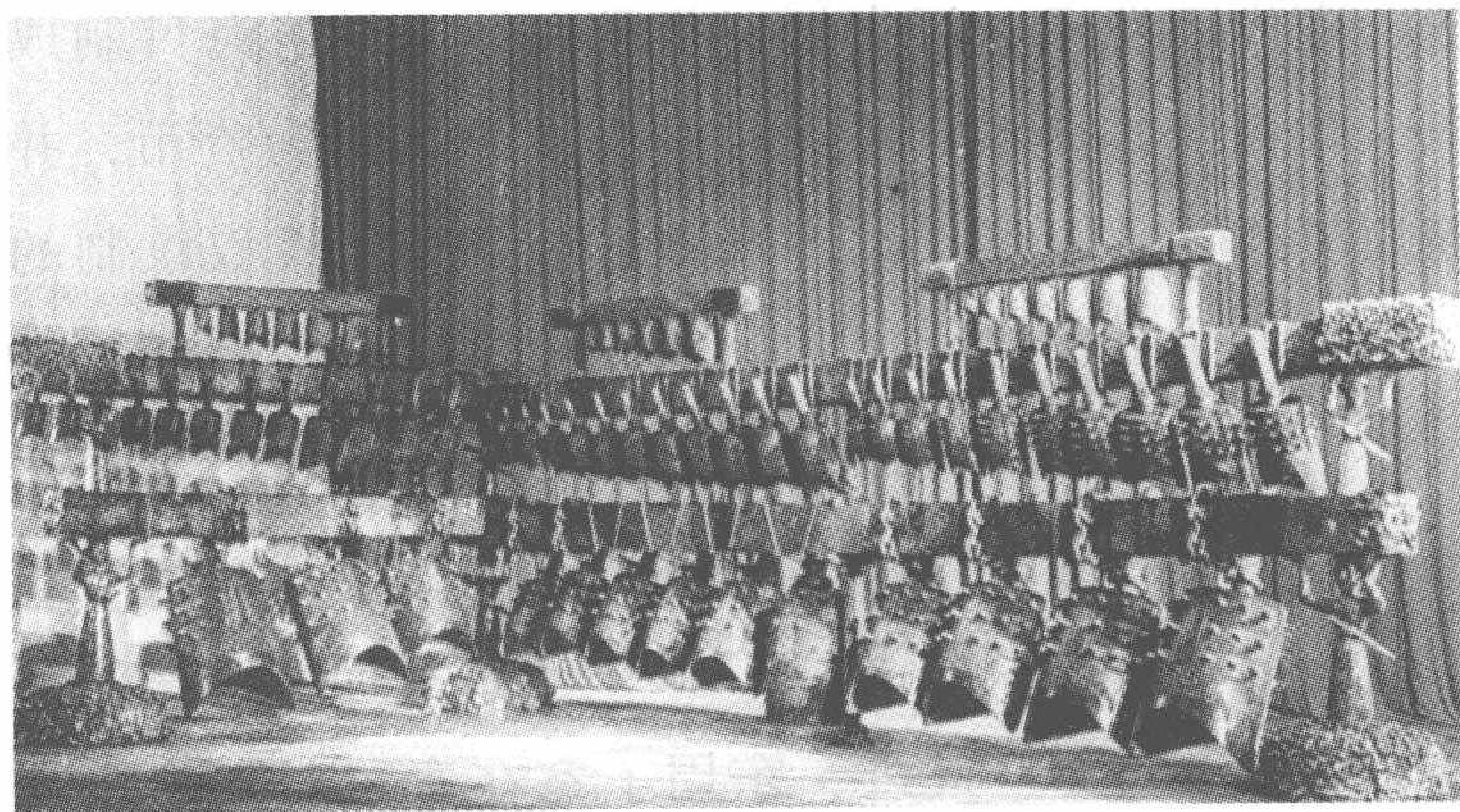
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和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达95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V字形铁口犁铧冠、臿、镢、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锛、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印证了古代文献如《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yáo）、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的记载。

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产生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

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共计八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赠送的镈（据其铭文可知，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共计65件，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件数最多的青铜编钟。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髹（xiū）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绘的木槌六个。钟架的中、下两层横梁由六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三组钮钟共计19件，中间一层悬挂三组甬钟共计33件，下面一层悬挂两组甬钟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镈。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重达2 567公斤，十分惊人。经研究，这套编钟也是用范铸法铸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铜以外，含锡12.49%—14.46%，含铅一般小于2%，其他杂质很少。这种合金配比科学合理，使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良，音色丰满悦耳。经金相组织检测，当时可能已采用预热陶

范、延时脱范，利用陶范及钟的余热进行均匀退火以改善金相组织，以减少残余应力，保持音频稳定，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高峰。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 2 828 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和钟上的音阶铭文相符，至今音色优美。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在国际通用的 C 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宽广，包括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 12 个半音齐备，已趋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具有一定的旋宫转调能力，至今可以演奏各种曲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战国时期的青铜



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北随州出土）

铸造工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音响设计的要求。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北京市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曾为各国驻华使节及朋友们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无不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音乐及青铜铸造工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热烈鼓掌和表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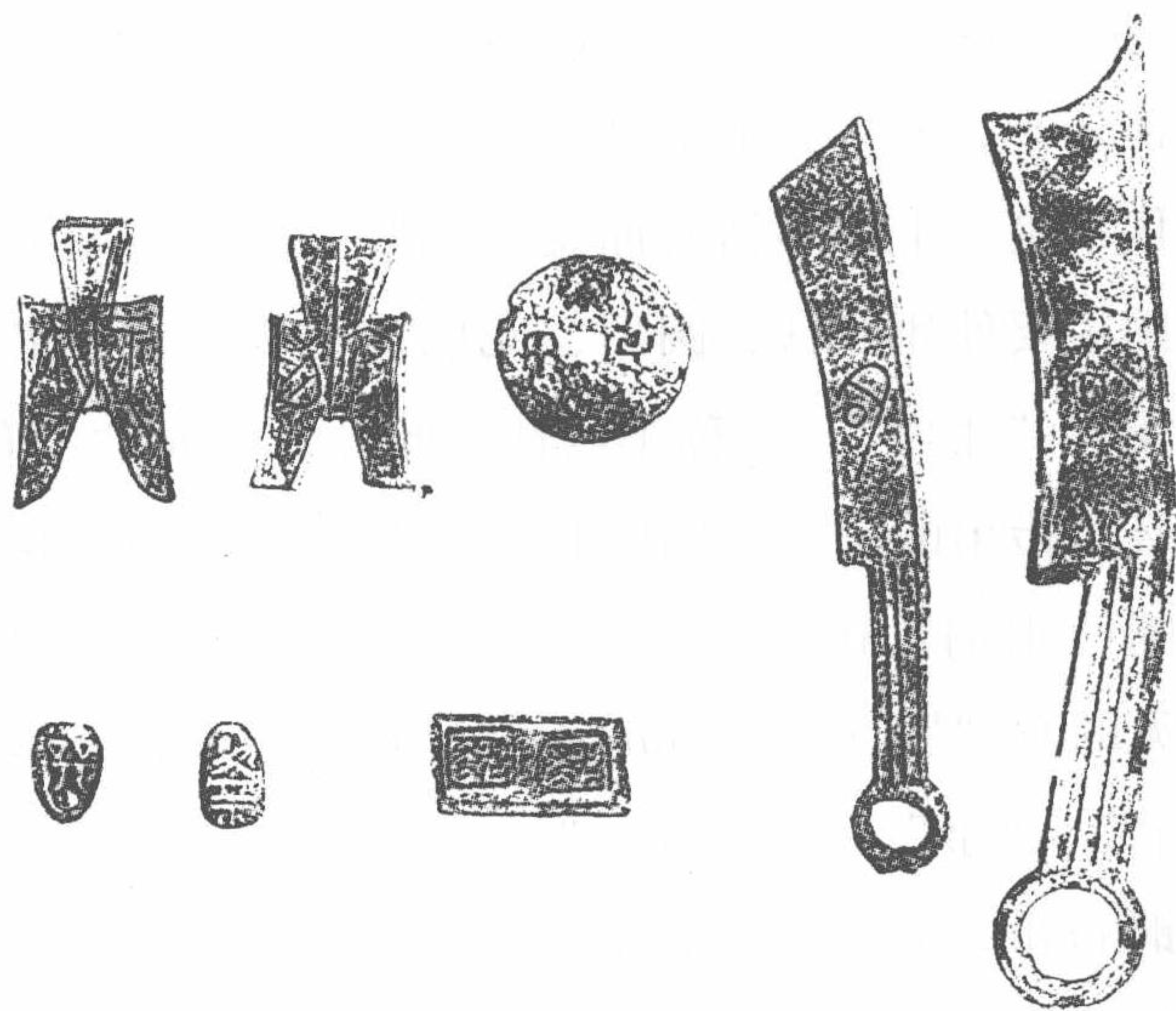
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编磬四组32枚、鼓四件、瑟十二件、五弦琴及十弦琴各一件、笙四件、篪（chí）及排箫各两件等乐器，生动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队阵容的庞大和乐舞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三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商代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同时，海贝也作为货币来使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随葬有海贝6 800余枚。商代还发现有用青铜、兽骨和蚌壳等仿海贝制成的铜贝、骨贝及蚌贝等。西周时期仍以海贝作为货币，并使用铜块等作为称量货币。春秋中、晚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此时开始出现了金属铸币。1959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遗址出土了12枚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仿照当时使用的青铜铲的形状铸造的货币，高约12厘米，耸肩尖足，平裆，其中一件有面文六字。柄部中空，称为空首布。此外，东周王室在春秋时期也出现了空首布，有大型、小型平肩或斜肩桥足空首布，面文大多

一字，如“王”字，乃“王城”之省称。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面文有“东周”等。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促使青铜货币有了空前发展，广泛流通与使用。由于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当时各国所使用的青铜货币的形状也各有不同，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及铜贝四种。韩、赵、魏主要使用布币，其特点，柄部已不再是中空的，而与铲身同为扁平状，称为平首布。魏国的布币大多是平首、平肩（或圆肩）、方足、圆跨。币面上有的铸有地名，如“安邑”、“蒲阪”、“阴晋”、“共”等。有的币面铸有币值铭文，如“梁奇（或释充（夸））釿（jīn，即“斤”的本字），百当寽（luè）”、“梁正币（或释尚），百当寽”、“梁奇釿，五十当寽”、“梁半币，二百当寽”等。



战国货币

因此，魏布一般分为“半釿”、“一釿”、“二釿”三等。据测定，一釿约为 12—15 克。赵国的布币多为平（或圆）首、圆肩、尖（或圆）足，一般分为两等。币面有的也铸有地名，如“晋阳”、“兹氏”、“榆即（次）”、“离石”、“藺”等。此外，赵国布币有的上面有三个圆孔，称为三孔布，其面文有“南行唐（正面）、十二铢（背面）”等。此外，赵国也有刀币，小而直，通称直刀，面文有“甘（邯）单（郸）”等。韩国的布币大多为小型方肩、方足、方跨布，面文有“平原”等。但到战国晚期，韩、赵、魏均流行小型方足布。

齐与燕主要使用刀币，因其形状仿自刀削，故称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且厚重，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齐法化（货）”、“齐之法化”、“齐返（或释造）邦張（长）法化”、“節（即）墨之法化”等。燕国刀币，早期是尖首刀。晚期形体较小，其刀背有磬折与弧形两种，弧背时代较早，磬折时代较晚。上面多铸有面文“明”字，又称明刀。

秦国主要使用圜钱，圆形，无廓，中为方穿（孔），上面铸有铭文“半两”，又称半两钱。此外，还有“文信”等圜钱。必须指出的是，秦国同时还使用布帛作为货币。

楚国使用铜贝币，椭圆形，通称蚁鼻钱。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哭（巽（xùn），或释贝）”、“桊（圣朱）”，还有“君”、“金”、“折（釿）”、“匋”、“行”等。楚国亦有少量铜布币，有大、小两种，长方、平肩、方足。大者首部有圆孔，面文为“旆（pèi）钱当釿（旧释‘殊布当

釿’）”，可能是楚并吴越等地后铸造的地方性货币。楚国同时使用黄金铸币，在方形或圆形的金钣上，凿印有正方或圆形小印，印文常见有“郢爯（称，旧释爰）”、“陈称”，此外还有“鄗称”、“专称”、“卢金”等。1974年在河南扶沟古城内出土了郢称等金币、圆形金饼、马蹄金及银币18枚。银币皆为布币，长方铲形，有大、中、小之分，除一枚空首外，余为实首，为东周银币的首次发现。

必须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晚期，除楚国以外，各国大多已制造并流通圜钱。如东周铸造的圜钱，直径约2.5厘米，圆穿有廓，面文有“西周”、“东周”等；魏国的圜钱，圆穿无廓，面文有“共”、“漆垣一釿”等；赵国的“藺”、“离石”圜钱等；燕国的“明匕（货）”圜钱等；齐国的“賹（ài）化”、“賹四化”、“賹六化”圜钱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四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

度量衡器是测量长度、容积或重量的器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牙尺，分寸刻画，采用十进位制。经实测，一尺约为15.78—15.8厘米。到了战国时期，

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实物租税逐步代替劳役地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便于商品交换与征收赋税，精确耐用的青铜度量衡器出现了。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扁平长条形，长23.1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一侧刻10寸。

战国青铜量器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方升。长方形，一端有柄。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器身左侧刻铭文32字："（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即以16 $\frac{1}{5}$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说明此时已经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时期在数学运算和器械制造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经计算，一升为202.15立方厘米。底部后来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是以商鞅方升作为标准的。此外，清咸丰七年（1857）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青铜量器：子禾子（田和）釜、陈纯釜、左关鉌（hé）。子禾子釜经实测容积为20 460毫升，推知一升为204.6毫升。子禾子釜腹部表面还刻有铭文90余字，说明左关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或处以刑罚，表明当时对量器已有校量与管理制度。

战国时期的青铜衡器有铜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环形权。例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楚国天平与

铜环权。天平为木杆（衡），扁平条形，长 27 厘米。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钮。杆两端内侧 0.7 厘米处各钻一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铜盘直径 4 厘米。铜环权一套共计九枚，分别为半斤、四两、二两、一两、十二铢（zhū）、六铢、三铢、二铢、一铢。据半斤权重 125 克推算，当时楚国一斤重为 250 克。这种天平和铜环权大概是用来称量楚国的黄金货币（郢称等）使用的衡器。一种是半球形权（少数呈瓜棱形等），顶端有鼻钮。例如 1964 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高奴权，上面铸有铭文 16 字："三年，漆工配（熙）、丞诎（qū）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此外，并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元年诏书及"高奴石"三字。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权高 17.2 厘米，底径 23.6 厘米，重 30 750 克。据此推知战国秦一斤约合 256.3 克。此种形制的秦权，也有用铁铸造的，上面往往镶嵌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铜诏版，建国以来在山东文登、内蒙古敖汉旗老虎山、山西左云等地均有出土。

五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在古代，最初人们是用陶盆盛水以鉴容，因此，盆又称为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开始用青铜来制作镜子。多为圆形，正面微凸，光洁明亮，用以鉴容。背面中间有钮，用以系绳悬挂。周围铸有纹饰，富有艺术性。在中原地区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晚期的铜镜。圆形，有的背面铸有叶脉纹、连珠纹等纹饰，中央有半环形钮，制作粗糙。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镜发现也很少，说明在青铜礼器发达的时期，青铜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是不发达的。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青铜礼器衰落了，而铜镜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青铜器的生产大为发展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例如在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含锡较高，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秦汉以后，铜镜继续发展，出现了铸有铭文的铜镜，尤其是透光镜（即当光线照射到铜镜正面时，能反射出镜背面纹饰的大致图像）的出现，反映了制镜工艺的高度水平。隋唐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如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清时期玻璃镜开始流行，取代了铜镜，成为主要的鉴容用器。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钮（扣），一般为琵

琶形。前端较细，作成钩首，多呈兽首形。钩身微曲。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周边地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的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带钩、银带钩、铁带钩与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而且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块，两端的玉块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带钩衰落，被铰具（带扣）所代替。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内盛油脂或蜡烛，点燃用以照明。其形状多仿陶豆，但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造型复杂生动的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首人形灯，高66.4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情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螭龙蟠绕，并有一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生动，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秦汉时期青铜灯更为盛行，著名的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

出土的长信宫灯等。

六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君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份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份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以出现。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多为鼻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或烙在马匹身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2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和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常见边长1.5厘米者。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

和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通称为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印章材质仍以青铜为主。明代以后，石印发展起来。治印包括印文、边款、印钮的雕刻，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名家辈出，如明代的文彭、何震，清代的程邃、丁敬、邓石如、赵之谦，现代的齐白石等。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留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国信陵君让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体例证。实物遗存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郪虎符，上有错金铭文四行 40 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fán）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亦用青铜铸成。例如 1957 年及 1960 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作仿竹节之状。车节长 29.3 厘米，宽 7.3 厘米，厚 0.7 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 147 字。共发现三枚，原应有五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

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64字。共发现二枚，原亦为五枚，合成一个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前323）发给鄂君启的用车或船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七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尤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很有名，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丝织品“冠戴衣履天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由于楚国地下保存条件较好，所以在考古工作中以楚国地区的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绨、罗、锦、绣、绮、绦和组，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其中以绢最多，最稀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50根、纬线20根；最细密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164根、纬线64根。共出土了衣着16件（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二件、绵袴一件、帽一件）、丝衾（被子）三床等。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

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腰宽59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领外缘为田猎纹绦，内缘中部及大襟上部内侧为龙凤纹绦，内缘两侧为凤鸟菱形纹锦，袖和下摆缘为大菱形纹锦，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珍品。



战国凤鸟花卉纹绵袍（湖北江陵出土）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八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

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奁（lián）等妆奁器，鼎、豆、壶、钫（fāng）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胄、盾、弓、剑椟、戈矛的竹木柲等武器，车、肩舆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人们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薄板胎显著增多，并且出现了竹（蔑）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镶嵌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漆器表面贴嵌金箔、银箔或铜片的工艺。金箔等被剪成各种花纹图案，上面有的并有针刺纹饰，富丽堂皇。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成的扣箍，称为釦（kòu）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还使器物更加美观。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鋬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涡形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或私人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湖南长沙五里牌 406 号楚墓出土的皮革胎漆盾等。尤以 1965 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高 15 厘米，宽 51.8 厘米，厚 3 厘米。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又如 1986 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左尹邵㝕墓）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漆奁，器外壁以黑漆为地，其上用橘红、土黄、棕褐及青色等绘出贵族乘车出行及迎宾的场面。共绘有 26 人、车 4 辆、马 10 匹等。有的静止，有的奔跑，天上有飞鸟，地上有摇曳的树木，是罕见的漆画作品。

九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现在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迁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

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15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6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可能是宫城的所在。在宫城内外已发现2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现高6米。夯土筑成，呈凹字形阶梯状。其上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西半部上层正中为主体殿堂，周围及下层为卧室、盥洗室等，底层为回廊。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夔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三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此外，在宫城西面及城外西南部发现有铸铁、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西南。赵自敬侯元年（前386）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至公元

前222年被秦始皇灭亡，一直都于邯郸。赵都邯郸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城（廓城）组成。二者相距仅60余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8米，发现有陶排水槽等。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残高16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以及素面和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西城墙长约6 000米，南城墙长约4 000米。1995年又钻探出东城墙与北城墙，估计全部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前375）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原为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wěi）水（双洎（jì）河）与溱（zhēn）水（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 500米，东西最宽约5 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8米。在内城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为口部略大于底部的长方形竖穴，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深2.4—3.35米。室内地下有五

口陶井，深2.5米左右，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冷藏窖。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西城内东南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此外，1971年在东城内东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一坑青铜兵器，出土戈、矛、剑等180件，其中170余件有铭文，是战国晚期兵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蓟和下都武阳等。根据考古发现，蓟城大约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明刀等。燕下都武阳城的始建年代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但战国晚期燕昭王时已很繁荣。城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1930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是战国都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北部又有东西向的隔墙一道。东城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北又有老姆台等夯土建筑基址，这些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达11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年在城内发现高达74.5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以及三角形蝉翼纹、黼

黻（fú)纹脊瓦和垂脊瓦、大型圆筒形虎头状口的泄水管道等。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带有戳印铭文，大多为“陶攻（工）某”，有的字数较多，内容为年月、左（或右）陶尹、左（或右）陶倕（chuí）某、敀（pò）某、左（或右）陶工某等，为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标记。此外，在内城西北隅的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成排墓葬，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业经考古发掘，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廓城。

十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前433）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

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 1.26 米，腹径 1 米，重达 327.5 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ū）和带矛车害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 10 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 48 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 240 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 12 696 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3 年和 1938 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 200 米、高约 2 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 41.2 米，南北宽 40.2 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 11 米、宽约 9 米至 10 米。中间放置长约 3 米、宽约 1 米、高约 1 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 4 000 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 59.7 厘米，口径 60.5 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 53.6 厘米，口径 45.9 厘米。盖上刻铭 33 字，器上

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铄（qiáo）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50年至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脚下的一个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号墓（魏王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15米，深约17米。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为长方形，长9米，宽8.4米，高2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止盗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27.5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一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简册、玉圭和大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二号墓被盗严重。但一号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壶四件、鉴四件、盘一件及匜一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一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礨（cuò）墓（一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封土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顶的享堂。封土南面有两座车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杂殉坑。

墓室为土坑竖穴，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南北长 14.9 米，东西宽 13.5 米，深 8.2 米。椁室两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嚳铁足铜鼎，高 51.5 厘米，口径 42.7 厘米。腹部刻有铭文 77 行 469 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嚳方壶，腹部刻铭 450 字；妾盗（cì）壶，腹部刻铭 182 字。内容丰富，除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公元前 314 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该墓还出土了中山国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用器及罕见的青铜兆域图版。图版为长方形，长 94 厘米，宽 48 厘米，厚 1 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中还有铭文 460 字，包括中山王命营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树形铜灯、银首人形铜灯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构等反映游牧生活的制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十一　简牍、帛书与帛画

1949年以来在楚、曾、秦等国的墓葬中，由于当地地下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了几批战国时期的简牍。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几批竹简、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四川青川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木牍等。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使用的主要的书写材料，简是修治好的细长的竹片，牍是修治好的较宽的长方形薄木板（或竹版），在上面用毛笔书写文书等。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约前433）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共计240余枚，6 686字。简长72厘米至75厘米，宽约1厘米。内容记载用于丧仪的车马兵甲，属于“遣策”一类。遣策即墓中随葬品的清单，是竹简中最常见的。例如湖南长沙仰天湖一号墓及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可与墓中随葬品相互对照。而在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组108支竹简，约600字，内容有“周公”、“先王”、“三代”等，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书籍。此外，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又有记载墓主人患病期间进行占卜及祭祀祷告于神祇和祖先等的内容。荆门包山二号墓（左尹邵㝿墓）出土

有字竹简 278 枚，共计 12 472 字，内容有遣策、卜筮祭祷记录及文书三类。在祭祷简中记载了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和媸酓（xióng）（鬻熊）的先后世系，可与《史记·楚世家》相互印证。文书简中包括有狱讼、审理案件的记录，对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有重要价值。青川木牍内容则是秦武王二年（前 309）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等。

楚帛书，1942 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书写于白色丝帛之上，长 47 厘米，宽 38. 7 厘米。中间有墨书两段。一段 8 行，为正书；一段 13 行，方向相反。内容提到伏羲、女娲、共工、禹、契等，还涉及天象灾异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可能是数术性质的佚书。周围用彩色绘出 12 个神的形象，有的三头，有的鸟身等，旁边题有神名，与《尔雅·释天》12 月名相合，分别代表一年中的 12 个月，按上夏、下冬、左春、右秋排列。每个神旁又附有一段关于本月宜忌的文字。整幅帛书总计共 900 余字。四角又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植物枝叶图像。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除用简牍外，还用丝帛作为书写材料。根据《晏子》外篇第七："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至迟在春秋齐桓公时已经有了帛书。但由于丝帛在地下不易保存，所以楚帛书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弥足珍贵。

楚帛画。已发现两件。一件为 1946 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画在白色丝帛上，长 31 厘米，宽 22. 5 厘米。画一个侧立的广袖细腰长髻女子合掌立于新月形物体之上，

左上方有一龙一凤。另一件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之中，与上述楚帛书同出于一座墓。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缘包裹着一根细竹条，上系有棕色丝绳。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上面绘有一个高冠长袍佩剑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船行，下面有鱼，后面有鹤。据研究，帛画上的人物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帛画的内容是表示墓主人的灵魂在神灵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密切关系。这种帛画的性质是葬仪时使用的铭旌。这两幅帛画构图巧妙，形象简洁，线条流畅，代表了战国时期绘画达到的高度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在中原商、周王朝先进的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周边各族人民创造的青铜文化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朱开沟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北方燕山南北地区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及北京、天津等地区的一种地方性青铜文化，其时代大致属于夏商时期，碳 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1500 年。考古学家因其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下文化层，所以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根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夏商时代燕亳族的古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已出现了仿中原的大型青铜礼器。例如 1981 年 5 月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头牌子大队敖包山前出土的一件青铜甗和两件青铜鼎。其中甗高达 66 厘米，口径 41 厘米，腹外饰有三道弦纹，腹内壁铸有铭文"贮

墉”二字。其中一件鼎，圆形，颈部及三足上部均饰以兽面纹，高54厘米，口径38厘米。另一件鼎，亦为圆形，颈部及足部饰弦纹，高67厘米，口径37厘米。但它们的铸造工艺还比较原始，质地亦较粗糙。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较多的青铜耳环、指环及杖首等，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经常发现制作精致的金耳环、玉璜、玉珠、玉管、玉牌、玛瑙珠与绿松石珠等装饰品。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石铲、打制束腰石锄、石镐、石镰、石斧、石凿及细石器石镞、刮削器等。当时的聚落大多位于河流两岸的高地上；往往成组，由一个较大的聚落及其周围几个小的聚落组成。在聚落周围发现有用石块垒砌或用夯土筑成的围墙以及壕沟等防御设施。较大的聚落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周长达500米以上，土筑围墙的门址还有用石块垒砌的遗迹。村内一般有数十座或百余座房屋，房屋有半地穴式的，也有用石块或土坯砌墙的，大多为圆形，直径约为2—3米。在聚落旁边有墓地，例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有近千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多有木或石质箱形葬具，脚端大多有小龛放置随葬品。其中大多为小型墓，但已经出现了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随葬有表示身份的制作精致的石钺等，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大墓中并且随葬有精美的彩绘陶鬲、罐以及酒器爵、鬶等。陶胎多为橙红色，表面为黑色，并经磨光，

上面用白色及红色绘出精美的云纹及兽面纹等。这些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以及酒器爵、鬶的造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地出土者很相似。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有卜骨，先钻出小圆窝，再加以烫灼。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夏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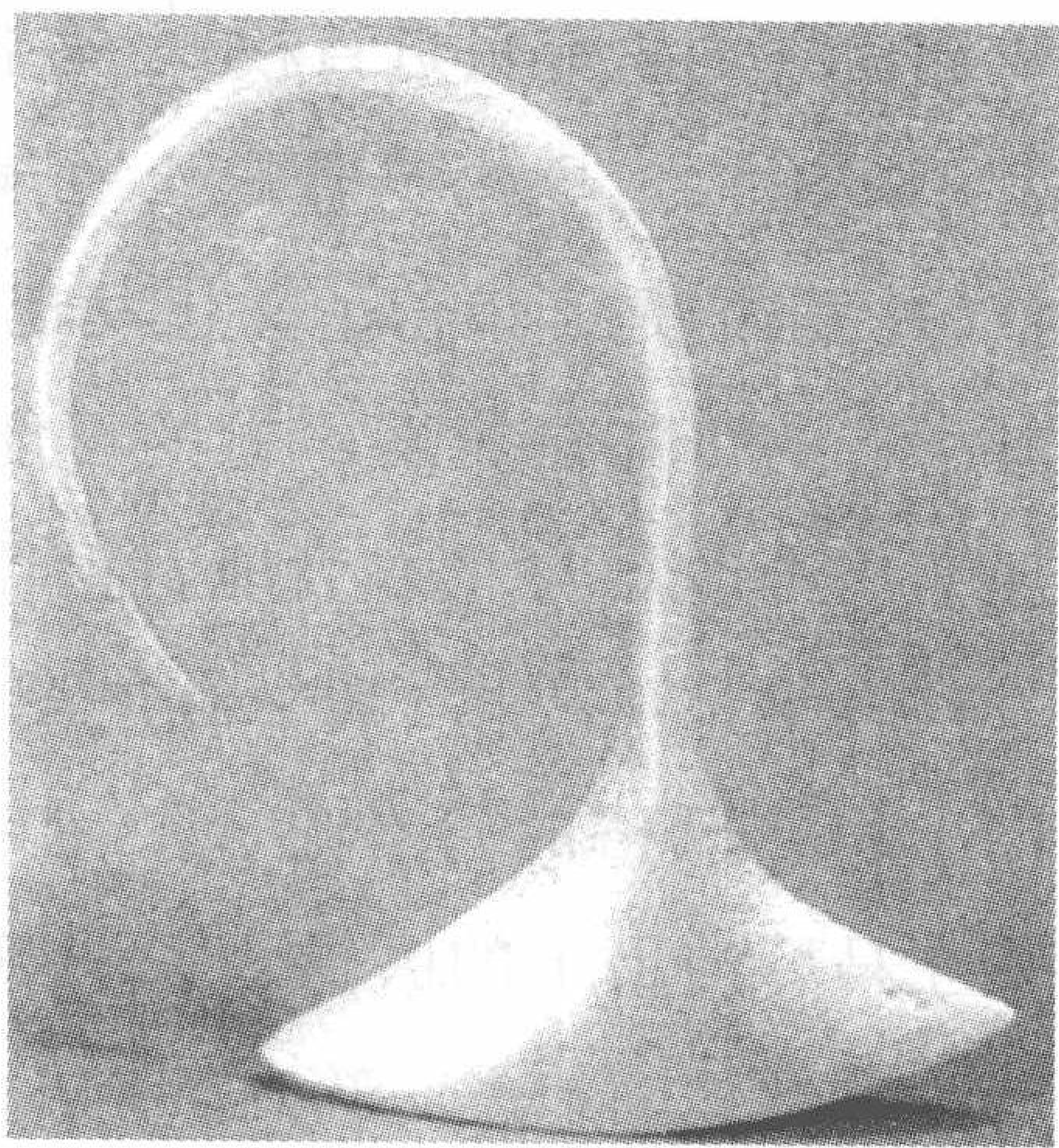
再者，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燕山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面貌有所差别。燕山以北地区以夹砂灰陶为主，常见筒腹鬲、鼎、钵等，彩绘陶器较为发达。而燕山以南地区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常见鼓腹鬲、折肩罐、高圈足簋等。因此，目前考古学界或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燕北与燕南两个类型。其中燕北类型可以再细分为几个类型。

在燕山以北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青铜文化是魏营子文化。这是因该文化首先于1970年在辽宁朝阳魏营子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时期。魏营子遗址位于小凌河支流的一个河湾台地上，长约500米，宽约200米。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及红褐陶为主，大多为素面，部分饰绳纹，并有压印三角纹组成的带状纹。器类有口沿贴饰花边状堆纹的鬲、盆、鼎、甗、豆、罐等。发现有较大型的墓葬，如M710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3.25米，宽2.76米，内置木椁。出土有青铜銮、害、当卢、圆形及长方形铜泡、梯形铜甲片、立雕羊头形车饰以及金臂钏、绿松石珠等。M7606出土有青铜胄等。1979年在喀左和尚沟A点墓地M1出土有

青铜卣（内置海贝近百枚）、壶各一件及金钏两件等。喀左县小东沟村道虎沟墓葬出土有铜镜一件及铜耳环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魏营子文化发现了多处重要的青铜器埋藏，其中有的可能是窖藏，有的可能与祭祀有关。其特点是中原商周青铜器与北方当地青铜器共存。例如喀左小波汰沟发现青铜器 14 件，其中有典型中原青铜器鼎、簋、盘等，同出北方风格的铃首匙及饰有锯齿纹、粟点纹的器盖等。喀左马厂沟出土的匽侯盂说明魏营子类型与西周燕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喀左北洞一号出土铸有“亚微、孤竹、父丁”铭文的青铜罍等，说明魏营子文化可能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孤竹国的文化遗存。

在燕山以南的北京、天津蓟县等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青铜文化是张家园文化。这是因 1965 年首次在天津蓟县张家园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中期。陶器以红褐色为主，大多饰绳纹。以高领鼓腹口沿带附加堆纹的鬲最具特色，此外有深腹盆、甑、钵及敛口瓮等。重要的发现有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葬及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等。刘家河墓葬出土有中原式青铜方鼎、圆鼎、鬲、甗、爵、斝、卣、罍、瓿、盘、盉及铁刃铜钺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金笄、金臂钏、金箔及金耳环等众多的金制品。其中金耳环，上部弯成半月形，下部为扁圆形坠，高 3.4 厘米，坠部长径 2.2 厘米，重 6.8 克。经检验，含金量达 85%。昌平白浮墓葬除出土青铜礼器及西周甲骨文之外，还出土了青铜铃首匕、鸟首刀、鸟首短

剑、马首短剑及管銎戚等具有北方特色的武器。根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伐纣以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张家园文化有可能是早已居处于此地的轩辕黄帝族的遗存。



张家园文化金耳环（北京平谷出土）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西周中晚期、春秋及战国时期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的燕山以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因其首先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而命名。碳 14 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 1000 年至前 300 年。在内蒙古林西大井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矿冶遗址，在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露天开采的矿坑 40 余个，出土有石镐、石锤等采掘工具。在五号采坑附近发现一排八座炼铜炉，出土有红陶鼓风管、炼渣与陶范，说明当时此地的青铜冶铸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数量大增，生产工具有青铜斧、凿、刀、锥等，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铜斧为銎斧，中间为圆銎以安木柄，上下一侧或两侧为窄刃。武器中以青铜短剑最具特点，剑柄和剑首常铸有动物形纹饰，剑身有曲刃和直刃两种。青铜装饰品有铃形、鸟形、双尾形及连珠形铜饰，富于地方特点。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仿照中原青铜礼

器而铸造的青铜鼎、鬲、豆形器等，其器形也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鼎为敛口、浅圆腹，口沿两旁有半圆形小耳，底下为三个细长尖足。同时也发现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鼎、簋等。这些都说明此时北方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已远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密切。

此时的聚落大多坐落在河边的高地上，房屋仍有半地穴式的，但也有在地面上构筑的。墓地在村落旁边，有的用石块垒砌成棺或椁。此时，有的墓葬形制较大。例如1963年辽宁宁城南山根发现的101号墓，长3.8米，宽1.8—2.23米，深2.4米，用砾石垒砌成石椁，内置木棺。共出土青铜器5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刀、斧、凿、锄等，武器有戈、矛、剑、镞、胄、盾等，车马器有銮、衔及铜泡等。青铜礼器既有当地铸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鼎、鬲、甑、觚、豆形器、双联罐、勺等，又有中原制作的鼎、簋、簠等。此外还有铜镜及各种铜饰牌以及一件金环和两件金丝绕成的小环等。又如1985年发掘的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有：六连豆一件，通高15.6厘米。中间为一个圆盆，周围以六个高柄豆作足。还有青铜双联罐、四联罐、祖柄勺、双联剑鞘、祖首形铜杖首、兽形铜牌饰等。此外还出土了金牌饰、金丝环等。同出有中原青铜器许季姜簋及守门人方鬲等。上述说明它们都是贵族首领的墓葬。与一般的仅随葬几件陶器的小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此时北方地区的奴隶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古代东胡族

的文化。

1985年至1989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南麓发现并发掘了几处春秋至战国初期的可能属于古代山戎族的墓地。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面积约22 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407座。墓室大多为长方形竖穴。以小墓为主，也发现有少数大墓，其中以250号墓规模最大。死者为一位25岁的男性，两耳戴弹簧形黄金耳环，颈下佩戴半月形金璜，腰间佩带直刃青铜短剑及铜削。左侧置有青铜马具，右侧置有箭囊与箭。椁室内随葬有中原制作的青铜礼器鼎、敦、盘、匜、铆等，以及当地制造的青铜双耳镀（fù）等。在墓葬的填土中埋祭有马、牛、羊、狗等。这可能是一个贵族首领的墓葬。整个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有刀、锛、凿、骨柄铜锥等，武器中以直刃青铜短剑最具特色，而且使用普遍，在上百座墓葬中都有出土。装饰品有铜耳环，铃形、人字形、连珠形坠饰等。从其文化面貌来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较为相似，同时与中原文化，尤其是燕、齐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开沟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因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发掘而命名。其年代约当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期。朱开沟文化分为三期。第二期（约当夏代）开始出现小件铜器（针、锥、耳环、指环及臂钏等）。第三期（约当商代中期），发现有长方形及方形的房址，例如F5002，长5.1米，宽5.6米，地表用白泥铺垫，并略经烧烤，中心偏东有圆形灶址。还发现有

男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陶器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花边鬲、蛇纹鬲、带钮罐和三足瓮等为主，但也发现有与中原商代中期（二里岗期）类似的鬲、豆及云雷纹簋等。尤其重要的是，出土了类似中原商文化的兽面纹铜鼎、爵、直内戈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直柄直刃青铜短剑、环首刀和圆牌饰等。说明朱开沟文化既是内蒙古中南部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又与中原夏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时，在今陕西省东北部及山西省西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分布有李家崖文化，因 1983 年在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的发掘而命名。古城址位于无定河东岸，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 495 米，南北宽 122—213 米，面积达 67 000 平方米。城墙用夯土及石块砌成，下宽 2.6—3.25 米，现存最高处达 3.1 米。城内发现有房址，如 C 区 F1，略呈长方形，坐西北朝东南，前宽 3.07 米，进深 2.95 米。前面中部偏西有一个门道，居住面经夯打及烧烤，后部中间有矮墙，西北部可能是灶址。此外还发现有圆形、长方形袋状灰坑及瓮棺葬等。出土的陶器有花边鬲、豆、簋、甗、罐、盆、碗及三足瓮等。尤其是出土了一件石雕骷髅人像，为豆绿色砂岩，略呈梯形，上宽 24 厘米，下宽 31 厘米，残高 42 厘米，两面平雕骷髅人像，可能与祭祀有关。

在山西石楼、柳林、永和、隰县、灵石、忻州、保德、偏关以及陕西清涧、绥德等地发现了许多约当商代晚期的

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其特点是中原商代青铜礼器与地方性的青铜武器铃首直刃剑、蛇首匕、马头刀等共存。例如1985年灵石旌介村发掘的两座竖穴土坑墓，其中二号墓为一椁两棺，男主人仰身直肢，女性侧身面向男子。填土中有一个殉葬人。随葬有铜爵十、觚四、卣一、罍一、鼎一、簋一以及戈十一、矛十九、兽头刀一、弓形器二及铃一件等。又如1971年保德林遮峪清理的一座墓葬，出土铜鼎二、铃豆（圈足内附有一个铜丸）二、卣一、瓿二以及铃首直刃短剑一、銎斧二、车軎二、铃二件和石琮二件、海贝112枚、铜贝109枚以及金弓形饰二件（含金量达95%，重215克）等。据研究，上述发现可能属于商代西北方国鬼方的遗存。

二　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

甘肃、青海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铜器，在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已经发现了小件青铜器。例如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出土了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青铜刀及碎渣。铜刀经化验，含锡约6%—10%，其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740年。而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时期，小件铜器有了更多的发现。例如1957年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刀、锥、凿、环等23件。经化

验，铜刀、锥含铜99.63%—99.87%，为红铜制品。其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1976年在青海贵南尕（gǎ）马台遗址出土了齐家文化的铜镜，形制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者相近。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甘肃、青海地区的青铜文化已发现的主要有辛店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辛店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辛店（甸）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黄河支流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中下游地区。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1991年以来发掘的青海乐都双二坪聚落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聚落周围有大型围墙与壕沟，内部发现有房址、窖穴与灰坑等，可能是辛店文化在湟水流域的一个活动中心。辛店文化彩陶发达，一般是在陶器表面先涂一层白色或红色的陶衣，然后在上面绘出黑色或红色花纹，有S形纹、涡形纹、双勾纹、平行纹、折线纹、犬形纹等。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彩陶罐，高19.6厘米，口径11.8厘米。胎为泥质红陶，侈口，敛颈，折腹，平底，颈部有双耳，肩部用黑彩绘出双勾纹（羊角形）纹饰。辛店文化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粟（小米）等，兼营畜牧业。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骨耜、石斧、石刀、石磨盘及石磨棒等。牲畜主要有羊、猪、牛、狗、马等。冶铜业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甘肃临夏张家嘴出土了青铜容器的口颈部残片，说明此时已能生产大件容器。此外还发现有青铜生产工具凿、锥，武器矛、

匕，装饰品铜扣、铜泡等。辛店文化陶鬲的形状与西周陶鬲接近，彩陶上的云雷纹与中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相似，这些都说明辛店文化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四坝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山丹四坝滩发现而命名，分布于甘肃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其时代约当夏代。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有羊、牛、马、猪及狗等。兼营农业，生产工具有打制石斧、石锄、盘状器、石球及磨制的石刀等。在民乐东灰山、西灰山遗址中出土了碳化麦粒，在玉门市火烧沟墓葬中的大陶罐中贮藏有粟（小米）粒。其墓葬的形制与葬式多种多样，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及二次（乱骨）葬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以双耳彩陶罐、四耳带盖罐和腹耳壶为代表。彩陶豆、双耳彩陶尊、方鼎、长方形多子盒等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并且普遍发现陶埙（xūn）。随葬青铜器也较为普遍，以火烧沟墓地最为突出，清理的 312 座墓葬中有 106 座随葬有青铜器，有斧、凿、镬、刀、镰、锥、针、锤、矛、匕首、镞、钏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些金、银、玉器、海贝以及玉石权杖头等，反映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并且还发现了一些有人殉或人祭的墓葬，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初期奴隶制社会。

寺洼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兰州以东地区，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青铜武器发现较多，有戈、矛、刀、镞等。此外

还发现有铜铃、铜镯及铜泡等。寺洼文化居民从事农业，但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往往发现有羊、牛、马的残骸。马鞍口双耳陶罐是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此外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有殉葬人及陪葬的车马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寺洼文化中发现了盛骨灰的陶罐，说明当时已有火葬。根据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代氐羌族实行火葬的记载，有的学者推测寺洼文化可能是古代氐羌族的文化。

卡约文化，又称为卡窑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前600年间。卡约文化的居民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是石铲、石斧、石刀及骨耜等。粟为主要粮食作物。此外还饲养家畜羊、狗、牛、马等。考古发现有方形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房址。墓葬以二次葬为主，大多殉葬羊、狗等，少数以人殉葬。在青海循化苏志发现两个用夯土筑成坟丘的墓葬。坟丘呈椭圆形，长径分别为20米或24米，短径分别为16米或18米，高1.5米。两个坟丘内分别有16座或10座单人墓葬，这种特殊的葬制比较少见。卡约文化发现的铜器有斧、钺、刀、锥、镰、戈、矛、镞、环、铜泡及小件装饰品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在西宁鲍家寨西山根出土铜鬲一件，高15.4厘米，口径11.8厘米。侈口，敛颈，深腹，分裆袋足，实足根较高，口沿上有两个半圆形立耳，与郑州

白家庄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鬲形制近似。

沙井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民勤沙井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至永登一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发现的铜器有铜刀、三棱式铜镞、铜铃、铜扣以及各种装饰品，如鹿形饰、鹰头形饰、涡形纹饰、犬形纹饰牌、连珠形铜饰牌等。从其铜刀与铜镞的形制看，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在永昌双湾尚家沟发现了一座沙井文化的城址，平面略呈三角形，南北长154米，东西最宽处为132米，城墙残高4米，城门向南。沙井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镞与骨镞等。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大多是在红色陶衣上，再绘以红彩的花纹。其中绘有鸟纹彩带的陶罐最具特色，鸟纹生动，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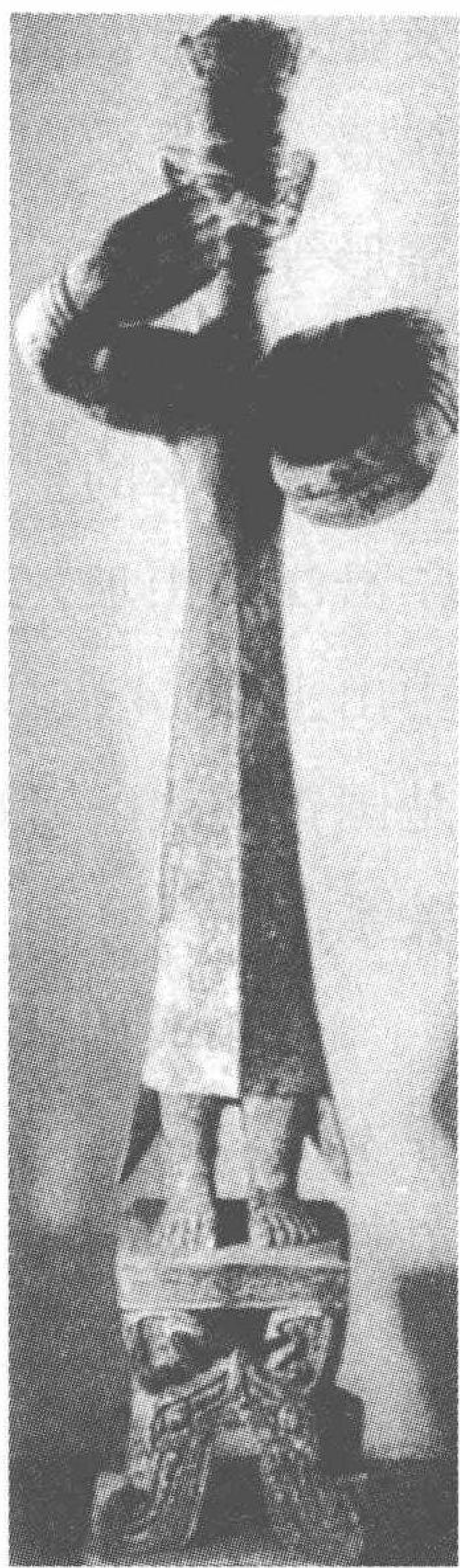
三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

商周时期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存在着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巴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巴蜀文化二者不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原青铜文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与《尚书·牧誓》等古代文献记载蜀国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等是一致的。

巴族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清江流域，以后主要活动于四川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西周时期建立巴国，国都在重庆等地；春秋时期比较强盛，与楚国关系密切，公元前611年巴人曾从楚师灭庸；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被秦国灭亡。巴文化的青铜武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扁茎、剑身较宽的柳叶形剑、空首折腰钺、圭形援直内戈、短骹（qiāo）弓耳矛等。青铜炊食器有釜、甑、鍪（móu）等。青铜乐器以錞于及钲最为常见。青铜器上常以虎纹作为装饰。并且在青铜兵器、乐器及印章等之上也常铸有虎形、鸟形、手形、花蒂形等符号，这可能是古代巴族或蜀族的文字，但至今尚未破译，不能通识。巴文化在墓葬上的特点是船棺葬，即用长约5米的整段楠木雕凿成船形，尸体置于船舱之中，葬于沿江的山坡之上。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巴国墓葬中出土了14件成套的青铜错金编钟与铜缶等，与战国中期楚国铜器相一致，反映巴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蜀人最初活动于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蜀与周王室联系密切，春秋时期蜀国强盛，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为秦所灭。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修筑于商代的早期蜀国的城址。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约为2.6平方公里。城墙系用夯土筑成，东、西城墙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 800余米，西城墙被鸭子河冲

毁一部分，残存800余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拐弯处，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1986年又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器物坑。一号坑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300余件以及大量的海贝及烧骨。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600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可能是早期蜀王宗庙中的祭祀用器，在其灭亡时，被烧砸后埋入坑中。其中青铜礼器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造型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2.62米，人像高1.72米，重180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高冠，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可能是宗庙中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形象。再有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30厘米，长尖耳，十分奇特，可能是蜀王先祖蚕丛的神像。玉器有圭、璋、璧、琮等礼器及戈、矛、斧、凿等兵器和工具。金器有杖、面罩、虎及金箔等。例如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金皮木芯，金皮重约500克，上面雕有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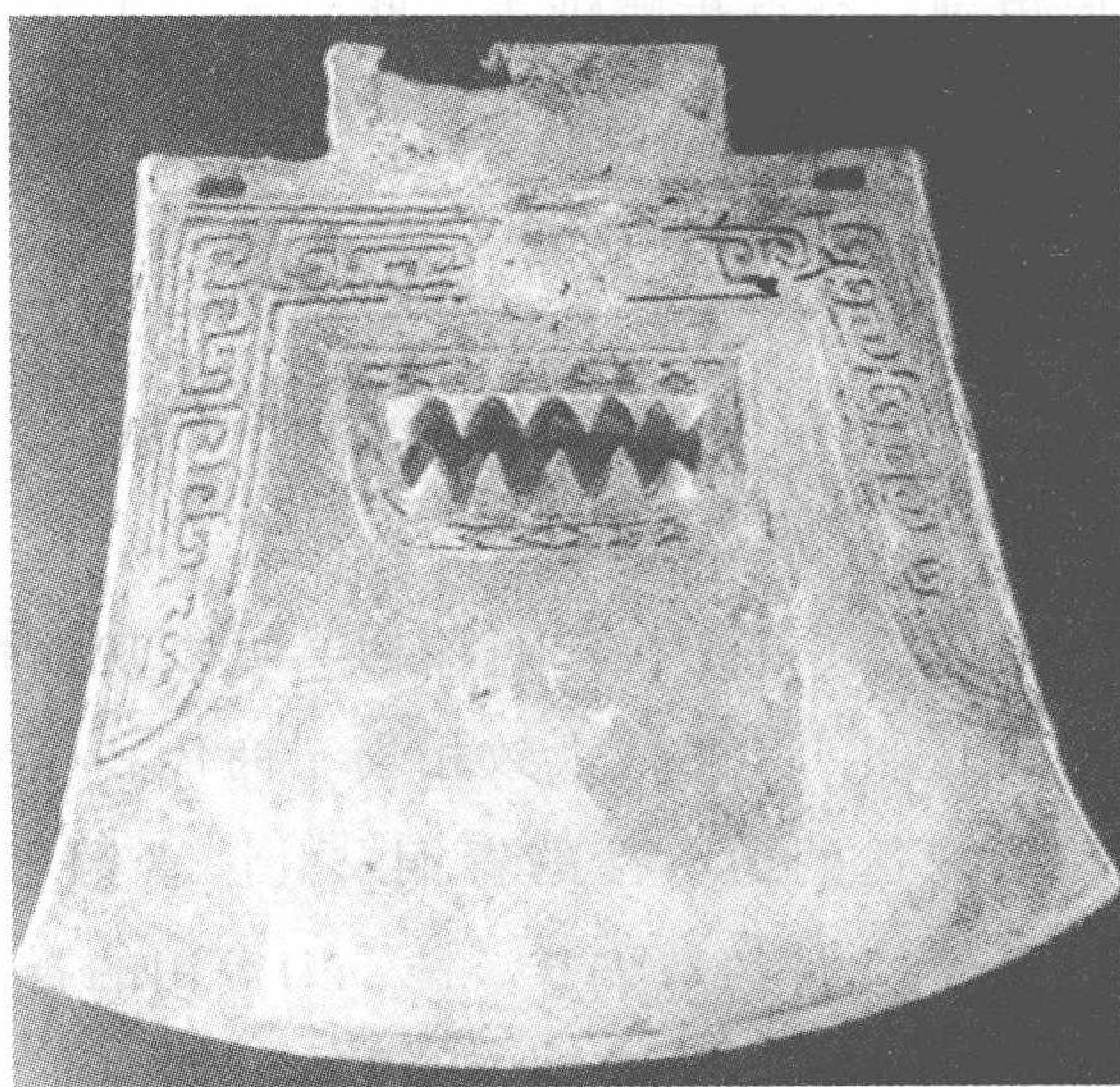
蜀文化青铜立人
（四川广汉出土）

鸟、鱼、穗等图案。此外，早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还有成都羊子山的一座祭坛基址，为正方形三级土台，高约 10 米，底部边长 103.6 米，台顶面积为 31.6 平方米。还有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面积竹木建筑遗址。晚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有 1980 年在新都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开明氏蜀王的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五件青铜列鼎（最小的一件盖内铸铭“邵之饲鼎”）和豆、敦、缶以及编钟等的形制纹饰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出土的兵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援两侧均有短胡的戈、柳叶形短剑、空首折腰钺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铸有蜀国图形文字符号的方形印章以及大量成套的青铜工具等。

四　江西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因其首先在江西樟树吴城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或更晚，是一种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有刀、斧等。并发现有 35 件铸造铜斧、凿、刀等用的石范，与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陶范不同。1989 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 8.22 米，宽 3.6 米。棺长约 2.34 米，宽 0.85 米。墓中随葬有青铜器 480 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与工具等。其中有些器物形体巨大，例如一件青铜甗，高达 1.10 米，重 78 公斤。一件大方

鼎，高0.97米，重49.2公斤。一件四羊罍，腹径61厘米。其器形与纹饰均与中原商代晚期青铜器类似，说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有些器物，例如青铜钺、短剑、单翼镞形器、半圆形凿、手斧等，则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并且在器物上还常见虎形立雕装饰。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蛙、水晶套环、玛瑙套环羽人饰品以及几何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300余件。据研究，墓葬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或较晚），墓主人可能是当地古代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吴城文化青铜钺（江西新干出土）

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及石范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大多每件器物上刻1—2个符号或文字，最多的在一件陶器上刻有12个符号或文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形体

结构可能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但至今大多不能认识，也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五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与台湾在商周时期是古越人的居住区，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的特点是既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又有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其青铜工具与兵器则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此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西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发达的表面饰有几何形印纹的硬陶器，以罐为最多，还有豆、碗、盘等。此外还发现，有段或有肩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广东地区。1974 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青铜盉，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 年、1963 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青铜鼎二件、簋一件及编钟一套（现存五件）等。二号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七件、青铜罍一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罍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

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100余件，说明广东的青铜文化到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广西地区。1949年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及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侈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锛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网状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纹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高76.8厘米，重100.35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现有青铜镞等。其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 1949 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 1975 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 79 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一号墓出土青铜器 110 件，其中有铜鼓一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



春秋铜鼓（云南楚雄出土）

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至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六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 28 套。每套由一件铜斧、一件长方形锄和一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 23 号墓，随葬青铜器 577 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四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

1961 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长 2 米、宽 0.62 米、高 0.64 米的长方屋形铜棺。棺顶作两面坡形，棺身由七块铜板组成，由插销扣合，可以拆装。侧面铸有鹰、燕、虎等动物纹饰。随葬有铜鼓、铜钟、铜笙及铜葫芦笙，还有干栏式的铜房屋模型及猪、狗、鸡、羊、牛、马俑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纯锡制成的手镯，这可能与云南富产锡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上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铜锄体为长方形、方形或桃形，斧为靴形，矛多为中部起脊，钺为半月形刃，剑多为花蒂形剑格、圆柱茎上饰有缠缑（gōu）纹等。但同时出土的铜戈及柳叶形剑等，与中原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说明此时云南地区与中

原青铜文化已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原青铜文化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跞（jué）率兵攻取巴、黔中以西，到达云南滇池。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0）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阻断了庄跞的归路，于是庄跞“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到了汉代，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臣属墓出土的大批铜鼓、铜贮贝器、各种人形及动物形扣饰，形象地反映了滇人农业、畜牧、纺织、狩猎、战争、乐舞及祭祀活动的情景，说明此时滇文化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及卓越的艺术成就。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商周青铜文化
作者＝李先登著
页数＝１６１
ＳＳ号＝１２５２３１６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１